



亚 | 洲 | 道 | 路

上海论坛2018嘉宾采访录



www.shanghaiforum.org



电子邮箱：shanghaiforum@fudan.edu.cn

网址：www.shanghaiforum.org
www.shanghaiforum.fudan.edu.cn

复旦大学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

「在 上海论坛 2018 上，我们招募了 27 位优秀的复旦学生担任记者对论坛嘉宾进行采访。他们用专业、投入和自信记录下这些智慧之声。这本采访录，就是他们与嘉宾交流观点、汇集智慧的结晶。」

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诚挚地感谢每一位莅会嘉宾和每一名学生记者。我们希望通过本书，与更多关心亚洲发展的同仁们，共享思想与智慧的力量。」

2018 上海论坛学生采访团名录

姓名	院系
黄昕蒙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鄢宇濛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俞臻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余慧艳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钟雪莹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汤以诺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彭斯越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郭琪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向晨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邹金水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黄昕蒙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张宇婷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韦孟菊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张君昊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孙宇彤	新闻学院
杜岸树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赵佳宁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朱安迪	哲学学院
陈思宇	公共卫生学院
张贝璘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王子煊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张玉洁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廖素安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杨易	法学院
王峥	法学院
王悦馨	南广学院（中国传媒大学）
张兰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目 录

智者对话

- | | | |
|----|------------------------------|-----------------------|
| 1 | Shamshad Akhtar | 变化世界中的中国角色 |
| | - 胡涛 | |
| 7 | Graham Tillett Allison | 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及未来走向 |
| | - 吴心伯 | |
| 18 | 河村健夫 | 半岛问题与党政选举——日本的国际与国内关切 |
| | - 樊勇明 | |
| 29 | Luiz Carlos Bresser- Pereira | 新发展理论和国际外汇 |
| | - Sergio Suchodolski | |

高端访谈

- | | | |
|-----|-------------------------|---|
| 34 | Naoyuki Yoshino | 基础设施在地区发展和地区一体化的作用 |
| 41 | Berhane Gebre-Christos | 埃塞俄比亚与中国超越经济合作的关系 |
| 48 | Dr. Woetzel.JW |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与对非投资的挑战 |
| 54 | Ramu Damodaran | 变化的格局：联合国和新的国际发展组织 |
| 61 | Rainer Klump | 稳定始于国内：欧盟与中国的未来选择 |
| 66 | 张春 | 中非合作论坛——推动中非合作新发展 |
| 73 | 张海冰 | 变动中的国际贸易格局与中国完善全球贸易治理的尝试 |
| 79 | 万广华 | “去一体化”潮流兴起 分配体制亟需调整 |
| 83 | 马海兵 | 让绿色治理理念渗透到“一带一路”国家 |
| 89 | 石正方 | “一带一路”绿色治理——从协调环境标准到公开环境信息 |
| 94 | 李万 | 创新“去中心化”进程中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
| 99 | 张俊杰 | 用法制化和市场化的手段来保障绿色投资收益与风险的匹配 ——发展中国高质量绿色金融 |
| 104 | 强晓云 | 中俄中亚合作，需要更多的信心和耐心 |
| 110 | 杜巨澜 | 坚持政府监督管控 促进新时代下金融经济平稳发展 |
| 116 | 李丙瑞 | 新形势下的北极开发与保护 |
| 120 | 李明江 | 坚持互利互惠，切合实际需求，扩展多边合作 |
| 126 | Eileen M Sullivan Marx | 当 LIFE 走进现实生活：费城成功推行以社区为基础的老年人长期护理项目，我们能从中习得哪些经验？ |
| 133 | Luciano Galvão Coutinho | 经济全球化中多边开发银行的参与 |
| 139 | Ruth Shapiro | 社会企业在新经济时代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语境下的价值，挑战和回应 |
| 146 | 汪海粟 | 合理配置国家信用，理性对待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 |
| 153 | 洪农 | 南海共同开发的其他领域和模式 |
| 157 | 达巍 | 从特朗普和美国逻辑看中国对美政策 |
| 162 | 聂再清 | 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用人工智能解决老龄化问题 |

变化世界中的中国角色

编辑：黄昕蒙



Shamshad Akhtar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十任执行秘书



采访人：**胡涛**

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中国项目主任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一系列举措，中国正努力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中国将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胡涛：阿赫塔尔博士，当今世界瞬息万变，您在主旨演讲中提到了亚洲在其中的责任。

您认为中国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Shamshad Akhtar：中国在亚太乃至全球经济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经济政策不仅对国内产生影响，也会波及世界各国。因此，我们首先要理清当今世界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当前，世界经济走向堪忧。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衰退以及大量失业，而许多因素延缓

了经济复苏。一些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经济也备受打击。要想使他们摆脱困境，就必须由国际社会提供支持，这是至关重要的。在此背景下，我认为中国拉动内需可以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均衡。另外，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经济迅速从投资驱动转变为消费驱动，完成了复杂全面的结构改革，照顾到了更多社会群体的利益，兼顾环境保护，形成了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态势，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简而言之，我认为中国将引领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中国的地位十分重要，中国对地区和全球经济产生的影响也是一些国家效仿的榜样。

胡锦涛：您认为中国对亚洲地区有何影响？

Shamshad Akhtar：我认为中国的重要角色在于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中。过去四十年间，中国一直通过亚洲发展银行、世界银行等机构促进多边共同发展。中国也一直为维护多边主义发声。在世界经济格局多变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显然，中国正尝试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获得更多话语权。中国也需要从世界银行中借款，但他一直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保持联系，支持多边治理机制。如今，中国负责管理亚投行、新开发银行等一系列地区内的多边融资机构，设立了特殊扶持资金，并将这些与一带一路倡议挂钩，推动地区合作与融合，使亚洲市场更加多元化。中国在亚洲的大量投入有目共睹，也将带动贸易的增长——这是非常重要的趋势，可以打开更多新兴市场，为贫困地区创造财富。因此，中国推动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是卓越的成就。我希望其他一些国家在理顺国内经济后可以重新加入谈判。

胡锦涛：今年将在上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借此吸引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出口。您对此有何看法？

Shamshad Akhtar: 中国必须扩大进口市场。一个国家不能只出不进，因为双边贸易必须是双向的，不从别国进口将会打破贸易的平衡。这是中国经济存在的一个问题。习近平主席一直秉承共同繁荣的理念，中国也正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消费市场。维持国家间的贸易平衡是明智之举。

胡锦涛: 中国正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您对此有何看法？这是沿线国家的机遇还是挑战？

Shamshad Akhtar: 首先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机遇。亚洲地区税收占 GDP 比重很低，因此国内资金较为匮乏，发展中国家过去必须依靠多边开发银行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当然，仅靠外部支持是不够的，但在调动国内资源之前需要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填补空缺，为融资提供支持。一些国家担心中国会过多干涉其他国家，但每个国家都可以独立思考自己想要从一带一路中获利多少。没有哪个国家会被强迫加入基础设施开发项目。

但是有两个关键问题亟需解决。其一是劳动力市场带来的政治问题。如果一带一路倡议意味着必须使用中国劳动力，一些国家就会产生顾虑。我在家乡巴基斯坦采访了一些商人，问他们对中国管理者和劳工的到来有何看法。他们认为巴基斯坦确实需要技术，但对中国劳动力较为抵触。

其二是资金的稳定性。一些国家对清偿各国债务的能力十分担忧。并非每个国家都是如此，因为各国情况不同。但对许多国家而言，其进口大于出口，因此清偿债务并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这并不是中国造成的，但作为理智的贷款人必须有所考虑。

胡锦涛: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怎样的态度？委员会与倡议中

的项目有没有合作？

Shamshad Akhtar: 亚太经社会一直以来十分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但我们并不是其中成员，因此不做代言。我们在技术层面上为各国服务，通过开展研究为中国提出建议。我们还要确保一带一路项目遵守社会准则、环保标准和融资规定。亚太经社会联通了多国政府以及一带一路项目成员，与沿线国家就倡议展开了多次对话和讨论。通过政府间的努力，一些市场准则得以改进，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我们一直推动交通、能源、信息通讯技术、市场整合和贸易的发展，鼓励国家降低关税，这些都对一带一路倡议有所帮助。这些措施无需从头再来，只要将原先亚太经社会主导制定的规划改由沿线国家主导即可，这样就不会因个别国家而受阻。我们也有能力组织各国政府讨论一带一路倡议的福利，他们是否有更多需求或者他们遇到了哪些问题。这个机制可以高效地给中国提供反馈。

胡涛: 感谢您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巴基斯坦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中巴人民之间友谊深厚。2015 年，中巴经济走廊正式启动，请问您对其前景有何看法？

Shamshad Akhtar: 确实如你说，中巴经济走廊是两国长期互信和合作的体现，也是两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所促成的。中方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举措也深受巴政府尊重。同时，巴基斯坦发展受到若干问题限制，需要外部帮助。

其一就是巴缺少基础设施所需的资金。一些建设工程十分复杂，比如今年通车的“苏木段”高速公路，没有中国的帮助是无法完成的。如今经济走廊的项目更为广泛，从陆地交通发展到港口联通。瓜达尔港的建设就受到了一带一路的大力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希望将瓜达尔市发展成经济枢纽，当地的优良港口可以提高交通效率。因此瓜达尔港项目对中巴都有重要意义。瓜达尔市位于俾路支省，是巴基斯坦最欠发达的省份之一，急需发展动力。中巴经

济走廊建成后将带来旅馆、商业和工业需求，使瓜达尔市迅速发展。

另一个问题是巴基斯坦缺少能源。现如今，巴基斯坦投资了许多可再生能源和热电厂项目。我们拥有这些资源，但过去从未得到开发。中国投资的清洁能源技术将成为巴国内改革的一部分。这是非常理想的状况，巴基斯坦必须抓住良机，发展经济的同时进行改革。

胡锦涛：您曾任巴基斯坦中央银行行长、世界银行中东和北非地区副行长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等职，现在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作为一名成功的女性，能向其他年轻女性提供一些建议或者分享一些经验吗？

Shamshad Akhtar：我认为女性的成功之路大都十分艰辛。我的家庭十分看重教育，因此我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大多数女性却并非如此。即便受过教育，女性也面临许多挑战，尤其是进入职场之后。当我在多边开发银行工作时，我意识到女性的玻璃天花板。突破这个天花板并不容易，你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对自己有信心，并且专注于所做的工作。不要失去希望，但也不要以为你已通晓一切。一直以来，我的原则都是我还有不明白的东西，我需要学得更多。我之所以攻读博士后，是因为除了在博士阶段学到的经济知识之外，我感觉自己还需要更多经济领域的知识，想要探索经济学的前沿。另外，你必须在工作中学习。学校的教育方式是可替代的，但工作中学到的是独一无二的，你能够了解一手的、真实的市场知识。我一直十分渴求新知，我认为这是我成功的第一要素。

但女性常受到巨大的社会、文化阻碍。女性的社会化是一大问题。当今的女性拥有开放的媒体和计算机技术，可以轻松获取知识，但当我完成博士学位踏入职场时并非如此。过去，女性进入职场都很困难，而如今女性对职业可以精心谋划。她们发现社会化是获得关注的重要途径。在我过去的职业生涯中，我并没有这样做，但如今在联合国我必须社会化，我必须表现得像一个外交官。我的同事可以告诉你我对此并不支持，人们需要实打实的技能来谋求

发展。

同时，好的导师也非常重要。我在职业生涯中并没有导师，但有很棒的上司，他们对我的技术水平十分信任，也常常鼓励我。如今我常常指导同业的其他女性。我希望我可以任命更多女性，鼓励她们进入我的行业。

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及未来走向

编辑：鄢宇濛



Graham Tillet Allison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学教授，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



采访人：**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兼行政所长，
复旦大学美国问题研究中心主管
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美国社会出现了对中国崛起的强烈焦虑情绪和特朗普对经济民族主义的偏好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一些重大变化，如何避免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是当代中美两国学者和政府首脑都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吴心伯：早上好，格雷厄姆·阿利森教授。欢迎来到复旦大学上海论坛。

Graham Tillet Allison：谢谢你的欢迎。

吴心伯：在过去几个月里，整个世界都在密切关注中美之间的贸易和经济摩擦。您可

以从美国的角度解释一下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背后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吗？

Graham Tillet Allison: 如果有人确切知道，他们会得到一份奖品。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特朗普是个十分罕见的奇葩。因此，他让美国人和中国人一样困惑不解。但我认为，在此次贸易战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事实——在过去 25 年里尤其是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大国。中国崛起的速度和以远超其他国家的速度、更全面的方式崛起。而美国人只是一点点缓慢地发觉这个事实。因此，当他们意识到这一事实时，他们发现已经有一个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可以与美国比肩甚至更加优秀的国家出现了。这对那些在美国这匹赛马上下注最多，并且理所当然认为是世界第一的人来说是一种威胁。然而中国的出现简直是当头一棒。也是对现今世界秩序的巨大冲击。特朗普感受到了这一点，并在竞选中利用了这一点。大部分美国公众都觉得中国一定是在作弊，而他第一个站了出来成为了这些有同样感觉的人的首领。否则，怎么才能解释他会如此成功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无论什么事都归咎于中国的原因。也许有些事真的应该中国负责，但大多都是莫须有的指控。而中国的态度也并不激烈，只是当成小打小闹一样得过且过。但是现在它被夸大成一个无法原谅的错误。就我分析，所有这些反应的潜在动力是为了维护因为中国的迅速崛起而受到挑战的美国世界统治地位。

吴心伯: 是的，我的第二个问题正与您的分析有关。在我最近访问美国期间，我还发现除了公共立场政策方面的贸易问题，美国社会还普遍存在对中国的崛起的焦虑，甚至是对中国崛起有如实质的抵触情绪。从冷战结束后至今，现在的美国让我感到非常的陌生。过去的美国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乐观和自信，一直倡导开放、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然而现在，似乎一切都在突然之间发生了变化。那么，在这种对中国强烈的抵触情绪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Graham Tillett Allison: 你描述的这种情况完全正确。在如今的华盛顿执政和政策制定阶层普遍存在着一种焦虑情绪。修昔底德会说他已经写就了关于这些问题的书，书中的故事讲述了雅典崛起时的统治力量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我有一个非常合适的比喻来描述这种情况，如果我习惯于站在时代的顶峰，而在这个时空里，出现了一个可以与我竞争的人，这会让我感到不安全，我会害怕世界被改变。当然，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世界总是在改变。所以，现在美国的这种情况有部分原因是外界的客观因素造成的。但更重要的是国内的原因，美国的自信是在二十世纪末建立起来的，并且在新世纪之初就认为世界正朝着它制定的方向发展。然而事实上，针对世界贸易中心的 9·11 恐怖袭击，布什对伊拉克的冒险和政府原本认为可以推动利比亚解放结果却造成一片混乱的“阿拉伯之春”，再加上巨大的金融危机和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的无力。这一切并不是美国自己所期待的那个美好世界。正相反，中国的表现则总是打击美国人的信心。现在，你大概已经明白了的这种现象如何产生的。正是因此，民粹主义开始在大多数感到被甩在后面的民主国家兴起。

吴心伯: 您可能与媒体、政策制定者们交谈过。我认为外界对于今天的中国的评述有时是有选择性的，甚至是扭曲的，他们没有以正确的方式解释中国。尤其是中国过去几年的经济增长，其唯一的并且最终的目的是让 8 亿人摆脱贫困，这对世界有很大的贡献，不应被视为对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重大威胁。在美国对中国的解读中，我认为，其对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长期战略意图也有某种夸张和歪曲。那么请问您现在对中国有什么看法，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您如何预测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未来发展？

Graham Tillett Allison: 让我先从你的前一个问题答起。因为我认为你一如既往的敏

锐地观察到了美国所发生的事情，并且我认为你的解释是正确的。“修昔底德陷阱”正在我们面前发生，我们随后也感受到了它的存在。修昔底德谈到了这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也谈到了这种恐惧对人们心理感知的影响。对斯巴达城来说，人们的错误的感知被放大，误判也被放大，因此，受到外界行动影响的风险被放大。现在，我知道中国在成长，我预测未来 10 到 20 年，或者 30 年，这个数字会成倍增长。而到那时候，我认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但是中国会在未来的 10 年、20 年或 30 年内继续保持这样奇迹般的增长率吗？没人知道。即使它做到了，这也同样是夸大了中国能力的解读。有人认为，事实上，七八亿人口脱贫值得全人类庆贺，尤其是现在变得更有尊严的穷人。而我认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每天都感到自豪。这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如果有人把他解读为，等一下，8 亿可培养的潜在士兵。中国人不赞同这种说法，只是因为它只会站在中国的立场思考中国，而同样的，美国人也只会考虑美国。我们将习惯于一个强大的中国，一个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没人会对此有所反对。所以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千万或一亿，而是十亿多的人口。怎么可能一个国家有超过 10 亿的人口？这简直颠覆了他们的世界观。因此，处于恐惧的状态中的你，很容易把问题夸大。我认为交流的一大难点就是要尽量保持客观。这就是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以及领导者之间的大量交流是非常必要的。

吴心伯：这就引出了一个涉及到你和我作为一名学者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在这种关系的困难时期更好地教育公众，并告知政策制定者们更准确地解读这种关系。我们能做什么？

Graham Tillet Allison：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有三件事情需要我们去。首先，我认为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试图围绕这个问题找到自己的思路，并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所以我试图用一本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书来证明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你不

能否认中国正在崛起，并将继续崛起。这将会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美国，你不能否认美国已经统治了世界一百年，事实上，主要由美国负责提供的世界秩序已经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中国能够不断地创造奇迹，并让所有的代理人都能够参与进来。正是这些事实所带来的压力造成了现在这样的危险情况。而这同样是事实。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了这些事实，而这些事实是否意味着它一定会变成灾难性的？不，我这里有 16 个案例，其中 12 个结果不尽人意，但还有四个成功摆脱了这种危机。让我们来看看这四个案例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首先，必须提供真实的情况。其次，我认为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政策制定者要像对他们的政治议程一样保持对客观世界的敏感。有学问的优点之一，就是你可以有更多的独立性。也就是说，我理解你的政治议程，但是我只是告诉你真相，就像每个政府的情报机构在总统使用完情报之前都负有主要责任一样。他们不喜欢听取意见。告诉执政者客观的事实，这是情报官员工作中应该具备的专业素养，但有时我们做得并没有我们应该做的那样好。然后我认为对公众来说，需要我们提醒他们这些情况是如何助长误解、脸谱化和夸张的。因此，在今天的美国，中国虽然还没有被妖魔化，但它肯定在被妖魔化的路上了。如果你看一下美国人对俄罗斯的评论，我相信一定有人会说俄罗斯已经和美国一条心这种不切实际的话。有人会说你必须同情俄罗斯人。我拒绝，我是一个资深冷战专家，并且认为苏联的失败是咎由自取。有人说俄罗斯是最主要的接近美国民主的国家。他搞错了。我认为美国民主本身就有很深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就很可能被有心人利用并煽动，引起前文所提到的误解和夸大。最后，其实最主要的是我们自己怎么做，而不是别人。

吴心伯：我想，我们已经谈过中国了。接下来让我们来谈谈美国自身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对中国的强烈情绪和特朗普对经济民族主义的偏好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一些重大变化。在你看来，这是一种暂时现象，还是长期变化的开始？

Graham Tillett Allison: 我希望这种现象只是特朗普本人，或者只是特朗普政府暂时造成的。但我认为这更有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根深蒂固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从美国人的种种经历来看，他们都是当第一。因此，当意识到他们可能竞争不过其他政党时，他们心理上很不舒服并且这使得他们没有安全感。这就是事实，和其它因素没有任何关系。这就像当有一家公司崛起时，两家公司之间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样。但即使是孩子的家庭也有可能比父亲的更大。这可能会很复杂。这是我的观点。其次，另一项事实是，美国的民主就如她表现的那样，并没有真正起到民主效果。现在所有人都认识到，为此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是件好事。这就是为什么普京实际上很招人喜欢的原因。因为你可以说，普京正在使坏。美国人在提出民主之前就要求民主。所以，正如我写的一篇关于华盛顿特区文章，华盛顿是功能失调资本的首字母缩略词。因此，正如他们所说，美国人看到的是，是谁给我们带来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无休止的战争，是谁给我们带来了中东和利比亚的战争，是谁给我们带来了金融危机和大衰退。我认为美国政府阶层似乎不懂得如何治理。特朗普就是这么说的。他表达了这种观点，并且得到许多人的回应。对于超过总人口半数的人来说，他们的收入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没有真正增长，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没有变得更好。这是我们进入第三经济领域的一个大问题。但是美国梦告诉他们，如果你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你的孩子会比你更富裕。这些人认为有人在否认我的梦想。所以这些都是美国人必须自己解决的问题。如果你在自己的国家你有各种问题，就会有一种诱惑。想想看，也许把自己的问题归咎于别人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不幸的是在美国也是如此。

吴心伯: 特朗普在竞选中甚至在入主白宫后都承诺，他将解决所有问题。如今他已经任职将近一年半了。您会如何评价他作为一个总统的表现呢？

Graham Tillett Allison: 我相信我们以前从未见过像特朗普这样的人。我一直在研究

历届总统。我们倾向于认为他是其中很不寻常的一位，但事实上没有人真的喜欢他。毫无疑问，他以一种业余的、局外人的身份上台，并基本上违反了所有规则。这就是他一直在做的。我想如果我放弃的话，我将不得不放弃那些不完整但很可能是低分的东西。我会说退出巴黎协议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退出伊朗核协议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有一项事例我没有很在意。我认为这是特朗普对俄罗斯的本能，事实证明如果我们和俄罗斯有更好的关系，我们会过得更好是正确的。但是这一切都沦陷在“通俄门”的政治和他试图处理这一问题的本能里面，并且完全失灵了。因为这让他看起来好像在干一件激动人心的大事，并因此使得政治局势更加恶化，所以他只会让问题变得更糟。我更看好的是与朝鲜的外交，因为在那里我们将会举行一次峰会，并协商一项重大协议。这项协议原则上是在一段时间内实现核武器化和关系正常化，并就此进行谈判。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认为这对特朗普和金正恩来说将是双赢，同样对中国的习近平主席，尤其还有对韩国的文在寅总统来说也是双赢。

吴心伯：特朗普想召开一次峰会，并且通过连续召开峰会的方式来为自己邀功，甚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PRK（朝鲜）的新立场将持续很长的一段时期。所以，即使这个大交易（协议）达成了，你们仍然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来维持它。因此，人们担心特朗普可能没有合适的团队来实施它，或者他可能没有这种资源来确保交易能够兑现。那你有什么想法？

Graham Tillett Allison：我想你是对的。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认为我们必须把特朗普在这次峰会上可能完成的协议与现实的选择进行比较。2008 年初，就在上一次之前，存在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金正恩继续试验核武器，并获得用核武器打击美国的可靠能力。这是最有可能的。第二，特朗普要求朝鲜停止第一项中行为。这也是很可能的。第三，（美朝双方达成）一个非常复杂的协议，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才能实施，这可能是一

个小奇迹。因此，在选项一、二和三之间，三比一和二好得多。但是三必须非常优秀才能比选项一和二更好。所以现在如果他达成了一个总体框架协议，他将宣布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事实并非如此。但是我不应该从字面上理解他的话，像是生活在一个新世界里。这些更像是广告标语，只有各种各样的图像，这些不仅存在于他自己的生活中，如果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将会在我们的余生中陪伴我们。不仅对于美国、中国、韩国，还有对其他各方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什么将逐步成为复杂的问题呢？我认为中国参与进这项即将达成的协议非常重要，并且中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更为重要。因为中国的邻国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也是中国将要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来说，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就像特朗普与习近平于 2017 年 4 月 1 日第一次在海湖庄园会晤时，他对习近平说，看看这个烂摊子。谁弄得这么乱？他说，奥巴马、布什和克林顿。他说，你呢？那你之前的那个人呢，你们什么都没做。现在你把这个烂摊子留给我。所以，我同意这一点。

吴心伯：朝鲜长期以来一直被美国妖魔化，但与朝鲜达成重大协议将需要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和战略进行重大调整。美国准备好朝这个方向前进了吗？或者这只是特朗普一个人的功劳？

Graham Tillett Allison：这又回到了你关于特朗普的问题。总的来说，美国不会做好准备。美国就像一艘大型航空母舰，只是沿着之前的方向缓慢地移动，很难进行调整。但是特朗普像是一位朝着各个方向驾驶的驾驶员。不幸的是，如果他走这条路，他们也可以走那条路。但我认为，对于特朗普来说，他并没有准备好接受有关美国对朝鲜要求的全部正统观念。因此，如果他能够达成这一项要求令人难以置信的协议，朝鲜面临的威胁将会减少，那样因素是必不可少的呢？特朗普准备好了。我认为他们做出了改变，包括裁减那里两支美国驻军。即使我认为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如果韩国人说你们该回家了，美军也非常乐意回家。

你甚至可能想在韩国人想出并考虑他的决定之前就走。我们同意他们说为了达成和平条约，他们必须听到军队离开的消息。

吴心伯：在这方面，特朗普可能比他的前任更有资格对美国传统政策做出重大改变。

Graham Tillet Allison：只要美国和中国联系在一起，就会时不时地发生奇怪的事情。因此，也许只有特朗普和他的管理班子能达成协议。

吴心伯：比方说，如果特朗普就他的中国政策征求你的意见？我希望他会这么做。你对他有什么建议？

Graham Tillet Allison：这是个好问题。因此，我当然要了解他的主要顾问，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我的老朋友。我对他们说，美国的头号问题，我认为同样的事情也是习近平最为困扰的，就是如何从陷阱中逃脱。我认为，如果你像往常管理生意一样来管理国家，你可能会领导一个政府经历一场灾难性战争中，在战争中，你的任期会取得成功，但这场战争将摧毁一切。和中国人很像，美国人关心我们所有的希望，所有的梦想，所有的兴趣。所以当意识到你面临着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时，所以这也预示着反对。不要听天由命。许多案例是成功的，但不仅仅是放之任之，也不仅仅是随波逐流。你必须锻炼想象力、适应能力和调整能力。你不必像以前那样做事。你必须做不同的事情。你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思考，你可以有不同的想法。现在鼓励整个战略团体开始考虑一些这样的事情。我说，我会把这些东西给美国人吗？我想，对习近平来说，他能想到这个主意吗？他说，我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新型大国关系。那么为什么称之为新型呢？在华盛顿工作的一个员工可能会说出答案。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新的？我们称之为新的，因为我们知道所有形式都将遵循这两种文明模式进入战争。你

不想要战争。中国肯定也不想要战争。所以我们需要新的形式。我觉得这很棒。这意味着我们之前说的几个观点我认为它们将是矛盾的，这将是相互尊重的双赢解决方案。我认为这很抽象。细节呢？他说，我们希望其他人能对这些事情有所帮助。如果我问特朗普，你为什么不说我有一种新的政策形式有想法？这里有六件事要做。一、二、三、四、五、六。让我们从这些着手。然后我想中国人可能会说，不，我们也不喜欢这些，我们不喜欢第五个，但是还有另外三个会在这里分类，我们还有三个想法。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积极做的事情。我认为与朝鲜，一个新形式大国的关系应该是危机预防类，而不是管理预防类。那么，我们如何预防将双方拖入我们不想要的战争的危机中。如果美国攻击朝鲜，朝鲜攻击韩国，那么我们就有了第二次朝鲜战争。我们可以让美国人和中国人在韩国互相争斗，就像 1950 年发生的那样。那会不会很疯狂？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要阻止它。台湾是中美战争的另一个非常好的途径。美国会鼓励台湾独立吗？我认为每一个中国人，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会说不，这是中国必须抗争的问题。哪怕和美国发生战争，他们也坚持这是对的。最好把这件事情解决掉。我们必须阻止争斗的发生。那么我们如何防止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努力，我认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吴心伯：你对中国领导层如何应对特朗普有什么建议？

Graham Tillett Allison：我想说他们面临着一个困难的挑战。当然，我必须承认他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人。一位美国风险投资人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试图重点理解为什么大多数人都很随意地看待特朗普而非严肃认真地。这是一个很大的倒退，你应该认真对待他，而不是随便对待他。他像正常人一样思考。当他说出的话并不完全是字面意思时，这些是理解特朗普非常雄心勃勃地让美国重新变得伟大的重要的抓点。那么，中国是否不可能帮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或是美国的强大只需要削弱中国？在有些人看来，这是对的。因为如果你很强大，

我不能坐以待毙。这都是真的吗？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中国人应该想出如何帮助美国变得更伟大的办法。当我们这么说的時候，朝鲜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否能够证明这一点，仅仅是因为他是分裂的。是的，没错。他能想到解决方案吗？这对双方来说都很容易双赢。在贸易方面，我也会有类似的想法。贸易方面将会有一些重大调整。特朗普专注于双边贸易平衡。我认为这对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都不是一个好的目标。但是，如果这是中国非常关切的事情，并且对中国来说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我认为中国应该解决这个问题。我猜测这方面会出现积极的进展。但是他们还应该寻求其他合作领域。不幸的是，在非常本质且至关重要的气候问题上，特朗普有一套奇怪的观点。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认为，例如，在伊朗的案例中，如果我们要想办法不让伊朗协议破裂，中国——一个离伊朗远得多的国家——也许很大可能会有所帮助。

吴心伯：这是你第一次被邀请参加上海论坛。昨天你发表了关于我们的一篇重要演讲。

那么你对上海论坛的印象如何？

Graham Tillett Allison：我很荣幸能成为峰会其中的一员，对话的深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把我吸引进讨论中。我喜欢，尤其是你预定主持的圆桌会议，你可能需要对其他团体的所有文件发表评论。但是我认为我们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讨论。我见到了很多场外人员。我认为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学到了很多東西。

吴心伯：谢谢你，欢迎回来。非常感谢。

Graham Tillett Allison：谢谢。

半岛问题与党政选举——日本的国际与国内关切

编辑整理：俞臻



河村建夫

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



采访人：**樊勇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
院教授

「在朝鲜问题上，日本应该积极掌握主动权，推动曾经的六方会谈的重启。日本会在维护好日韩关系的前提下，与朝鲜进行国家间的合作。」

樊勇明：今天如此紧张繁忙的行程，真是辛苦您了。我们接下来聊些什么呢？关于日中关系我们已经聊的够多的了，要不就来轻松地聊聊别人的话题吧。另外，这次我们的采访将全程采取视频录像的形式。最近中日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打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则显得尤为重要。不知道先生对于现在朝鲜半岛的局势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河村建夫：原定在 6 月 12 日举行的美朝会晤，现在已经被特朗普总统取消或者说是暂时推迟。全世界都非常关心美朝峰会什么时候能够重回正轨。中国今后要如何斡旋于美朝之间，以及对于北朝鲜的现在的状态，会给金正恩什么样的建议，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金正恩在近期两度访问中国，这也是因为局势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对中国各方面的依赖就变得更加强烈了。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朝鲜的伙伴，从这个层面来看，我们可以感受到今后中国的存在也将继续对美国，朝鲜以及韩国产生重大的影响。

樊勇明：也就是说您认为，中国在美朝之间如何扮演中间人、调停人的角色，这一点尤其值得关注，对么？

河村建夫：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樊勇明：在这之前我们曾试图通过六方会谈这样一种机制来力促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但是现如今朝鲜退出之后六方会谈迟迟没有复会，只有南北朝鲜、美朝、美韩、美中朝韩这样的对话机制存在。虽然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也非常紧密，但总觉得日本似乎已经被排除在外，先生对这种情况有什么看法么？

河村建夫：从现在的形势来看，我认为有必要推动重启曾经的六方会谈，使朝鲜参与进来，俄罗斯也包括在内，与会各国在相互协调的前提下探讨可行的解决方案。这一点非常重要。再一次重启六方会谈，让各国在互相沟通的前提下制定规则。确实像您所说的日本现在有种边缘化的感觉，也有一些声音指出日本不该完全依靠美国。当时出现这种声音的时候，我也呼吁日本应该积极掌握主动权，推动曾经的六方会谈的重启。

樊勇明：您认为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

河村建夫：我认为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最近李克强总理已经访问了日本。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安倍首相和习近平主席的会晤更显得尤为重要。

樊勇明：那么也就是说，朝鲜半岛的形势今后也将是中日韩三国所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安倍首相的访中和习近平主席的访日势必将成为下一个热点话题。日本方面必须更多的释放一些积极的信号。下一步，河野外相就该采取主动重启六方会谈了吧？

河村建夫：能采取主动，我认为也应该采取主动。河野外相正在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安倍首相也正在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那么主动推动六方会谈的重启自然也是在下一步计划范围内的。

樊勇明：如果日本下一步能够掌握主动权的话，才能渐渐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中国也乐于看到日本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要是过于强势，行动可能就有不受控制的风险，那样的情况对我们来说也不甚理想。而在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这一点上，美国、日本和中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说日美是同盟，但是美国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牺牲了日本的情况也不少见，尤其是在特朗普当选之后。先生对这件事有什么样的看法？

河村建夫：对于日本来说，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背后，还有着绑架问题。民众非常关注事态的发展，并期待着横田惠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因此安倍首相在国内发表公众演说的时候一定会涉及绑架、核武器、导弹这三个话题。日本对于美朝会谈的期待也正在于此。特朗普总统也是能够理解日本的立场，并且对安倍首相的重要诉求有一定认识的，因此这些问题的协商解决是值得期待的。但是美朝会晤也存在交涉和利益角力，因此时机也显得非常关键，现在正是处在一个暂时搁浅的阶段。另一方面，日本的想法与其他国家又有所不同，因此在

采取行动时也不得不慎重。作为日本来说，我们非常期待在“特金会”之后，也能实现日朝首脑会谈。

樊勇明：确实就像您所说的，绑架问题是一个国内问题，但一旦牵扯到导弹就变成了国际问题了。日本在这些问题上也将采取更加强势的态度吧。外交就像是一场纸牌游戏，双方各自手持一副牌。那么关于您刚才提到的日朝首脑会谈，可以想见的是日本将向朝鲜提供经济支援，通过日元贷款清算历史，那么除了“经济牌”之外，日本还打算对朝鲜打什么“牌”呢？

河村建夫：朝鲜的民众同韩国一样，都是非常敬业勤勉的。日本的民众受益于社会保障等制度才能够过富足的生活，那么对于朝鲜来说，除了金钱援助，完善社会的制度法规等方面的协助也很必要。我们希望朝鲜能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政府权力受到约束的国家。虽然说日本还没有采取这方面的行动，但是确实是有这样的计划和考虑的。另外，还有农业技术和渔业技术。

樊勇明：朝鲜长期以来都深陷粮食短缺的危机当中，如果日本的大米生产加工技术能够用来解决缺粮的问题的话，那对于朝鲜人民来说再好不过了。

河村建夫：渔业方面也大有可为。最近由于粮食短缺有不少朝鲜的海难船只渡航到日本。另外，渔船方面也确实是日本的优势领域。

樊勇明：我在 90 年代中期的时候曾经在日本农林水产省下的海外渔业协力财团担任过翻译一职，朝鲜一定也乐于见到日本海水养殖技术的引进吧。在渔业这方面，韩国的

实力又怎么样呢？

河村建夫：最近有许多的韩国渔船进入日本专属经济海域捕捞，甚至影响到了日本渔船的正常生产作业。由此可见韩国应该也是具备这方面的实力的吧。虽然不好说日本在这方面给予了韩国多少援助指导，但是渔网编制之类的不少技术确实都是从日本引进的。渔业确实是日本的优势领域。

樊勇明：韩国和日本既是近邻，又有非常密切的人员往来。在经济方面也随处可见韩国元素的影响，比如软银。那么韩国和日本在对朝鲜政策上会有相互竞争么？

河村建夫：可能会有有的。这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韩关系，以及日本愿意接受哪些条件吧。日本应该认识到，朝鲜半岛今后必将会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东德和西德的统一成就了现在的德国，这对于朝鲜半岛未来的发展道路也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日本不可能撇开韩国来发展与朝鲜的友好关系。日本还是会在维护好日韩关系的前提下，与朝鲜进行国家间的合作。

樊勇明：似乎还有点时间剩余，我能向先生请教一下日本国内的问题么？

河村建夫：请。

樊勇明：由于我自己本人是做日本研究的，因此对于日本的政局变化比较关心。按当下的局势来看，安倍首相再次参选是不是比较危险了？

河村建夫：如果只看媒体报道的话，确实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民众对于整个政治体系的信赖被动摇了。有人说安倍首相仿佛在遮掩着什么，在对民众说谎。在野党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穷追不舍，安倍自己口口声声说要纠治积弊沉疴，改善政治生态，结果这积弊反倒出在自己身上。按照现在的情况看的话，确实首相夫人与森友学园的交情深厚，但是从刚刚出狱的笼池夫妇的言行来看，怎么都不像是正派人。天真单纯的首相夫人大概只是被无辜卷入其中的，而不是真的做了什么事。不过安倍首相也不至于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樊勇明：还是知道的吧。“忖度”这个词听起来就很意味深长啊。

河村建夫：财务省相关官员“忖度”安倍的意向应该是确有其事，但是反过来说，官员也该有自己的操守，永远清楚地知道这块土地是怎么回事、又该按什么规矩出售。现在这种局面恐怕是相关官员根据氛围擅自解读和判断的结果。我觉得安倍首相应该并没有特别介入其中。另外，加计学园的问题也是，碰巧加计学园的理事长与安倍首相从一块儿在美国的时候就是好友，这件事情才变得复杂起来的。四国地区的四个县中没有任何一个大学拥有兽医学部，我认为这恰恰暴露了文部省行政的弊端。而在这种情况下，设立兽医学部本来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在考虑地方发展与活力创造的时候，（采取这样的政策也不足为奇）。只是碰巧加计学园理事长与安倍首相交情深厚，才有了官员自发地“忖度”安倍首相的意图，这样事情就说不清了。我觉得这本不是什么大问题。

樊勇明：那么这样说来，安倍首相还是有可能再度参选的…

河村建夫：我是这样认为的。

樊勇明：那么也就是说岸田内阁的诞生就是明年或者后年的事儿了？

河村建夫：如果安倍首相再次当选，那么可以想见的是岸田应当会成为下一任首相的有力候选人。我们也非常关注岸田在安倍竞选中会出什么力，现在正想进行这方面的讨论呢。

樊勇明：另一方面，岸田本人则表现得相当谨慎，静观局势变化伺机而动。

河村建夫：现在从自民党内部的人数来看，势力最广的还是安倍派…

樊勇明：以前的福田派成了现在的安倍派，然后现在在人数上是最多的？

河村建夫：对的。是毫无争议的领先。

樊勇明：那么接下来是…

河村建夫：麻生在第三位…

樊勇明：麻生在第三位，岸田占第二？

河村建夫：岸田应该在更加靠后的位置。

樊勇明：那么第二位是？

河村建夫：第二位是竹下派，也就是原先的田中派演变而来的。二阶派则是差不多在第五位。第一位和第三位、第五位联起手来，国会中的半数议席就能得到保证了。

樊勇明：那么二阶派在当下有与麻生派联手的可能性么？

河村建夫：当然，现在麻生派和二阶派正展开紧密的合作。我曾经担任过麻生内阁的官房长官，因此也算是加入了麻生派的。现在整体的走向就是如此，二阶理事长正在访问大连，他不管去到哪里都必定公开表明支持安倍首相。

樊勇明：麻生在财政等方面还是很有一手的，但是国会答辩的时候…

河村建夫：确实有点口无遮拦…我在做麻生内阁的官房长官的时候，也数次碰到过这种情况，所以也不足为奇了。但是要是完整地听完整段话，你就会发现其实他讲的还是符合道理的。但是要是断章取义的话就…我做官房长官的时候，差不多也有两三次这样的情况，不过都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国家大事，也不至于发展成国际问题。

樊勇明：另外我还感觉现在日本的政局，仿佛像是回到了 70 年代末那个阶段。那个时候实力最强的是社会党，大约有百来个人，跟在它后面的则是公明党等一些小的政党。现在在野党当中立宪民主党风头正健，不知道民众对于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河村建夫：（公明党）虽然召集了几十个人，但是在国民中的支持率却仅有 1%。这也可以看出，国民对于在野党其实是不抱什么期待的。尽管发表的言论乍听起来气势十足，但事实上在野党内部也是零零散散的。一些比较有实力的议员以无党派身份参选，总体来看在野

党内部并没有实现有效的团结。

樊勇明：那么也就是说自民党现在依然是政权无虞的状态？

河村建夫：不过政权内部曾经已经有过交替了。结果还是看总裁选举吧，总裁选举中谁能正大光明的获胜谁就执政。

樊勇明：只是自民党内部谁当选的问题。

河村建夫：在当选者确定之后再团结统一起来，这也是自民党的传统了。内部竞争的时候毫不退缩，等选举结果出来了之后便重新团结起来。

樊勇明：小泉进次郎作为下一任自民党总裁的呼声很高，您对他有什么看法呢？

河村建夫：在民众当中人气非常高。国民舆论调查当中支持率仅次于石破位列第二，甚至一部分的统计当中小泉的支持率还超过了石破。

樊勇明：但是在我看来，如果小泉当选自民党党首，恐怕失言、胡言的问题不会少吧。

河村建夫：他毕竟还年轻，也没有担任大臣的经验。自民党有意让他进入内阁，在逐渐积累政治经验的过程中，将他培养成下一位党首。不过在我看来他倒是很好的继承了父亲小泉纯一郎的优点，发言也很恰当，虽然有一些年轻冲动之处，但总体来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在领导和组织能力方面也相当出色。

樊勇明：我冒昧地问一句，您的前任——石破怎么样呢？他还年轻，是否有做首相的想法呢？

河村建夫：他确实有这样的想法，这一点我们也都清楚。但是他在党内只有一个小团体，人数和实力也止步不前，这可能是他目前所面临的一个困境。不过只要慢慢积累政治经验，想必知名度也迟早会上升的。不过现在看来，小泉的人气要更高一些。如果小泉进次郎与他联手，认真谋求参选的话，那么形势可能又会发生一些变化了。

樊勇明：我曾经一度以为现任东京都知事的小池百合子，会与自民党合作成为日本的首位女性首相的，现在这种可能性还存在么？

河村建夫：完全没有了。之前小池百合子牵头建立的政党现在分崩离析，在那之后她几乎就已经被排除在了角逐名单之外。现在小池百合子主要专心于东京都的政务，而不太过问国政了。

樊勇明：不过归根结底，枝野，（）这些人原先都是自民党阵营的呀。

河村建夫：从前确实是这样。但是枝野的情况又有点不同。

樊勇明：立宪民主党中有不少原先都是自民党的领袖，那么它将来再次被自民党吞并好像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啊。

河村建夫：那倒还不至于。日本采取小选区制，初衷正是为了避免像美国那样两大政党政权交替所引发的巨大政局动荡。国民能够根据各党的施政纲领，安心选择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家领导人。可惜在我从政的 28 年的经历中，政权就已经更迭了两次。

樊勇明：94 年宫泽和之后鸠山的时候对吧。

河村建夫：两次都是自民党内部分裂以及大选落败的时候。所以在野党要想获胜还是得在大选之前团结起来达成一致，这可能才是在野党的唯一出路。

樊勇明：按现在的情况看，联合一致可没那么容易啊。（笑）今天感谢您在百忙之余接受采访，还陪我聊了这么久。先生对上海论坛有什么期待或者寄语么？

河村建夫：我第一次出席上海论坛，深深感受到论坛放眼全球的格局之大。（除了中日是世界第二、三大经济体之外，）韩国的经济实力也位列世界第 11 位，因此中日韩三国应当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看到今天与会的各位代表、各种各样的地方机制，我觉得日本应该对上海论坛给予更多的重视。上海的日企有不少都出席了，那么日本的企业是否有可能成为论坛的赞助方？我觉得这样的模式值得期待。如果论坛能够发挥倡议、引导的作用，那么我想日本一定能够在论坛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对于论坛与日本相关的举措我可能会做更加深入的了解，然后尽我所能地提供合作和协助。如果日本能更多地参与，那么我相信上海论坛的对话和交流一定也能够进行的更加热烈。

樊勇明：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也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扩大和日本交流合作的范围。今后也请多多关照。

新发展陷阱、新发展理论和增长

编辑：余慧艳



Luiz Carlos Bresser- Pereira
巴西财政部前部长



采访人：**Sergio Suchodolski**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战略合作关系局局长

*「经典发展理论构建基于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背景之下而非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新的发展理论。汇率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和跨国企业的发
展非常重要，避免新发展陷阱需要超脱信贷规则。」*

Sergio Suchodolski: 欢迎来到上海论坛 2018。我是主持人 Sergio Suchodolski，是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战略合作部的总干事。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巴西前财政部长、联邦行政和国家改革部长以及科技部长 Luiz Carlos Bresser- Pereira 担任嘉宾。十分荣幸今日有机会一起共谈。

Luiz Carlos Bresser- Pereira: 我也十分高兴能在这里开展交流。谢谢。

Sergio Suchodolski: 昨天我们已在论坛开幕式以及圆桌论坛上听取了您发表的两场演讲。您在演讲中强调重视本币贷款。您也是多边开发银行本币贷款的倡导者之一。根

据您 20 世纪 80 年代担任财长的经验，拉丁美洲国家一般都会直接处理外债危机，或通过布雷迪债券和其它担保形式加以处理。您能同我们讲述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吗？以及您为何倡导这一调节工具？

Luiz Carlos Bresser- Pereira: 80 年代的这场金融危机十分严重，此后的十余年各国方从中恢复元气。也就是说在这十余年间，巴西的经济发展低迷。而在此前的 20 年，巴西的经济增速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当时能够赶超巴西的国家可能仅有日本。而这场金融危机打断了我们的增长。为什么说是这场金融危机呢？因为我们当时诉诸外资手段。在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大部分国家都在试图调整经济方针。但巴西政府没这么做，也认为在这样的增速下不会有何大问题。我们有模型做预测，所以我们诉诸外资来解决问题。当然结果不尽如人意。当时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投资的长线化和基准利率。哪种形式能让内部收益率超过利率？这个还可以，看起来很合理，但这是假的。因为其中包含宏观因素。对于企业来说，这其中只有汇率风险，是讲得通的。但是对于国家来说，情形截然不同。经济发展低迷是关键。汇率会发生何种变化？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国家决定增加国外储蓄，如果他们不能像世界上除了东亚的绝大多数国家地区那样处理信贷，你应该考虑诉诸本币手段。因为你若要偿付债务，你就要顺应资本流动。而这种情况要求资本流入长期大于资本流出。而汇率也同样地要被高估，也即超额货币供给。这对国家来说并不好，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不再以竞争或者说技术进步推动自身发展。

Sergio Suchodolski: 这十分有趣。要知道我们近几年见证了创造性的改变。首屈一指的就是创生，一系列中等收入国家的产生和类似金砖国家这样新兴市场的诞生。这些国家通过过去十年的努力在经济体量上远远超过了我们昨天圆桌上所讨论的一些国家。他们合力推动着国际秩序和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发生变

革。这是为了让设计顺应他们自身经济体的发展，建设体现自身利益、符合自身需求的国家。他们决定成立新的机构，所以我们也看到了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和亚投行的出现。你如何看待这些机构的产生以及他们的未来发展？您可以结合自身的任职经验从财政、改革、科技三个视角谈谈吗？

Luiz Carlos Bresser—Pereira: 显见的是增长源于投资，而投资有赖融资。企业不会凭空有钱来投资，融资是必要的环节。而对于这些银行，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首先要做的还是融好资。若某个国家没有如期达到信用水平，可借本币贷款或外币贷款。但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国家由于政策没有信贷。如果真是这样，需求产生了，国家就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或决定提高准备金。这就是中国所做的，中国也由此收到了大量国外的直接投资，但这就造成了账户盈余。所有的钱又流出去了。上面提到是经济金融视角。而科技视角则更多关注制造业的生产力。而目前很多跨国公司的业态并不具有竞争力。他们不投资也算情有可原。因为他们面临的汇率也无法赋予他们竞争优势。我将之称为新发展陷阱。巴西经济正身陷其中。我们得了解你该怎么做。当然我知道巴西与中国不同，所以我们期待中国的做法，一个超脱信贷规则的东亚国家的做法。

Sergio Suchodolski: 恰好谈到新发展陷阱，也结合您昨天发言时谈到的经历，您被第一波发展中经济体大潮深刻影响，并受到他人的启发。您能同我们进一步谈谈新发展理论吗？

Luiz Carlos Bresser—Pereira: 我就结合这点对之前的问题再作一些回应。与新发展理论相对的是经典发展理论。这个理论的主要论调是国家有赖工业化发展，而国家也须达到中等规模且运行有效才能推动工业化。这与新古典主义学说相悖。到了六七十年代，学说本

身也不是什么新的贡献。但变化来了，欧美的自由主义兴起，而像世行这样的国际组织也不受理论的指导约束，不按套路出牌，发展几乎被遗忘。而时新的主流是众人所言的改革将带来增长，增进福祉。不过，这显然是假的。我们明显需要一个新的理论，因为当时的理论构建于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背景之下而非发展中国家。

另外的特别之处是在拉丁美洲、非洲、东亚投资都会面临荷兰病，汇率因某一初级商品出口而被高估。所以我们总结出几个原因并由此形成一些想法。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宏观经济的五大指标，即汇率、利率、工资率、通货膨胀率和利润率。它们是对的，但市场扭曲了它们，所以你还是得调控它们。这个理论并未放弃传统的产业政策，但它更主张宏观经济本身比产业政策更重要。我们考察韩国或者中国就能认识到产业政策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在此之前，五项指标一般都是准确的，因为政府发展得很完备并有能力管控各项指标，特别是汇率。这会促进竞争，促使企业投身技术进步。若上述指标是自由浮动的，那将增加外汇储蓄。这对本币有利。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政府应如何管理此类政策？央行的存在是因为国家意识到他们需要管控利率和通货膨胀率，而工资率直接受到行政方管理的影响。国家真正需要的是管控利率。为此，你需要一个委员会负责此事，在政策和央行职能上做决策，并对之负责。这是一个与央行类似但独立的机构，来制定汇率政策。相关政策的制定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要中和荷兰病，可以通过出口税对该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产生影响。第二，你要放弃两种错误的观点。增长并不与储蓄划上等号，增长更不是当前账户的赤字。因为赤字意味着潜在的通货膨胀。第三，你要管控好资本。资本管控虽不是首要的，但也是第三重要的，这是必要的。做到了这三件事，我认为国家就能管控好汇率，并形成良性态势。如此，投资与增长是相辅相成的。在这种情形下也可说增长和汇率是相辅相成的。

Sergio Suchodolski: 您会担心影子市场吗？我的这个问题与我们圆桌论坛的一位参与

者的研究有关，他以中国为例研究了影子银行。您会担心自己的论调给外汇蒙上影子银行的色彩吗？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Luiz Carlos Bresser- Pereira: 我并不是主张固定汇率制。汇率仍将是浮动的。我更多主张是施加税收，这将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黑市场往往由于固定汇率产生，若失去了这个先决条件，它便没有理由产生。

Sergio Suchodolski: 我相信也有很多来自复旦大学的学生正观看着我们的视频，我们举办的是一场十分国际化的大会，我也知道有很多从世界各地来到复旦求学或者上海工作的国际人士。您有哪些创造性观点想要同他们分享？

Luiz Carlos Bresser- Pereira: 我觉得他们都可以学习一下新发展理论。我将著述发布在了网上，它们绝大部分是用英语写成的。我非常欢迎学生朋友们来我的个人主页获取我著述的相关原文及信息。

Sergio Suchodolski: 对于这次中国行，您感觉如何？您有什么收获想要带回巴西吗？

Luiz Carlos Bresser- Pereira: 我在中国不会逗留太久。十分感谢主办方的款待。对我来说，复旦大学为中国和参加圆桌论坛的各国代表都呈现了一场圆满成功的大会。我十分高兴，我也将于明日启程。这对我来说是次难忘而愉快的经历。

Sergio Suchodolski: 再次感谢您接受采访！

基础设施在地区发展和地区一体化的作用

记者：钟雪莹



Naoyuki Yoshino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院长，日本庆应大学名誉教授。

「良好的基础设施可以在项目周围形成巨大的溢出效应，促进区域合作和一体化。亚太地区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很大，为了更好地为基础设施融资，世界范围内的多边开发银行应共同努力，同时应通过和私人投资者明确公私部门之间的风险分担并返还部分溢出效应带来的税收来吸引更多私人投资。」

记者：在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开行）发布的《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 2017》中提出了六个评估区域合作与一体化的指数，比如贸易与投资、基础设施与连通性、人员流动、金融和财政政策等。 您认为其中哪个维度对区域合作和一体化最重要？

Naoyuki Yoshino：所有这些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落后会影响整体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限制了本来利于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相反，良好的基础设施会为项目周围的区域带来巨大的溢出效应。例如，铁路可以促进人员流动，也可使制造商和农民的产品运输更快捷。中小企业可以在该地区发展，进而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就业。最后，餐厅和酒店等服务性企业将建成以满足该地区日益增长的需求，资金流、地区税收都会增长。良好的基础设施还可以促进区域连通性，比如铁路特别是跨境铁路，联通的不仅是一个国家，

而是在沿线的所有国家，这样可以促进区域合作和一体化。

记者：支持亚太地区的区域合作与一体化是亚开行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 简而言之，亚开行采取了哪些行动？

Naoyuki Yoshino：区域合作与一体化在加速经济增长、减少贫困和经济差距、提高生产力水平和就业水平以及加强制度建设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推进贸易一体化、跨区域供应链和更强大的金融联系，它能缩小各成员国之间的发展差距，促进各成员国的共同发展。通过促进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项目让亚太地区更紧密的聚集在一起是亚开行创建以来的使命之一。

2006 年，亚开行公布了区域合作与一体化战略的四大支柱。其中最重要的是支持有关跨境基础设施和相关软件的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计划。首先，亚行在硬基础设施提供资金，比如道路，桥梁和发电厂。其次，软性基础设施的投资，例如教育。第三，我们向相关国家提供技术援助。除此之外，亚行另外三项区域合作与一体化战略还包括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合作与融合、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以及区域公共产品的整合与合作。

记者：中国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和亚开行类似，它也是一个旨在支持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多边发展银行。您如何看待亚开行与亚投行之间的关系，他们会成为竞争对手吗？

Naoyuki Yoshino：他们绝对不是竞争对手。亚洲在电力、运输、电信、水和卫生等方面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长期投资需求对于应对与人口老龄化和气候变化相关的挑战至关重要。东南亚地区每年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约为 400 亿美元，但目前的实际投资只有

约 80 亿美元。亚开行无法支撑全部所需的资金，亚投行也是如此。

两家银行有很多机会互相合作，包括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包括世界银行和开展合作，特别是在运输和能源等部门。这不是竞争性的领域，两行可以共同努力，以更好地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现在亚投行和亚开行之间现在有四个共同融资项目：孟加拉国的天然气基础设施和效率改进项目、巴基斯坦的高速公路项目、格鲁吉亚的道路项目以及印度的输电网络项目。例如，在巴基斯坦的国家高速公路 M-4 项目，该项目将建设 64 公里长的高速公路（绍尔果德与哈内瓦尔段）。这条连接南北的公路对巴基斯坦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被预计能带来丰富的新的贸易和商业机会。项目总成本估计为 2.73 亿美元，由两行共同出资。

记者：您在演讲中提到，尽管有多边开发银行和政府的投资，但仍不足以满足亚洲基础设施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私人资金在基础设施融资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Naoyuki Yoshino：在亚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高速公路、火车和各种公共交通工具仍然缺乏，很多基础设施项目面临公共资金短缺的问题。为了满足他们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缩小投资需求与实际政府可支出之间的差距，私人资金必须投入到基础设施中。

利用私人资金发展基础设施还有其他好处，比如如果对成本和效率更敏感的私人投资者加入，他们会努力督促建设方按期完成建设任务、以最小的建设成本完成项目，并在项目完成后以最低的成本经营。近年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正越来越受到强调。

记者：在现实中，吸引私人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展并不顺利。在您看来，为什么私人投资者不愿意投资于基础设施？有没有什么措施能够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Naoyuki Yoshino：私人资金不愿意投资基础设施主要有两个考虑因素。一方面，他们

担心基础设施项目存在风险，包括（1）政治风险：项目完成前地方政府的政权更替可能导致停工；（2）施工风险：由于所有权结构复杂带来的土地获取困难或施工期延长可能产生额外费用；（3）汇率波动风险；（4）建成后可能效益不如预期导致带来的税收增长不如预期；（5）意外支出，例如环境政策变化导致其需要对噪音进行补偿

另一方面，尽管基础设施项目相关的项目风险很高，但预期收益率通常很低。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基础设施投资的溢出效应将增加来自企业、员工工资、销售和财产税的收入。但过去所有这些税收都是由归政府的，并不会作为基础设施的收益归还给投资者。事实上大多数 PPP 项目失败的原因都是因为基础设施的回报率最后只取决于用户收费，例如火车票价和高速公路收费，而这肯定低于总成本。

私人投资者希望避免可能的风险并获得收益。但是，风险和收益的现状和他们的偏好完全相反。为了吸引更多的私人资金，首先，必须事先明确政府部门与私营投资者之间的风险分担。否则，与基础设施相关的风险将使私人投资者不愿将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其次，溢出效应带来的税收增长应该部分返还给基础设施投资者。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需要长期的投资者。如果通过返还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产生的溢出税收入来增加基础设施的回报率，那么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会有更多的长期私人资本。

当前的公共资金不足以满足亚洲的基础设施需求，因此通过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和明确公私部门之间的风险分担来吸引私人投资者进入基础设施非常重要。

记者：如果由公共基金投资，基础设施更像是一种公共物品，可以为所有人提供费用合理或免费的服务。但是当私人资金被引入时，这个特征会被改变吗？您如何看待公私资金的理想占比？

Naoyuki Yoshino：我所说的外溢效应的并不意味着向用户收的价格应该增加。相反，

政府应该监管水电等重要基础设施价格，因为它们是使用费。用户使用的费用可能很低，但溢出效应带来的税收增加可以弥补这一点。例如，水电供应良好会使得整个区域发展加快，新的企业和部门会进入，经济增长速度会加快，生产力水平和就业率会提高，这将带来税收增加。私人投资的收益并不是来自于用户使用价格的提高，而是来自外溢效应带来的税收增加。

就公共和私人资金的比例而言，不同的部门会有所不同，并且随着时间的不同也会改变。当某一领域的预期利润不高或风险较大、私人投资者不愿意投资时，政府应该投入更多的资金。例如，政府可以先投资 60%，私人投资方则可以提供 40%。但是，如果利润变得越来越好，更多的私人投资者愿意投入他们的资金，那么这个比例可能会改变。相反，对于那些人口稠密和发达的地区，很多公司有兴趣投资，那么私人比例可以达到 80%，政府比例可以达到 20%。所以没有确切的数字，都要取决于未来的期望。

记者：您的演讲主题是关于基础设施投资对连接东西方地区发展的作用。您能否再具体一点地说明基础设施投资如何促进东西方合作？

Naoyuki Yoshino：东西方的开发银行可以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进行合作。例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和亚投行正在中亚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行合作。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对基础设施资金的需求是巨大的，世界银行、亚开行、亚投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或者说任何多边开发银行、政府都无法单独承担，所以开展东西方合作是有巨大意义的。此外，东西方之间可以分享有关基础设施的经验。欧洲拥有良好的铁路系统，中国也致力于发展亚洲的高铁。对于中国来说，如果欧洲体系有一些优势，那就可以借鉴。同时，如果中国的技术和技术更好，欧洲也可以从中有所学习。

记者：中日韩三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已经相对较好。对于他们来说，基础设施是否还是它们合作和一体化的重要因素？

Naoyuki Yoshino：当然，这三个国家还是有机会在三国或者其他亚洲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合作。但我认为东亚一体化最重要的是文化交流。过去，中国，日本和韩国分别把目光看向了不同的方向。即使我们都想与欧盟合作，情况是日本在与欧盟谈判，中国在与欧盟谈判，韩国在与欧盟谈判。欧盟始终是一个统一的共同体，对于东亚国家来说，我们应该像欧盟一样实现更大程度的合作与一体化，这样我们才会变得更强大。

我认为促进中日韩合作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比如高中生的交换项目，这样青年一代才能理解我们共同的文化。而且这个交流应该是持续的，交换结束后学生们还可以通过 Skype 或微信继续沟通，这将带来更好的思想交流。

记者：2019 年将是中日韩合作启动 20 周年。在经贸方面，三边自由贸易协定（FTA）自 2012 年开始谈判，但进展仍然有限。您如何看待东亚经济合作的困难？

Naoyuki Yoshino：自由贸易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但前提是人员流通自由、资金流动自由，一切经济活动之间都能流通自由，而事实并非如此。其次，各部门的发展速度各不相同。在金融领域，从一个产品转换到另一个产品很容易，并且可以进行快速调整。但在农业方面，农民不能立即改变产品，可能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开始自由贸易，所有的农民都会抱怨。

这两个维度解释了为什么理论说自由贸易是好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或者说需要时间。有赢家和输家，我们必须关注输家。如何弥补利益受损的一方对 FTA 来说非常重要。

记者：如同分论坛主题阐释中所说，美国的战略收缩和保护主义经济政策的复兴给全球化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您是否觉得欧盟和东亚国家可能在全球治理形成一股合力？

Naoyuki Yoshino：是的。美国过去是自由贸易的操纵者，但现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自由贸易是好的，但有输家。现在在美国，利益受损者占了很大一部分，所以特朗普已经改变了态度。但总的来说，自由贸易和自由贸易流动可以创造更好的局面，所以没有美国，东亚和欧盟国家应该继续努力。唯一我们必须记住的是，输家必须得到补偿。例如，如果几十年种水稻的农民发现米价突然下跌，他们会不满。所以市场的调整必须是渐进的，我们必须证明即使是输家，未来也有更好的机会，这非常重要。

埃塞俄比亚与中国超越经济合作的关系

记者：汤以诺



Berhane Gebre-Christos

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埃塞俄比亚国家馆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2010 至 2012 年间，他担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他也是 1979 至 1988 年间的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外交发言人。

「埃塞俄比亚对基础设施的关注为中国建筑企业创造了许多机会。埃塞俄比亚也是中国出口的一个重要市场，随着埃塞俄比亚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出口将继续扩大。对埃塞俄比亚来说，中国金融为其政府合法性提供了重要支持，因为电力、运输和就业机会的不断扩大，大大刺激了经济增长，有助于促进向其他国家的出口。与西方援助者相比，中国“商业即商业”的做法受到了更大的欢迎，而西方援助者则往往将援助与埃塞俄比亚的法律和政治结构变化相挂钩。」

记者：对您来说，埃塞俄比亚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有什么特殊之处？

Berhane Gebre-Christos：关于中国和非洲关系的问题很有趣。来自不同地方的人都对中国和非洲的关系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埃塞俄比亚位于非洲之角，是通往非洲的门户。多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加强与埃塞俄比亚的双边关系，埃塞俄比亚也是中国多个领域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埃塞俄比亚和中国利用悠久的历史，已经发展出了强大的双赢局面，两国关系达到了最佳水平。

记者：作为新任命的驻中国大使，您目前关注的重点是什么，以及您主要致力于哪些方面，来加强贵国与中国的战略关系？

Berhane Gebre-Christos：首先，我想强调的是“全面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即使有着非常强烈的关系，我还是想强调对两个政府的不同理解。其次，更重要的是，我正试图在中国和非洲之间创造更多的经济利益，更好地向那些非洲和中国的海外公司解释清双方的关系，并向他们描述好处：所有有业务往来的公司都会得到良好的发展。第三，我也十分注重教育行业。

记者：您在关注金融和经济发展的同时，是否还关注教育？

Berhane Gebre-Christos：没错。我们一直进行着文化联系，组织并向大家解释中国文化，同时也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国公众将对我们更加了解，并且我已经在多个领域尝试过了。

记者：从中国和非洲的关系来看，这其中有什么特殊之处吗？这为什么对彼此如此重要？

Berhane Gebre-Christos：这种关系真的很牢固。首先，埃塞俄比亚的发展增速与中国很接近，双方的经济增长都约为 10%。其次，通过合作，中国设计了合作框架，我们在产业上有很多合作。战略关系在社会、经济、教育、和平与安全等方面都非常强大。这就是全面的合作。埃塞俄比亚对基础设施的关注为中国建筑企业创造了许多机会。埃塞俄比亚也是中

国出口的一个重要市场，随着埃塞俄比亚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出口将继续扩大。而对埃塞俄比亚来说，中国金融为其政府合法性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因为电力、运输和就业机会的不断扩大，大大刺激了经济增长，有助于促进埃塞俄比亚对其他国家的出口。与西方援助者相比，中国“商业即商业”的做法受到了更大的欢迎，而西方援助者则往往将援助与埃塞俄比亚的法律和政治结构变化相挂钩。

记者：如今，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进一步推进两国双边合作的领域有哪些进步和成就，同时，推进进一步合作的过程中存在哪些障碍？

Berhane Gebre-Christos：首先，中国和埃塞俄比亚之间有很好的了解。其次，二者关系密切，合作将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已经定义了双方之间的战略关系，是一种全面的伙伴关系。这是一种可以进化和发展到更高水平的强大关系。因为相互尊重，互相帮助，所以这真的是一种很好的关系。

记者：你认为中国民营企业在推动埃塞俄比亚地方工业化进程中起到什么作用，以及政府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帮助他们面对这些困难？

Berhane Gebre-Christos：中国企业在这里很受欢迎。人们都欢迎中国公司和旅游者的参观。其次，埃塞俄比亚的投资在不断增加。从过去几年来看，投资额从 22 亿美元增加到了 44 亿美元，其中 90%都来自制造业。这意味着埃塞俄比亚的情况确实适合投资。我相信政府也会支持我们，再加上一刻不停的改革，最终将会解决所有的困难。

记者：那边也有欧洲公司，埃塞俄比亚与欧洲企业合作有什么不和谐的地方吗？

Berhane Gebre-Christos: 不，这并不算什么问题。世界各地有很多投资，它们之间相处非常和谐，互相帮助支持。一些生产到世界各地的产品，可能就是源于合作。

记者: 有很多公司是由中国和埃塞俄比亚共同支持的吗？

Berhane Gebre-Christos: 是的，来自中国和埃塞俄比亚的公司互相帮助、相互扶持。

记者: 面对非洲发展诉求的呼声，中国可以怎样改变我们对中埃合作的看法？

Berhane Gebre-Christos: 现在有很多政治活动正在持续发生。在文化方面，中国通过社交媒体向埃塞俄比亚展示了文化，埃塞俄比亚也是如此。这可以更好地理解为是一种政治的文化交流。

经济上，我们一直在共同努力创造更高的投资数额。埃塞俄比亚的航线已经在中国的 5 个城市里建了起来，中国也建立了到埃塞俄比亚的航线。因此，双方存在着大量经济互动，我们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将会持续增长。在和平与安全方面，我们共同守护和平，并互相支持。这种关系是综合的，是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

记者: 为了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请您与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看法，非洲其他国家可以如何借鉴中国-埃塞俄比亚模式？

Berhane Gebre-Christos: 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的。这是其一。第二点，埃塞俄比亚直接受益于合作，为经济提供了光明和道路。所以这是一种双赢局面。

记者：您愿意根据非洲国家的实践来说明您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吗？

Berhane Gebre-Christos：我们已经点明了埃塞俄比亚需要如何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把经济、文化转化为一种产业。我们必须建立基础设施。我们有数百万学生和 50 多所私立大学，还有 100 多所公立大学。所以我们必须独立设计所有这些。

记者：你认为埃塞俄比亚在非洲联盟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Berhane Gebre-Christos：埃塞俄比亚在非洲联盟里是活跃的，非洲联盟总部在埃塞俄比亚，我们负责主办非洲联盟。不管非洲联盟如何决定，埃塞俄比亚都是其中的一个忠实成员。埃塞俄比亚在非洲的安全和维和问题上非常活跃。埃塞俄比亚在非洲维和方面位列第一。对于非洲联盟，甚至对于全世界，埃塞俄比亚为联合国和非洲联盟贡献的维和人员是最多的，所以埃塞俄比亚正在为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披荆斩棘，履行其责任。埃塞俄比亚一直尽可能地为非洲大陆作出贡献，并试图在全球问题上获得共同的声音和共同的理解。这样一来，非洲就有了相同的声音和立场。

记者：你认为埃塞俄比亚能做些什么，从而让更多的非洲人民熟知中国是他们的朋友并且总是愿意提供帮助？

Berhane Gebre-Christos：这种帮助并没有增加，中国和非洲的产业并不是新建立的。中非关系在上世纪 50 年代，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中国作为非洲人民的朋友支持其独立。中国只需要维护这种关系即可。

记者：您对促进南南合作有何建议？

Berhane Gebre-Christos：可以说，论坛，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论坛一直是南南合作的关键。在中国和非洲的重要合作计划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因此，“十大合作计划”必须在即将到来的论坛中得到升级。我认为，维系中非关系的主要工具是中国南南合作。

记者：请用三个词来描述有效的国际发展合作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的特征。

Berhane Gebre-Christos：我认为他们应该关注于问题、缺点的解决以及非国家的发展。首先，他们必须关注数百万的结构体系。其次，他们必须注意生产能力。第三，他们必须关注内部农业的发展。所以我会说基础设施、工业化和农业，这就是三个最为关键的特征。

记者：请您谈谈我们对“中非关系走向共同繁荣”这一主题的认识。

Berhane Gebre-Christos：当他们想要繁荣世界的时候，应该意识到，人们对生活的看法各不相同，同时，人们值得拥有他们所有的以及脱离现有状况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地球做出非常积极的回应。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政府拥有这样的国际性能力，解决好气候变化、SDGs 以及可持续发展。我认为中国和埃塞俄比亚的合作、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合作是令人鼓舞的。我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为实现这一国际目标作出贡献。我认为这会使我们感到艰难，一个遗留下来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将造福下一代。所以，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非常重要。

记者：埃塞俄比亚在为可持续发展目标争取 SDGs 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Berhane Gebre-Christos：我们在埃塞俄比亚的问题是要建立一个政策独立的国家，一个人民过着体面生活的国家，那就是可持续发展盛行的地方。所以我们已经使用了所有的程序，完成了所有的项目、策略和政策，也实现了我们五年前设定的世界目标。因此，开发的这些项目、战略、计划和政策，完全能够满足 SDGs 计划的需要。因此，我们已经有效地实施了可持续发展计划。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与对非投资的挑战

记者：彭斯越



Jonathan Woetzel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董事，麦肯锡咨询公司上海分公司资深合伙人。他领导了对中国、亚洲、全球经济及商业趋势的研究。他帮助许多地区和城市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并支持了中国企业转变为全球领导者。

「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中国可持续性发展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要影响。中国在诸如城市化、人工智能等发展问题上取得了成就，但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对于中国对非投资过程中遇到的挑战需要投资者、智库和政府多方的合作去克服。」

记者：如今，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您能谈谈中国目前面临的城市化挑战吗？您对近期的预测是什么——是否已经取得了足够的进展，或者污染仍然是维持当前经济增长水平所需要的必要妥协？

Jonathan Woetzel: 中国已经从过去的环境破坏中吸取了教训。2014 年生效的新城市化计划就是为了净化中国环境，降低 PM2.5，提高燃料标准，在城市中增加绿色空间，改善水处理等。然而，同样需要注意的是，修复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环境问题花费巨大。太湖就是中国所面临的挑战的一个例子。

中国的领导层非常明白持续改善当前环境的必要性，并且根据现有数据，每年都取得了积极进展。总的来说，中国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但是市场经济的性质导致了政策的执行面临一些意外挑战。例如，没有形成规模的小型制造商因为遵守环境法规的成本更高需要面临更大的压力。因此，他们偷工减料的动机会更强烈，比如不安装最新的设备、倾倒垃圾等等。这取决于政府的执法情况——通过确保信息清晰可用，并进行强有力的监控、核实和检查以保证政策的执行。确定任务的优先次序很重要，其原则是应首先针对最严重的问题，例如水质、土地和垃圾处理、重金属处理和有毒空气质量。

记者:作为旨在制定和实施应对中国城市化挑战的解决方案的“城市中国计划”(清华大学和麦肯锡的合资企业)的共同主席，你们共同推出了城市可持续性指数(通过基本需求、资源利用率、环境健康、建筑环境和对可持续性的承诺五个主要方面反映城市可持续性)——该指数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Jonathan Woetzel: 城市可持续性指数是为了衡量经济发展的质量。指数中包含的因素需要与经济发展进行比较，例如人均 GDP。它反映了一个地区在一定数量的经济发展中，无论是好是坏，所获得的社会和环境利益。该指数有望通过多个方面反映出受益情况。该指数定义了各种方面的受益情况，例如，人均医生人数、教室数量、空气和水的污染物水平，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如公共交通的质量和可用性。还有一些新的好处，如数字信号普及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这些都有助于生活质量的提高。

记者:您在 2017 年阿里研究院组织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了人工智能的应用。请您从整体发展的角度，谈谈中国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它的弱点是什么？

Jonathan Woetzel: 从商业和客户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第一个优势是其巨大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市场。它的需求巨大，全世界人工智能行业的人都对这个市场感兴趣。第二个优势是它的公司。中国有许多资金雄厚的技术公司，可以开发解决方案。BAT（百度、阿里、腾讯）很重要，但它们不是市场上唯一有竞争力的玩家。中国平安和其他人也可以做人工智能。第三个优势是对人工智能感兴趣并愿意花钱购买人工智能的监管部门。此外，中国允许并鼓励政府部门，如警察、住房和城市管理部门以及私营部门使用人工智能。

然而，挑战同时存在。中国仍然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和专家。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前 100 名研究人员中，近 50 人在谷歌或硅谷的其他公司工作。为了解决人才短缺的问题，中国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吸引全球人才，因为在未来，人工智能是全球的，而不仅仅是中国的。

记者:是什么因素导致中国对全球人才吸引力降低？如何改变现状？

Jonathan Woetzel: 全球的人才很难留在中国定居。他们的签证限制了他们在这里定居和工作的时间。他们获得社会福利的机会有限，孩子在这里接受教育的机会更少。现行制度阻止了人才来到中国。中国可以改变它——它的政府和公司可以改变它。如果政府愿意，这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的，这些变化对于吸引外国人才和专家来中国非常重要。

记者:国有企业（SOE）会在改变当前的动态中发挥领导作用吗？

Jonathan Woetzel: 国有企业不应该是唯一需要改变的地方。国有企业涵盖国家战略领域和利益；因此，它们并不总是创新的最佳场所。然而，也有例外，比如中国世界领先的强大智能电网项目。然而，大多数时候，私营公司是发生改变的最佳场所。他们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对国际人才是否更加开放，并在商业和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引入新的创新实践。

记者:公众情绪对人工智能的似乎很紧张,很多人开始担心人工智能不久后就能完全接管他们的职业和工作。您如何看待公众情绪?

Jonathan Woetzel: 人工智能是增强人类能力的一种方式。就是说你有可以停止用老式的方式做事潜在可能。你不再需要做那些重复的工作,你会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做一个人。你打算如何利用空闲时间是人工智能提供的机会。人工智能是一种选择,市场经济中的客户将决定他们是想利用人工智能还是保留传统方法。许多无聊和重复工作的消失将是必然的。人们必须更有创造力才能保持竞争力。有些人会对此感到自信,有些人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发现人们创造力的极限。

记者:在之前的演讲中您谈到了中国投资者对非洲金融部门的投资,包括贷款。当我听到贷款时,我本能地想到了信贷调查。中国现有的数据库允许实施更复杂的信贷调查,但是由于缺乏基础设施,信贷调查和贷款系统将如何在非洲发挥作用?

Jonathan Woetzel: 直到最近,中国依然没有一个信用体系,事实上,尽管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更全面的体系,但它仍然没有一个广泛使用的信用体系。事实上,任何市场经济都有一个信用体系。中国会有的,这只是时间问题。这种信用体系无疑将包含人工智能。我们将会看到人工智能是否有助于分配资本,并为可能使用资本的人提供信贷。真正的考验将在小企业身上,因为大公司和国有企业在融资选择方面的挑战通常较小。

而这个人工智能驱动的信贷系统已经出现了。大型数字平台已经提供了各种金融工具。其他形式的小额融资、支付和贷款正在通过 P2P 平台发展。一个增加融资选择类型和可用性的令人期待的实验已经开始实施。中国的银行体系在向大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公司提供资

本方面一直很有效，但对小企业来说用处不大。总的来说，这个系统有用，但是效率低下。过去，已经有由于过度刺激高优先级部门和国有企业产生的银行危机。中国意识到了金融风险，并已经通过重组债务来有效应对危机。现在，中国希望利用技术优势确保投资者意识到风险，并确保企业能够合理获得资本。

记者:中国在非洲国家的存在感迅速增加，公众情绪经常反映出某种程度的担忧和惶恐。您认为这种令人惊慌的公众情绪是潜在的障碍吗？如果是这样，中国投资者如何克服公众情绪？

Jonathan Woetzel: 非洲国家曾经是殖民地——被西方资本和传教士的影响所接管。因此，是的，以他们的角度来说，他们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没有资本就很难发展。此外，外国资本是有用的，但并不能满足他们的发展需要——只有国内资本才是真正的长期资本。因此，任何外国投资倡议要取得成功，都需要当地的贡献。这意味着应该通过与中国企业合资的形式在非洲建立伙伴关系。地方政府应该期待合资企业的出现，并制定相关的监管政策来引导外国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但是接下来就轮到中国投资者决定他们是否愿意这样做了。

记者:前面的发言者提到了智库在地方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可能发挥的潜在作用。请问地方政府将智库纳入系统的有效方法是什么？

Jonathan Woetzel: 咨询公司和独立顾问总是可以发挥作用的。例如，孔子是一名顾问——他去不同的国家，通过与国家元首交流来传播他的教义。他在一些地方工作，但并不会太久。智库是否发挥作用取决于它们的工作质量。在中国，研究质量不够可靠，因为它缺乏

定量的严谨性，所以质量必须提高。很多时候，这是由于缺乏数据和独立分析思想不足造成的。这项工作有时会出现重复，毕竟，智库是由人组成的。你得到的人要么来自学术界，要么来自政府，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能来自公司。确保最高质量的思考与现实世界的经验相结合应该是任何中国智库的目标。总的来说，中国的智库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他们的工作质量需要提高。

记者:您提到了中国政府为正在向非洲市场扩张的公司制定“商业责任指南”的重要性。

请您预测一下在实施过程中会出现什么问题？严格政策的实施会不会对本地化产生不利影响？

Jonathan Woetzel: 指南旨在设定一个标准。实施方面的困难不应妨碍标准的制定。中国的监管方式应该规范结果，且必须明确哪些是不可接受的。贿赂、违反健康或安全条例的行为都不应被接受。例如，健康和安全的定义可能会这样说，以某种方式经营业务的风险会使员工面临比竞争对手更大的健康和安全风险。如果在中国，环境污染是不可接受的，那么中国公司没有理由不在国外采用同样的标准。或者是某些种类的设备 and 实践活动由于太过危险和肮脏不允许使用等。这又回到了执法问题上，这将取决于政府的监管和核查工作。

变化的格局：联合国和新的国际发展组织

记者：郭琪



Ramu Damodaran

联合国新闻部外联司主管伙伴关系与公众参与方面副主任

[随着发展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新的挑战 and 机遇正在不断改变国际机构间的格局。联合国以及现有的新的国际发展组织应该促进合作，适应世界不断变化的动态。]

记者：如今，国际发展组织正随着对其融资和服务需求的增长而蓬勃发展。但是，新的挑战要求采取更加灵活有效的多边应对措施。然而，一些有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多边主义正在倒退，而新的迫在眉睫的挑战要求采取多边行动，英国脱欧就是明证。面对这种新的挑战，您有什么建议让国际发展组织更好地调整自己？

拉姆·达莫达兰：退出多边主义意味着什么？一种可能性是，他们正在创建更小和重叠的群体。有些国家集团属于一个团体，另一些则属于其他团体。有些甚至同时属于两个团体。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正在远离联合国。服务于自身利益的机构同时也承担着联合国更多的义务，尤其是在这个可持续发展时代的今天。

多边主义包括人们是否应该承受比他们自己更大的全球法律管辖。这是一些机构正面

临并试图摆脱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否愿意为一些普通而伟大的事业向前迈进一步而做出让步，特别是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我的看法是，我们必须减少对过程和程序的关注，而更多地关注最终结果。

记者：昨天您引用了习近平的讲话，他说在国际发展组织中应该由“平等的伙伴关系取代捐助者和受赠者的关系”。但是捐助国和受赠国之间仍然存在分歧。在较大的多边开发银行中，由于捐助国占主导地位，其政策通常也会遵循捐助国的优先事项，这不一定符合受赠国的最佳发展目标。您认为我们如何才能实现“平等伙伴关系”的目标？

拉姆·达莫达兰：有两个方面。一是让每个国家都参与到游戏中这一点至关重要。例如，联合国有一个由五个常任理事国组成的安全理事会。他们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大的权力。但我们的目标是让大家能发表自己的意见。联合国这一机构的创建是非常艰难的。这五个国家选择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保证了他们更大的权力。因此，人们必须不断权衡近期目标和长期目标。

第二点是，各国必须认识到，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最终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捐助者和受赠者”。迄今为止，国际发展援助的模式是，你应该尊重向欠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或服务的道德正义。但是现在这变成了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国家和公司需要市场，平等就是这样失去的。因此，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意思是，任何基于等级制度的伙伴关系都注定会失败。

记者：近年来，有两个新的多边开发银行(MDBs)：中国领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新开发银行。他们将如何与现存的相关机构共处正在激烈的争论中。美国的

政策制定者尤其担心地是他们会削弱现存机构的影响力，因为他们已经在如今的格局中保持了几十年强有力的领导。您认为这对不同的国家意味着什么？新的多边开发银行如何与现存的竞争对手们合作和协调？

拉姆·达莫达兰：根据我的研究，我认为人们根本不应该感到受到威胁，因为实际上越来越多的机构成员远比一个成员更能使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此外，合作的方式已经确立，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于 2016 年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以解决世界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去年，世界银行还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签署了国际发展融资合作谅解备忘录。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正在合作的新机构的出现。并且在昨天的圆桌会议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红十字会（Red Cross）和世界卫生组织（WHO）一起分享看法也意义非凡。为什么我们需要所有这些国际机构？很容易看出，这些机构都是针对一个基本领域的。一旦这些组织开始工作，将不可避免地出现重叠。他们将试图通过非正式的或书面的谅解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只要有两个原则保持明确，我不怕越来越多的机构出现：一个是它们彼此不矛盾，另一个是它们积极寻找可以合作的领域，并使合作正式化。

记者：几天前，肯尼亚成为最新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国家，目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共有 86 个成员国。但是，美国和日本等主要国家仍然不愿意加入，而它们都加入了亚洲开发银行（67 个成员国）。许多人认为中国在多边开发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中不断增长的实力是潜在的威胁。您对中国的影响力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未来有何看法？

拉姆·达莫达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协议明确指出，该机构的宗旨是促进可持续

经济发展，创造财富，促进区域合作和伙伴关系，应对发展挑战。因此，很明显，当这一目标实现时，中国将在这一领域产生冲击。但是无论需要做什么样的平衡，我们都必须确保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总体目标得以实现。

谈到肯尼亚的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一次作为一个国际机构所宣称的区域目标已经完成。第二，我认为我们必须摆脱基于谁是不是谁的成员来看待国际机构信誉的思维模式。事实上，在最初的 25 年里，人们认为联合国不可信，因为世界上一些大国不是它的成员，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如此，它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并回顾了这些成就。因此，上述两个国家可能有自己不成为成员的原因，但另一方面，至少已经有 86 个国家成为成员。我认为我们中没有人能真正预测国家政策。只要该机构的宗旨和非成员国的承诺是一致的，这就不应该是一个问题。

记者：在演讲中，您提到了亚洲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责任是“在行动中保持力量”。

然而，亚洲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所以理论上我们没有其他大陆那么强大。我们如何才能让别人听到我们自己的声音，让自己在世界其他方面真正得到认可？

拉姆·达莫达兰：如果亚洲在解决自己问题方面显示出足够的能力，并且其中的国家能够独立运转或者与其他国家或机构合作，那就证明了它是一个强大的大陆。我试图说明的是一个在智慧或文化意义上更有价值的大陆。因为当人们想到亚洲时，我们会想到像孔子和甘地这样的伟人，或者伟大的京剧和印度舞蹈。这就是我们的想象，我们不会知道这是强有力的政府和他们的人民一起行动的结果。我认为亚洲人口最多且最伟大的国家——中国和印度——正在为此树立榜样。他们展示了你可以拥有丰富的文明、文化和历史遗产，但是你也可以在当下和人民一起奋斗。这也有助于亚洲的其他国家，他们开始表明自己的立场并采取行动，那么即使亚洲目前不是最强大的大陆，你也能够拥有这种力量。

记者：您还在演讲中提到“联合国不是一个演员，而是一个舞台。”“但是我们也看到强大的国家绕过联合国，为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采取行动，或者只是决定他们不再想参与一些联合国活动。您能进一步解释一下在国际发展背景下这对联合国意味着什么吗？

拉姆·达莫达兰：什么是舞台？舞台就是一个物理空间。就演出或戏剧而言，舞台是演员可以表演的地方，这意味着在舞台上只有扮演着角色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联合国有 193 个国家在其中扮演了角色。但是观众中的任何人也可以跳上这个舞台。前提是那个人受到演员的欢迎，他才可以成为剧中的一员。这就是民间团体、学术机构和多边开发银行正在国际发展中所做的事情。这就是我对这个舞台的看法，一个允许你表演的舞台，同时也允许一些人的远离和观望。它允许其他人进来，如果他们不受欢迎，他们可以离开。这就是我试图推进的隐喻。这是个舞台具有吸引力。

记者：在圆桌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位特邀发言人提到了官僚主义如何阻碍联合国履行其首要和紧迫的职责，所以说，联合国的内部问题正在使人们质疑联合国的效率和问责机制。您如何看待联合国内部运作协议与其能力之间的关系？您认为为了更好地帮助世界，联合国需要改革吗？

拉姆·达莫达兰：人们觉得任何政府或行政机构都是存在官僚主义的，他们认为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国政府和联合国必须承担责任，但是因为它们是由人类管理的，它们必须制定冗杂的程序。人们常常为此感到沮丧。举一个今天早上刚刚发生的例子。我们在谈论人们如何在联合国找工作，因为我们是一个官僚机构，雇用人员的过程平均需要 9 个月。为什

么？因为在每个阶段，你都必须对你将与之共事的人感到满意。你有 3000 名候选人，而你要把它降到了 500 人。这个漫长的过程是为了确保你不会在某个地方犯错。然后你必须向申请这些工作的人解释。所有这些工作最终都是为了确保过程和结果是公平的。我认为，如在紧急人道主义或维和任务的情况下，我们确实需要做的是确保在目标没有得到适当执行的情况下，所花费的时间和官僚主义能够真正减少。如果招募维和人员去已经爆发战争的地方需要 9 个月的时间，那么当他们到达那里时，他们可能已经没用了。我只想说，联合国必须不断努力使自己反应更加迅速。如果成员国能够提供更多整装待发的帮助，那将会更好。

联合国已经在改革。讨论中有三项重大改革，一项在政治和维和方面，一项在发展方面，一项在管理方面。在事情变化如此之快，情况如此难以预料的 21 世纪世界中，你必须不断确保你能迅速做出反应。这需要改革。如今，被打破的规则，如果你能证明它们是出于良好的目的而被打破的，而没有任何不幸的结果，也许它们就不应该继续存在。

记者：在发展问题上，除了多边开发银行，还有多个参与者，包括非政府组织（NGO）、世界银行、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等。一些人说非政府组织没有多大帮助，而另一些人认为他们被低估了。您认为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发展问题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它们的特殊之处是什么，也即它们能做什么，其他类型的组织不能做什么？

拉姆·达莫达兰：不同于非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一些非政府组织做了出色的工作，使它们与众不同的是，它们在政府之外是伟大的，但是它们的目标和宗旨同时也是政府的，例如清洁城市、健康、经济发展和妇女权利。所有这些都是政府尝试过的，但有时却无法独自实现。这是非政府组织介入并填补缺口的时候。也有一些非政府组织想参与这项行动，但却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他们的存在仅仅是因为他们建立了自己。所以非政府组织有好有

坏，不能一概而论。我认为来自联合国的人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不可能单独完成我们正在为世界做的事情。它需要政府、多边开发银行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现在，这样的支持已经存在。在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关于气候变化和妇女权利等已经成为现实的政治问题。像艾滋病规划署这样的联合国机构的真正启动是因为非政府组织的功劳。我们的秘书长最近表示，中国是多边体系的中流砥柱，但也必须记住，这个中流砥柱的背后是中国的活跃民间团体中的学者、思想家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

稳定始于国内：欧盟与中国的未来选择

记者：向晨



Rainer Klump

现任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应用经济学与国际经济政策系经济学、经济发展与一体化专业教授，欧洲一体化与国际经济学威廉·莫顿中心（Wilhelm Merton-Center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联合主任，卢森堡大学的前任校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无疑是国际货币关系领域的一个重要机构。但是，中国在IMF中的作用可能会有所增强。同时，尽管欧元在该机构中的份额下降，但欧洲仍应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我认为，支持中国提出的提高其在IMF中的份额的要求甚至也是欧洲的利益所在。意大利的债务问题自然是一个国家内部问题，但这些问题需要加以解决，而欧元区并非成员国能够随心所欲的地方。德国深知自己从欧盟获得了巨大利润，因此也愿意付出一定代价，即使这种代价超出了所得。在中美贸易战方面，欧盟应当尽量避免沦为这场战争的牺牲品。欧洲有其自身的利益，这种利益应当与中国或美国的利益保持一致，但不应以此威胁任何一方，尤其是美国。人民币国际化符合形势的发展，如果世界各国希望实现货币多元化，欧洲和中国应当为此做好准备。」

记者：分论坛主题为“亚洲与欧洲的协同：建立适应而包容的全球经济体系”，那么亚洲和欧洲应当共同重视哪些贸易和金融措施或机构呢？

Rainer Klump: 我会从两个角度考虑这一问题：现有机构和新的机构。首先，中国和欧洲应当进行合作，而且甚至有可能在现有的机构中进行合作，但这些现有的机构可能需要进行改革。因此，比如，我们在会上讨论得出，IMF 自然是国际货币关系领域的一个重要机构。但是，中国在 IMF 中的作用可能会有所增强。同时，尽管欧元在该机构中的份额下降，但欧洲仍应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欧洲能够得利于与中国在 IMF 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合作安排——这是机构内的合作。

对于新的机构，我认为已经存在若干可供利用的对话和论坛机构，不需要再另行建立新的机构。因此，我的建议是，更好、更合理地利用现有机构。

记者：我们该如何更切实地推动 IMF 改革，并取得更多方面的认可呢？

Rainer Klump: IMF 内部合作可能比较实际。份额改革可能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我认为，支持中国提出的提高其在 IMF 中的份额的要求甚至也是欧洲的利益所在，从而在当前形势下调整该机构的规则。

记者：回到欧洲这一话题。意大利新上任的民粹主义政府可能确实会导致欧元的崩溃。

有人认为，2015 年希腊的欧元危机并未真正消除，而是稍事休息，这也是当前意大利所面临的局面。欧盟有哪些政策和机构可以应对上述挑战？

Rainer Klump: 意大利问题较为紧迫。我只希望欧元区的每一个成员国能够遵守欧元区规则。我们必须想办法让成员国们遵守规则。希腊说到底只是一个小国，但意大利不同，它是欧元区的主要参与者，如果意大利不能遵守规则，那么我们所面临的局面将会十分艰难。

我认为，我们最终还是需要解决这一问题。但问题是意大利会否放弃欧元区。我认为，经过谈判，意大利将会了解到，失去其他成员国的支持意味着什么。这无疑是一个内部问题，但这个问题需要予以解决，而欧元区并非成员国能够随心所欲的地方。因此，必须遵守规则。

记者： 欧盟是否为欧元区制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新规则？这些规则真的有效吗？

Rainer Klump： 当然。欧盟已经制定了规则。但问题是如何推行这些规则。我认为，随着规则的强制实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最终将会获得来自欧盟的资金流。这是对 2021 年起实施的新金融框架的新一轮探讨，当然，成员国们必须找到遵守规则和参与该金融框架下的资金流动之间的联系。

记者： 您如何看待德国在欧盟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在欧盟的金融结构以及处理金融危机的方式方面，您是否赞同这体现了欧洲的德国，而非德国的欧洲？

Rainer Klump： 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以何种方式？德国是欧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因此，德国的影响力显而易见。但如果你对欧洲中央银行（EBC）的政策稍有了解，你就不能再说这项政策实际上是由德国推动的了。德国人对 EBC 政策也是诸多不满。但他们仍然在当前的体系中遵守规则。我想，这就是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必须做出的妥协。在我看来，德国深知自己从欧盟获得了巨大利润，因此也愿意付出一定代价，即使这种代价超出了所得。因此，我认为，这体现了对未来欧盟改革的认识；此外，德国需要为英国脱欧付出更大代价。当然，欧洲的非议众多，但德国归根结底是亲欧的，也愿意为此买单。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我希望我们是欧洲的德国。德国是欧盟机构的主要支持者。

明年的欧洲选举也许会是至关重要的考验。问题可能在于，法国总统马克龙（Macron）

曾说自己是欧洲运动倾向者，相比之下，现如今的德国并不存在这种亲欧党。因此，我仍想知道，马克龙会否来德国，也许他能够在大选中得票。亲欧党得票，将会十分有趣。

记者：面对美国对全球贸易的挑战，特别是“中美”贸易战，欧盟应该如何定位自己？

Rainer Klump：欧盟应当尽量避免卷入这一对峙局面。欧洲有其自身的利益，这种利益应当与中国或美国的利益保持一致，但不应以此威胁任何一方，尤其是美国。

记者：四年前，您曾到访北京并发表了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演讲。您曾提到欧洲将会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一个理想选择。四年过去了，这一进程中有哪些与欧洲有关的新措施，您对这些措施有何预期？未来还会采取哪些措施？

Rainer Klump：很好的问题。因为，事实上，这四年来并没有发生许多事情。我也很是诧异。我曾以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会走得远得多，可却看到了美元国际化这股新的力量，不过在我看来，这种力量不会继续壮大，因为特朗普政府充满了不可预见性。美国虽强大，但越来越多的国家会设法推动其外汇储备的多元化。这也是欧元和人民币的发展趋势。

我还注意到，中国并不愿意如此迅速的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可能担心会失去对货币的控制权。但我认为，如果全球市场力量希望进一步多元化，中国不应对人民币多元化怀有敌意。我想，如果世界各国希望实现货币多元化，希望使用欧元、人民币，那么这就是趋势。而欧洲和中国应当为此做好准备。

因此，我预计，我们将会，而且应该，对此采取更多行动。从历史观点上说，这也完全符合我们目前所掌握的知识，即货币组合始终发挥着国际性的角色。因此，美元主导是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

记者：在以人民币计价的投资基金、贷款和存款方面，卢森堡已成为主要的欧洲金融中心。您如何评价卢森堡作为欧洲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作用？它有何比较优势？

Rainer Klump：嗯，这是因为贸易关系和正在进行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也许还因为若干非常发达的金融地区和国家。对于卢森堡，我知道中国各大银行都在卢森堡设立了分行，政府对此也非常支持。

但我也注意到，匈牙利在这方面也表现积极，也许是因为匈牙利也与“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欧洲段）息息相关。这是顺理成章的。

推动中非合作新发展

记者：邹金水



张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

「中非合作论坛作为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成效最好的“南南合作”平台，对促进中非关系和非洲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非合作论坛的重要性愈加突出。」

记者：中非合作论坛于 2000 年成立，经过 18 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非开展集体对话、深化互利合作的重要平台，中国在论坛历届会议上都会推出一系列对非合作重要举措，2015 年 12 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提出了以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等为核心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您认为到目前为止，中非合作论坛取得了哪些发展成就，合作倡议的落实情况如何？

张春：中非合作论坛走过 18 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很多成就。首先最重要、也最能见的是中非间经济上的成就。经济方面又可以分为贸易、投资和整体经济结构三块。贸易上，2000 年中非双边贸易总量才 100 亿美元，现在大概是 1790 亿美元，尽管中间 2015、16 年贸易量有所下滑，但主要是由于这几年非洲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不表示中非间合

作关系变差，中非间贸易是有很大发展的。投资上，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增长速度非常快，2000年中国在非洲几乎没有投资，但截至 2016 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已达 399 亿美元。另外，从中非经济合作的整体结构变化来看，以前中非经济往来的行为体主要都是国有企业，但现在私营企业已经占到绝大多数，中国有 3000 多家在非洲投资的企业，其中私营企业有 2800 多家，数量已经占到 90%多。在中非间经济往来的金额上，私营企业约占 60%，国有企业 40%，同样也是私营企业较多。所以从结构上来看，目前是私营企业更多地参与到中非经济合作中来。

但我个人认为中非关系最重要的成就不是经济方面，而是在政治和战略方面。政治上，以前毛主席说，“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今天中国还是需要非洲国家在政治上的支持，包括南海问题，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等；当然中国也同样对非洲国家政治上予以大力支持，比如非洲国家关于联合国改革的“恩祖韦尼共识”，中国对此是支持的，只要非洲国家能够拿出可行的方案。

战略上，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及取得的成就，提升了非洲的战略地位。以前国际社会在战略上不太重视非洲，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非洲战略重要性似乎消失了。然后长达 10 余年，西方对非洲战略上不重视，对非援助也陷入疲劳，2000 年非洲所得到的援助额比 1991 年（冷战结束前）还要少。直到 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建立，中非合作迅速发展，使得其他国家在战略上也开始重视非洲，欧盟要成立欧非峰会，日本要建立日非峰会等。另外从《经济学人》两篇封面文章来看，2000 年是“Hopeless Africa”，然后 2011 年，则变成了“Africa is Rising”，这都反映了西方国家在战略上对非洲更加重视，非洲相比 18 年前战略地位有了很大提升，这其中离不开中国的参与。

记者：自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非洲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浓厚兴趣，希望同中国加强合作。而中共十九大也在外交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

一总目标。今年 9 月即将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无疑是在新的背景和国际形势下，您认为此次峰会将呈现出哪些特点，中非关系和中非合作又将有哪些新变化？

张春：毫无疑问，“一带一路”将是今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大多数非洲国家都面临着基础设施短缺、资金不足、人才瓶颈等问题，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包含了这些方面的合作。基础设施方面，“一带一路”强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这可以帮助非洲国家进行基础建设；资金方面，“一带一路”也包重视资金互通，有 AIIB、丝绸之路基金、南南合作基金等为非洲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人才方面，“一带一路”有民心相通、政策相通和人文交流政策等促进非洲的人才培养。另外，“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会是这次峰会有一个主题，因为中国对非洲各国的了解不是很深，非洲问题也比较多，需要各方的合作和支持才能更好地促进非洲发展，而中非命运共同体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认为峰会最后主题围绕的就是“共建一带一路，共筑中非命运共同体”。

此次峰会还会有一些小的议题，包括促进非洲内部的“单一声音”（One Voice）、“共同立场”，使之更加顺畅地与中国进行合作。非洲的“单一声音”怎样实现，可能会在整个非洲大陆层面、各个地区层面和成员国的双边层面形成一个立体的架构，改变原来简单的多边规划、双边落实的机制。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之内，除了原来非常重要的双边性的项目之外，地区性的（regional）、还有整个非洲大陆的（continental）项目比重会增加，会更加凸显非盟的角色，非洲地区组织的角色。

总之，中国对非洲的支持会保持整体政策的稳健性，在某些方面逐步改变；中非合作也会从原来的强调数量增长，到现在更加重视发展质量，这也与联合国 2030 发展议程、非盟的 2063 愿景、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符合，因此这也给此次北京峰怎样让中非合作从“量”到“质”发展提出了要求。

记者：非洲并非铁板一块，非洲国家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和一些合作项目的实施也有不同的声音，那您认为非洲不同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存在哪些质疑的声音，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可能面临哪些风险，该如何应对？

张春：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首先从非洲国家需求的角度来看，有些国家基础设施比较缺乏，有些国家可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对技术需求更大。所以不同国家有不同的需求，这也可能会导致他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不同。但总体上来说，“一带一路”内涵丰富，多数国家都能够在其中找到与中国进行合作的领域，所以大多数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还是支持肯定的。

第二，要了解非洲国家中长期的战略优先与“一带一路”的对接情况。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很多非洲国家认为国家短期的规划行不通，要做中长期的战略规划，而选举政治极有可能导致经济政策变化过快，对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非洲发展战略规划的意识在上升，很多国家就出台了比较长期的，15 年、20 年的战略愿景或者战略规划，那么在它 15 到 20 年的中长期战略规划中，“一带一路”倡议中有哪些方面可以与之对接，这是中国需要思考的。如果“一带一路”和一些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的不是很好，那么它就不会感兴趣，反之战略对接做得比较好的，能找到很多共同点的，那么该国就会对“一带一路”倡议很积极。

第三，要考虑到“一带一路”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造成的影响。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有五年了，可以说从去年“一带一路”峰会开始进入全面落实的阶段。但是“一带一路”项目落实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特别是国家战略层面的构想和企业操作层面的做法之间存在冲突，而这二者的冲突会影响非洲国家当地，特别是老百姓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很多时候，非洲国家的民众对“一带一路”的看法，不在于大的战略愿景，而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能否考虑到当地民众的切身利益。比如，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征地问题，中方可能与当

地民众对征地的认识就存在不同的看法，中国人可能认为是拆迁补偿的问题，而当地民众也可能是把土地和文化、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

记者：随着“一带一路”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行为体还是参与到非洲的经贸投资中去，另外中非之间的合作与第三方的对话联系也在增多，那您认为中非合作论坛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完善其机构或者机制，从而进一步提升论坛对内对外的协调能力？

张春：首先是国内层面，中国对国内行为体的约束和协调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对国有企业，集体股份制企业。现在主要问题是在非的私营企业，其数量很多，政府难以兼顾，人手不足，更大的问题还在于私营企业的国家意识不强，有时不能和国家的战略规划相配合，“没事的时候不找使馆，出了问题才会想到去找使馆”。因此随着中国进入非洲的行为体变多，海外利益的保护必须要事先有所准备，做好预警机制。

其次，中非与第三方合作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包括非洲，其他国家也要纳入进来，但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非洲对第三方的看法，因为如果我们讲三方合作的时候，非洲一般会理解为“中国+非洲+西方”，一旦非洲把第三方认定为是西方的话，其合作态度会比较勉强，充满疑虑。第二，中国必须对合作的第三方设置“门槛性”要求，因为中国的政策立场是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和可靠朋友，而中国对非洲来说是更强的一方，如果要进行三方合作，中国在规划、开展合作的时候就必须照顾到非洲国家的利益。因此中国对第三方有一些门槛性的要求——“非洲提出、非洲同意、非洲主导”这三点，所有的第三方合作要非洲主动提出，而不是中国强加给非洲的；另外三方合作也要非洲同意，因为非洲处于弱势地位，第三方和中国可能都比较强大，关于项目的实施执行，怎么做一定要非洲同意；

还有在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非洲也要发挥主导作用。面对这三点要求，很多西方国家是不愿意的，西方国家参与的非洲发展项目习惯了自己提出、自己主导。

记者：中非合作论坛作为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成效最好的“南南合作”平台，在中非关系中一直坚持互不干涉、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促进了非洲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您认为中非合作论坛能够为全球治理带来哪些经验借鉴？

张春：中国在中非合作的历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第一个就是中非间的相互尊重；第二，在论坛框架下，中国对非合作逐渐形成了一套包含“真实亲诚”、“正确义利观”的理念，因为非洲相对中国而言，经济上处于弱势一方，这就要求中国在合作中照顾非洲的利益，这不仅仅是说在经济上的让利，还包括怎么让非洲在合作中发挥主导性，要坚持“非洲提出”、“非洲同意”、“非洲主导”的原则；第三，“发展优先”的理念，中国参与非洲发展的经验或者模式，更大的区别在于中国讲“发展优先”，西方给非洲开出的发展药方是先改善安全、改革政治制度，做到“善治”，这等于已经把“发展”概念偷换掉了，反而变成了专注于安全和治理，实际上是一种“发展条件优先”的理念。中国则是一直秉持“发展优先”的理念，直接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发展，用发展来解决原来存在的安全问题、治理问题，在这一过程会产生新问题，就再用新的“发展”相应解决，形成一种良性上升的螺旋发展模式。西方的“发展条件优先”和中国的“发展优先”这二者的内在逻辑不一样，这也是中国在非洲合作中形成的重要的经验。第四，集体对话、双边落实，今年北京峰会可能会进一步完善这种方式，中国通过论坛与整体的非洲对话，促使非洲一个更强大的姿态以中国对话，开展合作，改变过去西方国家在非洲长期实行的“分而治之”的政策，不断削弱非洲。中国把非洲当作一个“强大”的伙伴而不是所谓的“树敌”。最后，中国对合作项目的落实十分重视，中国的执行力也很强，在国际合作中秉持一种“实践性”的理念。

总之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共商、共建、共享”在中非合作论坛中已经十分明显地体现出来了，取得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但同时中国也仍需在国际合作、全球治理中保持谨慎、要有风险意识，谨防“后挫”（setback）。

变动中的国际贸易格局与中国完善全球贸易治理的尝试

记者：黄昕蒙



张海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近二三十年来，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贸易格局也在发生着调整。面对变动中的国际贸易格局，传统的贸易体制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成员国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并以中国的方式探索着如何完善全球贸易治理。」

记者：近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反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多，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力量并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认为中国为什么坚持“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张海冰：回顾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历史对比。改革开放到今年已经四十周年了，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证明了改革开放对中国的发展是有利的。从国家领导人和学者的判断和分析来看，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特别是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在国际贸易的带动下，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贸易有很大的“溢出”效应，最开始，我们是做来料加工，慢慢地，我们在“干中学”，逐步完善自己的产业体系，技术能力、管理能力都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总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是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受益者，这坚定了我们推进开放的态度。

同时，中国支持开放型世界经济，也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流。技术进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快了全球化推进的速度。贸易、劳动力、信息、服务等要素流动壁垒越来越低，要素的流动速度不断加快。区域性的贸易谈判协定不仅应对了全球化发展带来的新问题，也印证了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不可逆转。区域协定、贸易规则越来越向边境内渗透，这也是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一个明显动向。其实，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也是基于全球化和地球村的基本考虑，也是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

记者：圆桌会议上，有学者指出，目前我国已是一个贸易大国，但还不是贸易强国。您认为这种角色会如何影响中国的国际贸易参与？

张海冰：贸易大国和贸易强国之间差别很多，不仅是一个贸易量的概念，更涉及到参与世界贸易的商品和服务种类、技术含量以及交易货币和标准等，是一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和在全球贸易中综合影响力的集合。目前中国无疑是贸易大国，但是离贸易强国还有一定差距。但是，我们需要客观来看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总体上，我国和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存在着技术上的差距，但是我们在一些核心领域内也有优势，比如高铁等。我们需要分产品、分领域来看中国的贸易实力。也许有人会问，中国会不会由于在产业链里相对优势有限而赚的很少，但这个问题取决于你怎么看。我们最近去美国调研，美国人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他们做了一些调研，以苹果手机为例，虽然中国赚的利润较少，但大多数归工人所有，美国赚的利润很多，但大部分都给了资本家。这里有一个社会分配的问题，中国虽然获得的绝对利润比美国少，但从分配角度看，中国社会比美国社会更有获得感，这延伸出来，就是一个社会包容度的问题。因此，贸易强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记者：那么，您如何看待特朗普发起的中美贸易战？

张海冰：特朗普是靠民粹力量、民间支持上台的，他十分敏锐地嗅到了美国的社会撕裂和全球化的冲击，所以他强调提供就业、关注失业者和底层人民。怎么解决呢，其中之一就是打贸易战，一方面是为了提供就业，另一方面是要塑造一个共同的敌人。为了促进内部团结、社会融合，一个很有效的手段就是寻找一个共同的敌人。自 2010 年以来，中国基本上成为了美国贸易赤字来源最大的国家，根据美国的统计，目前中美贸易赤字达到 3750 亿左右，根据我国统计是 2700 多亿。除此之外，美国朝野两党对中美关系的定位也达成了空前的共识，那就是战略竞争关系。以前，美国精英和建制派认为可以通过市场化和全球化等手段改变中国，但是伴随中国国力上升以及十九大报告中的相关表述让他们改变了看法，建制派也开始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者。再看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已经把中国排在了第一大威胁。当然，这种定位是结构性的、系统性的，我们很难改变。即使一个国家没有衰落，另一个国家的崛起也会使其显得相对衰落。国际权力结构的变更必然会带来动荡与冲击，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只是一种表象，根本上还是由于对中国“战略竞争”角色的界定。

记者：美国现在强调“贸易保护”，反对中国贸易，这会不会违背美国建立起来的自由贸易体系？

张海冰：大国从来都是什么对自己有利就坚持什么的。美国依然说它坚持自由贸易，但它说自由贸易要建立在平等和公平上，什么样的自由贸易、什么叫平等和公平，大家就要来谈谈。而且，美国已经不把中国当作发展中国家来看待了，以前的最惠国待遇、非歧视原则，是说你对别人怎么样就也对我怎么样，但是现在的对等贸易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我给你的条

件你也要给我，你不给我的话我就也不给你，完全就是要求在同一个水平上。而且话说回来，所有的大国对于自由贸易的遵从，包括对于 WTO 的态度，都是因时、因事而变的。美国没有说不支持自由贸易了，特朗普贸易政策有“五大支柱”，第五条就是“加强多边贸易体制”“支持 WTO”，但是，他的第一条是捍卫美国国家安全。贸易问题政治化或者安全化，就很难用一个理性的规则或体系去衡量或者判断了。去年 G20 汉堡峰会上，美国也强调了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全球经济治理，但是这个规则是什么样的规则，就要由大国来博弈了，说到底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就是要美国说了算，是典型的霸权主义。

记者：您在发言中也提到了当今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问题，包括 WTO 缺乏效率等，您能否详细谈谈造成这些困境的原因？

张海冰：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中，WTO 是最公平的，另外的组织比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都是按照出资比例决定投票权，谁出资多谁话语权大，美国有一票否决权。但是 WTO 是一国一票、协商一致、投票表决的，WTO 的谈判需要一个个谈下来，跟大国谈，贸易量大，可能难度大，小国相对来说比较容易。WTO 最有争议的是它的“绿屋会议”，主要的贸易成员方先把规则谈了，谈完了再跟小国说，这样虽然更有助于推进进程，但是也遭到了很多的批评，几个大国就把事情说了，其他国家没有融入感。所以这是 WTO 面临的困难，要达到效率就没有公平，要公平就很难实现效率。

WTO 谈判的另一个难处就是各国互不让步，发展中国家内部也有很大的分歧。多哈回合谈了这么多年了，但是没有什么进展。这里有一个悖论，发达国家给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的发展援助，帮助它们发展农产品等初级产品，让它们出口农产品，实现产业升级，不要过度依赖资源。但是发达国家国内的农产品保护措施又特别多，实际上让非洲这些国家根本无法进入它们的市场。也就是说，援助政策和贸易政策是对冲的，并不一致，所以我们

要强调政策协调和一致性。此外,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也不统一,农业大国更看重农产品问题,非农业大国就不尽然了;而对于农业大国,重点也不一样,所以协调的难度是很大的。总之,WTO 只是提供了一个公共规则,就像“交通规则”一样,如果大家都遵守,那么贸易更便利一点,不遵守,就会发生“交通堵塞”。

记者:您在发言中重点讲了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您认为与现有的机制相比,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国际进口博览会等,能为促进各国达成共识、完善全球贸易治理做出什么贡献?有何进步之处?

张海冰:中国是一个“do country”,是先做再说、边做边学、边做边看的实干国家,这是今年我们去尼泊尔调研时尼泊尔人给我们的评价。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在加强规则协调、战略对接,但是并没有把建立强加式的统一规则作为目标。我们在合作中以适应当地标准、标准对接为主,尊重其他国家的情况。当然我们也希望在合作当中,别人能更加认可中国的标准和技术,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和西方国家巨大的区别。他们的援助项目、经济合作项目都要做大量的前期准备和可行性调查,很多时间和经费都花在专家的前期调研和谈判中了,当然这么做也有好处,他们把所有的风险都考虑周全,而我们更多的是边建项目、边应对风险、边解决问题。这种方式,速度快、成本低,因为项目周期大大缩短,但是风险管控方面可能会遗留问题。中国在贸易政策的制定上,一直坚持平等、多边、灵活、协调,不会很激进地推进高标准的贸易协定。

我们建立国际进口博览会,把它放在去年一带一路峰会中宣布,也是有考虑的。别人说我们一带一路输出过剩产能,但其实我们不是,我们还是很注重向国外开放市场的。国际进口博览会以“开放”为目的,我们希望维护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展现中国开放形象。搭建这个平台就是主动对接国内国际市场,这也是中国对国际评价的一种回应,展现一种领导力和

政治意愿。习总书记也说，欢迎大家搭中国便车，国际进口博览会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例子。共建“一带一路”、投资走出去、建立进口博览会、把商品买进来，都是很“实”的中国方案、中国贡献，是中国提供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往更深一步讲，我们通过这些平台、通过这些很实在的方案，促进大家的沟通，也能起到一些协调作用。当然了，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还不好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刚满 5 年，下结论还太早，进口博览会也还没召开，让我们拭目以待。

“去一体化”潮流兴起分配体制亟需调整

记者：张宇婷



万广华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中国政府不仅仅在推“亚欧一体化”，而是致力于构建更广阔范围的“全球一体化”。作为最大和最为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可以代表大多数国家推进下一轮全球化的进程。在亚洲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和印度的合作至关重要。」

记者：您之前研究过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货物贸易关系，也在亚洲开发银行任职，一带一路提出了很多新点子比如亚投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在“去一体化”的潮流中理解一带一路战略？

万广华：一带一路现在的内容是做“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它的内容和一般的贸易一体化相比有很多新内容，范围也越来越广，目前进展较快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投资两方面，政策沟通和民心建设上的进展比较缓慢。但我个人认为随着目前国际局势的变化，一带一路能够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推动形成比WTO 框架下更优质的新的贸易制度，这是我的期望。从贸易基本格局与演变趋势来看，2005~2014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速度总体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进出口份额

超过全球 1/3，还是世界重要的产品输出地。这段时期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均出现了较明显的集中化趋势。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印度、新加坡等国在“一带一路”货物进出口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国家的支持对于一带一路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虽然沿线国家存在一定的贸易竞争关系，但贸易互补大于贸易竞争。

目前国际上的趋势是在去全球化，最典型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争，我在今年 3.15 日就判断这场贸易战无法避免，当时美国尚未出台对中国出口商品的 500 亿征税清单。现在看来，我的判断是对的。其实，去全球化在其它地区也出现了，包括欧洲甚至亚洲。所以，一带一路目前的发展确实有点困难，但只要中国掌控好、并充分利用与美国的贸易战来推动带路建设，前景还是不错的。

记者：一带一路是正在建设中的新“一体化”，一直被认为是区域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合作组织欧盟在经历了难民潮、恐袭、英国公投等事件后，不少媒体宣称这些新的问题正在“分裂”欧洲，您如何看待这些地区从一体化到非一体化的转变？其内在原因和机制是什么？

万广华：“分裂”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直观来看，欧盟内部国家的外交和货币政策是统一的，但财政政策不统一，不同国家之间的协调本身就存在很大问题。更深层次上，欧盟出现的难民潮、英国脱欧等问题，有其对应的深层次的原因：全球化带来的利益没有在不同国家之间得到合理分配，全球化或一体化利益在各国内部分配也不公平，这是导致去一体化的根本原因。

全球化带来的贸易自由、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可能有利，但问题在于很少有人认识到全球化潜在的负面效应。英国脱欧是全民公投的结果，投票的结果是微弱多数同意英国退出欧盟，但接近一半的人赞同留在欧盟，这便反映了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利益没有很好地在国家内

部分配的问题。再比如，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难民问题引起了欧洲尤其是东欧国家右倾主义的兴起，反移民、反全球化、反一体化，目前在欧洲比较流行。这是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挑战。

记者：有观点认为贸易战某种程度上在把中国推向亚洲和欧洲，会促进“亚欧一体化”的进程，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目前流行的去一体化趋势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万广华：从目前来看，美国的这一届政府的很多做法给了中国政府在道义上占据“制高点”的“机会”，因为美国政府现在的很多行为是违背现有国际规则的。所以我一直说，这场中美贸易战，中国在短期和经济上很难赢，但在长期和非贸易领域能够赢，比如在道义上就可以得分。但这能否转化为长远上的收益，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从一体化的角度上讲，中国政府不仅仅在推“亚欧一体化”，而是致力于构建更广阔范围的“全球一体化”。现在处于从亚欧做起的开始阶段，这种选择有机缘关系的原因。丝绸之路是从亚洲到中亚，再到欧洲，海上丝绸之路是从亚洲到非洲，从地理上直观地看到是欧亚的联系，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中国要走的是全球一体化合作的道路。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正处于“后退”的姿态，中国一定程度上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推到现在的位置。作为最大和最为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可以代表大多数国家推进下一轮全球化的进程。

记者：您之前提到了“逆全球化”的兴起，您也有文章指出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仍有增长潜力。从全球经济贸易的角度看，您是否认同伴随我们这一代人长大的“全球化是世界主流”这一观念依然适用于目前？您又如何看待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两“化”在未来世界的发展？

万广华：我个人认为全球化浪潮是很难“往回走”很远，但目前还会延续一段时间。但从长远来看我不担心全球化走“回头路”，因为贸易投资的地区性和全球性整合总体上可以给各国都带来好处，问题在于这种好处在国家之间的分布也许不尽合理，尤其是在国内群体之间的分配。正是全球化“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效应，导致了去全球化现象。比如现在的“中美贸易战”就是源自中美从贸易中得到的收益不均。如何解决这个分配问题？首先需要使政府、社会、媒体个国际组织充分认识到分配方面问题的重要性；其次，要出台跨国和国内政策，去解决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分配问题，即设计、制定并执行全球化收益在国家之间进行二次分配的政策和相应的体制机制安排。

记者：就亚洲而言，国外媒体对亚洲经济的关注经常在中国、日本、印度三个国家，您认为在亚洲区域一体化和“去一体化”进程中，这三个国家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万广华：其实很多年我都在关注印度的情况，基本是两点：短期来看中日合作是很重要的，长远来看中印合作具有更深远的意义。眼下所处的阶段来看日本在亚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日本的GDP总量是全球的5%不到，中国接近20%，印度占5%~6%。日本快速增长完全不可能，我能看到的是进一步衰退，而印度增长潜力巨大。所以，重点要放在和印度的合作上，虽然不能忽略日本。

我个人认为，在亚洲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和印度的合作至关重要。中国和印度能否联手推动两国的经济一体化、贸易经济和非经济方面的合作，对于亚洲甚至全球的局势都是至关重要的。其实，中印联手的可能性非常高，因为两国都面临共同的挑战，包括最基本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气候、恐怖主义等。如果中印能够真正联手，将来的世界格局是完全不一样的，但中印之间也存在一系列问题，需要研究和处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从2003年起一直在国内推动关于印度的研究，并于数年前在云南创立了“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

让绿色治理理念渗透到“一带一路”国家

记者：韦孟菊



马海兵

世界观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只有更多的民众，打心底里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他们的一种内在的需求，才能让国家在这方面做更多积极努力。」

记者：“一带一路”走出去项目主要以交通、能源设备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这些传统工业带来的环境影响不容忽视，而沿线生态环境多样、复杂，在推进项目的同时可能将带来复杂的环境问题，您认为该如何应对“一带一路”带来的环境挑战？

马海兵：我参加的分论坛叫绿色治理，我觉得绿色治理是指在一带一路的推进过程中将环境影响降低到最小。而绿色治理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不同于欧美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阶段，需要基础设施来提供电力、促进工业化，因此愿意付出一定的环境代价。在这个层次上，绿色治理意味着，能够保证尽量降低环境影响就已经是很好的了。第二个层次上，对于发展水平已经较高的国家，绿色治理需要上升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因为单个项目环境保护措施治标不治本。只有这些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行业真正上心才是根本。保持行业中的良性竞争，从良性竞争到各个国家自愿地、出于自身利益一起发展环保产业，将产业做大做强。

记者：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在要求，您认为在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政府和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马海兵：相对于“一带一路”其他沿线国家，中国政府的执行力是最大的。中国政府既然提出了这样的构想，从顶层架构上必然是有较先进的、系统性的理论和远大目标的。但是从顶层设计到执行的每一步都要做到以绿色、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确实比较难。

中国过去没有很好的经验。很多政策在中央层面设计良好，但在执行中受一些地方利益的制衡可能会走偏。所以在（顶层）设计政策的时候，要预计到这种情况，从利益均衡的角度来追求绿色效益的最大化。政府在做决策时需要考虑决策过程是否民主，是否综合了各方利益。而到了政策执行阶段，又需要叩问自己是否设定的目标都能达到。这两部分之间是有内在关联的。

记者：近年来国际范围内“反全球化”、西方国家的排外主义的声音不断，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遭到不同程度的抵抗，您认为“反全球化”的声音将会对一带一路的建设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马海兵：我个人觉得这不会对以中国为主导的一带一路有特别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中国无论是经济实力、政治实力，还是军事实力已经足够强的时候，不必要完全听从于西方的话语权。事实上，按照一带一路基本设想完全地贯彻执行的话，将有助于中国获得自己的话语权，向世界展示一种不同于西方过去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包括如何处理需求关系、地域关系。

记者：在《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体建立“务实高效生态环保合作交流体系”，您认为建立生态环保合作交流机制的关键是什么？

马海兵：从我看到的消息来说，目前是把中国表现较好的环保企业的产品推广到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但我觉得这只是个开始。其实这份文件里也提到我们更高的目标是要推进相关国家在环保理念方面的共同发展。环保理念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理念就可能缺少系统的设计。例如，只关注产品可能会导致为利润而舍本逐末，忘记终极目标。就像太阳能电板行业，只注重产品本身却忘记了初心是为了使用清洁能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改善环境。但实际生产中，很多企业没有控制好污染，反而造成更大的污染。本身作为清洁产业，但在过程中造成更多污染，这既矛盾又讽刺。

我觉得中国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因为涉及国际影响，特别要注意避免上述矛盾。因为一带一路动态备受关注，只要稍有差错，就容易招致各种批评，形成国际舆论压力。如果受到很大的国际压力，特别是来自欧美国家的，那么对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政界高层来说也有较大影响，他们也许会选择退出，这样对一带一路事业也会造成较大影响。

记者：上海市作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将依托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等平台，建设上海“一带一路”能源和碳交易市场，您认为此项举措对推进绿色“一带一路”是否起到了示范作用？为什么？

马海兵：我觉得在服务业，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区域间的合作方面是有示范作用的。因为这已超出单纯的产品和贸易层次，涉及到各个国家基本的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注重的是人心，

这体现了一种东方思维，即从制度层面深入人心，达到和谐。尽管这种设想是美好的，但是也是较难执行的。能源交易和碳交易市场的原理浅显易懂，但是如何利用这种市场去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推动绿色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我觉得是比较难的，也和全国现在的碳市场建设的各个阶段息息相关。碳市场本身只是种经济工具，它其实离绿色事业、可持续发展还是有相当的距离。通过碳交易并不会直接促进企业有更大的动力去降低整体排放量，只是使企业降低排放的过程变得更富有效率。

在碳市场建设方面中国已经是超前了，但这种超前性又容易（给一些西方国家）“留下口实”。因为中国想做一种引领性的东西，想开拓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模式，如果在实施过程中做的不好的话就会招致一些批评。中国首先要正视这种批评，同时也把这种批评的内化在政策的制定中。只要我们去说明新模式建设中的困难，大家都是能够理解的。其实，有时候适当听取来自国际社会的意见也是有益的。总的来说，还是要勇于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有责任也有能力走出一条不同的路。

在未来，中国要将“一带一路”概念进一步向世界推广，我觉得需要借助第三方平台，比如说一些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让他们能够及时了解到项目执行的进展，而不是等项目完成直接宣布结果。同时也需要这样的第三方来起到监督的作用，可以在这样的平台适当公布一些数据或者资料，通过坦诚的态度赢得好感。

记者：您曾提出“中国的绿色金融制度要与国际市场接轨”您认为中国的绿色金融制度是否可以推广到一带一路经济带中？该如何与国际、沿线国家的相关政策有机结合？

马海兵：首先，绿色金融概念也是很新的，国际上也没有绝对好的标准，大家都处于探索中。国内绿色金融概念提出也是近年来的事，目前来说中央政府更多是激励地方政府做更多的创新。因为这种金融服务是很具体化的，需要根据各个具体的市场来决定具体的执行。

仅依靠中央好的顶层设计尚不足够，无法考虑到具体执行条件。只有激励地方政府以可持续概念作为基础，去理解中央顶层设计的原理发展自己的途径，才能根据本地市场的模式和发展规律来创造一些更多的金融创新模式。

在很多一带一路的国家，老实说民主化程度都不是特别高，甚至教育程度也比较低，所以环保意识不强，关注点仍在于产品、GDP 的指标，这样就不利于中国一带一路长远目标内化到具体项目上。我看到一带一路相关的教育项目，都主要关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在环保方面先进理念的教育缺失。我觉得只有更多民众认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才能让投资所在国在这方面做更多积极努力。但是把绿色发展理念内化到教育上的困难会很大，也需要很多的时间。

记者：“一带一路”沿线国大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工业化和全球产业转移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多重挑战，您认为这会给我环保企业带来怎样的机遇？

马海兵：我觉得这是一个共同发展的机遇，因为中国本身的环境问题也很多。特别是近 20 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土壤、水、空气的污染，包括沙漠化的问题都很严重。因此，中国有很多环保企业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很有经验，这些企业可以在合作国家建立一种伙伴关系，培养当地的企业，培养起当地的产业园区，共同把市场做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中东的国家，它们面临着怎么使沙漠变得更富饶的问题。在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时候，首先需要找到共同发展的目标，从共同的利益点出发，再以当地的环境政策和背景为基础来设计项目。

在经验以外，中国企业还具有一定的技术储备，能够做到理念和技术的同时输出。我们可以采取合资的方式，甚至只是技术参股的方式，培养起当地的企业和人才，这种模式一定

会受到欢迎。在打开市场的同时，又建立了技术依赖。而且（环保产业）国际市场的发展还可以用来倒逼国内市场的发展。如果在国际市场这些产业发展得很好，那么在国内也一定会得到更多关注。

“一带一路”绿色治理——从协调环境标准到公开环境信息

记者：张君昊



石正方

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环境专家

「环境标准是需要统一的，在原则上、精神上都能够达成一致，但在执行层面上、在细节上存在困难。」

记者：“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着眼点，投资企业多为钢铁、水泥、能源设备等传统行业，由于其行业性质，对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您对此如何看待？

石正方：对于“一带一路”战略我们需要以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待问题。“一带一路”建设是各国之间希望找到的一种互利共赢模式，是对于共同发展的向往，不能单纯理解为是中国的投资、建设行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起到引领的作用，但我们的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仍需以他国的目标 and 需求为主导，遵循他国的发展战略。这是分析问题的前提假定。在环境治理问题上，我们也首先需要关注各国自身的环境标准体系。当地政府会根据本国的环境容量本底值，通过一系列的环境影响评价来决定引入哪些行业，并进一步确定引入项目的规模、标准要求。对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当地政府在引入投资时也会有特别的考量。事实上，基础设施建设只是整个“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一部分，投资企业的类型并不局限于基础设施企业，也包括服务业、制造业。总体上来说，把握投资所在国的环境标准是投资的基础。

记者：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仍有许多中低收入国家，您认为社会发展水平会对投资所在国的环境标准制定产生怎样的影响？

石正方：我们需要站在对方国家的立场上来思考这个问题。正是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当地政府在制定标准时必然是综合多方个方面的，往往需要进行环境经济学的分析，需要衡量整体社会发展水平，也需要考虑当前的科技水平能够达到的最高治理效率。除此以外，针对具体的项目，当地政府还要努力做到经济成本上的最优化，确保以最低的污染治理成本获得最高的环境效益。在完成了这些基本判断之后，才能最终确定引入的产业、企业以及开发的地区。

记者：您认为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应该遵循怎样的环境标准呢？

石正方：除了刚才提到的投资所在国标准外，对于中国“走出去”的企业，也需要有企业自身针对环境治理的考量，为自身制定一些标准。这个标准可能是中国标准，投资所在国标准，也可以参照国际最佳标准，例如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等提出的指标体系。具体的标准选择就是从企业角度需要做出的判断。从国际组织角度出发，跨国投资企业在对污染的治理和对社会影响的管理中理应参照最高标准来执行。但是在实务操作上又要根据行业性质的不同、例如根据潜在环境影响分成高污染行业、低污染行业，来决定执行标准的严苛程度。

记者：您作为国际组织的环境专家，能否简要介绍一下您所在的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的环境治理标准？

石正方：我刚才已经提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会有来自多方制定的不同标准。国际组织间也都有自己独立的标准体系。其中我所在的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在投资项目时有一套绩效标准，并且已经受到了联合国、投资所在国、其他国际组织的广泛认可。不同于世界银行只在政府担保下对公投资的特点，国际金融公司的投资则相对更复杂——投资对象、投资方式、投资规模、投资的行业类型更具多样性，因此也对完善的管理体制和绩效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IFC 针对组织内部和客户（企业或金融机构）分别制定了绩效标准，具体包括了环境影响自我评估能力、资源使用效率与污染防治能力等八个方面。国家政治法规的设计是以政府监管为目的，与之不同，我们提出的绩效标准是为企业或金融机构提供了一个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框架，使其在项目开发的前端和项目进行的过程中都能在框架下展开具体分析。

记者：您认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不同环境标准是否能得到协调统一呢？为什么？

石正方：标准是需要统一的，在原则上、精神上都能够达成一致，但在执行层面上、在细节上我个人认为统一存在难度。特别是在国家层面上，由于不同国家地区的政策不同，正如我前面所说，每个国家在环境标准的制定上都会结合本国国情，考虑本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一些国际组织例如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亚洲投资银行（AIIB）、亚洲开发银行（ADB）提供的标准仅起到一个参考的作用，或许能够为标准统一提供帮助，但也不会完全适用。另一方面，从广义上来看环境标准。有些是能够依据科学研究得出的具体数值，例如排放标准，但有很多社会类标准本身难以量化，又会因为执行所在地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也为标准的统一带来难度。针对这一类标准我们也许可以确定一个共同的目标或是预期的结果，如果达到了先前的预期便认为达到了标准。

记者：您认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们应如何做到环境信息的公开透明？如何避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出现？

石正方：我认为环境信息的公开主要有三个层面。

首先是在国家层面上，应该有法律制度环境作为基础。例如在中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就已明确要求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主动公开信息，内容包括了环境质量信息、环境监测信息等。

其次是在跨国企业层面上，企业有义务将投资项目的环保信息主动公开，公开程度有高低，视企业而定。IFC 对于信息公开这一点是有较高要求的，不仅所投项目需要向公众公示，也要求项目参与方（企业）需要发展出一套信息公开的机制，在项目所在社区进行公示。

还有在民间组织的层面上，个体的参与将会对环境信息公开起到监督的作用。因为与政府、企业不同，投资项目带来的环境影响将最直接地作用在民众。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些国家的民间组织还不太活跃，而有些国家的民间组织已经十分活跃。虽然各国间发展情况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说来自民间组织的声音是应该被鼓励的。但要实现广泛的社会参与，还是离不开政府、企业主动公开的环境信息，这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

我认为环境信息公开另一个重点是与公共教育的结合。因为有公开的信息尚不足够，信息还需要良好的解读。面向普通百姓，可能多数人都没有专业背景知识。使用一种通俗易懂的方法，例如以颜色为标识，就能很好地将企业排放的达标情况、项目是否合乎法律标准表达出来，便于交流。

因此环境信息仅做到公开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考虑更多的问题，例如在哪里公开？如何保证公开信息的正确？如何解读信息？之后还会涉及到公众如何利用公开的信息进行维权？对于环境信息公开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更有更深入的思考。

记者：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我国积极引入“绿色金融”理念，您对此如何看待？

石正方：首先，我们需要对“绿色金融”有一个更精确的定义。“绿色金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它要求项目具有可持续性，即避免项目带来负面的环境、社会影响，使得项目能够正常推进。这是投资企业必须做的，是底线；另一方面，它要求在达到最低标准的前提下，能够带来正面的环境效益，解决环境问题，带来环境质量的提高。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引入“绿色金融”的理念也需要从定义中的两个角度来看待。通过政府对于投资企业的监管，使其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能够避免对当地环境造成破坏，守住底线，我认为就已经成功一半了；如果在此基础之上，国家能够积极推动一些绿色项目，帮助提升投资所在地区环境质量，那就是同时做到了第二点。事实上，我国政府部门、银监会、央行在中国“走出去”企业中，鼓励支持它们积极参与到当地环境的改善中去，在这一点上目前我国是做得不错的。

创新“去中心化”进程中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记者：孙宇彤



李万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技术预见专业委员会主任。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臻成熟，创新已经呈现去中心化的趋势，原有的围绕着整个中心的一些法则正在被打破，新的法则需要被建立。科技创新中心，我们过去称之为“center”，但是现在的科技创新中心，我们可能称之为“hub”，它是一个枢纽的概念——它的存在，不是说要让地方向中心汇集，而是由于它的存在，使得整个系统各个节点之间的联系更加畅通。」

记者：在毕马威 2018 年度的《全球科技创新报告》中，上海成为除硅谷和旧金山之外，有望领先科技创新中心的第一位，影响人们把一座城市视为科技创新中心的因素包括有利的政府政策、科技园区建设等等，您认为关键的因素是哪些？上海为什么能取得这次排名的第一位？

李万：我们研究所也做过类似的科技创新指数报告，主要认为有五个“力”，分别是创新资源集聚力、创新成果原创力、创新产业竞争力、对周边地区辐射带动力、创新环境吸引力和。在毕马威评价中，上海能取得这次排名的第一位，第一点因为上海是一个经济中心，

经济的活跃是一个基本的条件。产品门类相对比较齐全和丰富，有技术基础，同时，有相当规模的需求，新的科技产品才能够在这率先示范应用。

第二点因为上海是一个金融中心，能够提供足够的借贷市场、资本市场。

第三点是上海的文化氛围，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这种文化的积淀，让上海有非常多的机会能够赢得人才。很多的研发人员，他们的文化诉求是多元的，甚至更多是往更加高雅的这方面去，而上海有很多文化空间，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演艺人才队伍和演出内容，这就吸引了研发人员的到来。

第四点是良好的自然与城市生态环境。上海沿海，气候相对比较宜人。

第五点是上海的科学资源比较密集，有很多的研究机构和大学能够提供经过训练的人才。再加上上海城市空间良好的设计和未来感，让来到这里的外国人觉得不陌生，让他们觉得这座城市是多样性的，人才都有自由的空间来尽情发挥。

但是我们现在也在想，发展可能最终还是要看经济的表现、企业的影响力，还是要有典型的人才、典型的成果、典型的机构，这些是一个科创中心重要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上海现在还在努力过程中，要看到自己的差距。

记者：如您所说，上海目前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确有一定成果和经验，但差距也确实存在，您可以谈谈差距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吗？

李万：现在上海人均 GDP 刚刚跨过 2 万美元，虽然算是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和国际化大都市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不是简单的一个数字的概念，而是竞争力、产业结构、人才结构、运行效率的差距。另外，上海原创性的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和一些城市也还是很难比。还有上海的很多产业都是大而不强，具有竞争力的这种产品还不够多。

记者：那么为了缩短这些差距，您认为上海在建设科技创新中心上可以借鉴国际上的哪些经验呢？

李万：这个我们也看到，国际上科技创新中心有不同类别，大家的建设路径也都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存在共性。第一个就是这些科创中心的崛起都是充分把握住某一次的新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浪潮，把握住一个发展的大势，这样的外部条件是肯定的。

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些科创中心都在鼓励原创性的、前瞻性的、战略性的、能够引领一个时代的，这样一种基础性的研究。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集聚高层次人才，过去布局科研活动，我们提的是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我们现在还需要提关切人类未来命运，因为只有关系到人类的命运，科学研究才能打开未来的视野。

第三个就是得有新型的机构，新型的组织。因为科学技术就代表第一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每次生产力它要发生突破和变化的话，科研组织就必然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现在特别要支持这种新型科研组织的运营，让它去打破各种边界。

第四个政府的支持不可或缺，政府要成为一个耐心的资本，“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第五个是我们过去往往忽视了的，科技领域的话语权。科技传播这方面我们比较少在考虑，当然现在中科院上海分院也有一些好的杂志，但今后应该更加重视一些国际的“在上海、为世界”的学术会议，在上海为世界的前途进行思考，最后把成果给到我们中国的企业，让中国的企业做出这种创新的产品，然后再销售到全世界，这样我们的科创中心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

记者：您所任职的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服务创新决策为宗旨，那么您认为从研究所的既有成果来看，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市下一阶段在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方向上有什么不同呢？

李万：这个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当然也有互相借鉴的一些内容。因为北京的科教资源相对比较密集，中关村在高科技产业化这方面也非常有特色。而上海有科教资源，同时也有创新创业活力，很重要的是它还是原来的老工业基地，有一定的制造业基础。北京更多是要面向全国，因为中关村在全国有很多分园区，它要从北京走出去，把品牌打出去。而上海有很多全球性的科创公司，我们理解是要更多地利用上海综合性的开放型的优势。另外一个上海“引进来，走出去”的特色要比北京明显，像前年上海企业“走出去”的投资，大概占了全国的 1/7，而且这里面相当多还是研发和创新的对外投资，主要是并购外国的研发机构、并购外国的创新型公司等等，总体而言上海的开放性是比较明显的。

记者：在一个采访中，毕马威的科技行业主管蒂姆·基尼提出一个观点说“创新已经呈现去中心化的趋势”，这似乎与我们所说的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矛盾，您对创新的“去中心化”有什么理解？

李万：“去中心化”不是不需要中心，而是可以从三个层次上去理解，第一个层次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创新 3.0 有关，创新 3.0 实际上是称之为嵌入式创新。创新 1.0 是企业、研究院、大学自己做，以技术研发线性模式为特征的封闭式创新；创新 2.0 是以产学研合作为特征的协同创新、开放式创新；创新 3.0 不仅是产学研的结合，而且更多的以众包、众筹、众创的形式开展。那么这从地理空间上来讲，会分布的更加广泛，当然它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我们互联网相关的技术日臻成熟。所以说这个层次的“去中心化”，它是通过互联网把更多人的想法纳入进来，这实际上也是互联网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

第二个层次的“去中心化”，我的理解是因为现在正处于新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的过程中，大量的技术领域都涌现出很多新奇的东西，这种新奇的东西它不像以往由很多大公司做

一些集中化的研究就能够做出来，现在更多是鼓励中小企业、更多的创业团队去大量试错，这就呈现出它和原先的不同之处。同时很多大企业，它在做研发创新的时候，除了自己在做，还进行收购和并购，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层次的一个变化。

第三个来讲的话，可以理解是因为在科技革命的过程中，原有的围绕着整个中心的一些法则正在被打破，就是说要建立新的法则，所以说从地理空间上、企业的范围上、企业的边界也有大大的突破，然后从科技本身发展角度来讲，边界也在突破，于是呈现出一种网状的结构。原来的科技创新中心，我们称之为 **center**，但是我们今天的科创中心，我们可能把它称之为 **hub**，是枢纽的概念——它的存在，不是说地方全向中心汇集，而是由于它的存在，使得整个系统的各个节点之间的联系更加畅通。所以说我们一直讲上海是科技创新中心，实际上还是一个 **hub** 的概念。我们强调上海对长三角的意义就在于不是工业时代的“中心”，而是长三角在互动中共同来做，这样上海的服务功能更加强大。

而且，由于今天的科学技术已经比 10 年前、50 年前的技术体系要复杂得多，所以现在搞一个研发，我把它称为“两极分化”。一方面比如说像 EURATOM（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核聚变的投入都是天价，保守估计一百多亿美元甚至更高，但是另外一方面创新又无处不在，因为知识的共享方便，泛化的创新很多。所以我理解的“去中心化”，是对一个城市，特别是对于一个经济首位度城市来讲，它的包容性、它内部的创新、物种的丰富性，创新生态、创新雨林的充沛性，反倒让它有更多的机会赢得未来研发创新的集聚。

还有一点是，由于现在交通技术的发展，科技创新可以更加分散化，这种分散并不是颠覆了原来研发的规模效应，相反其实可以在更大尺度上，更好地利用规模效应。比如说原来上海有 60 万人在做研发，现在交通如此便捷，可以把周边城市的人都给囊括进来，所以这种空间尺度也在发生变化，“去中心化”对大多数城市来讲其实是非常好的机会。

用法制化和市场化的手段来保障绿色投资收益与风险的匹配

——发展中国高质量绿色金融

记者：杜岸树



张俊杰

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
副教授

「绿色金融作为一个新概念被引入G20峰会的话题，绿色金融体系的建立已上升至我国国家战略，也是我国实现绿色转型的一个重要经济手段，实现绿色金融的发展需要中国政府的政策引领，也需要民间的资本投入；我国政府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治理环境问题的决心为绿色金融的发展带来良好开端，加强法制政策的建立，实现绿色投资的收益和保障投资者风险，是接下来稳定发展绿色金融的两个核心；我国在一带一路的投资也是发展绿色金融的一个亮点，通过建设高环境标准的基础设施，带来环境收益，撬动国际资本投入」

记者：实现绿色金融需将环境效益考虑进投融资活动中，但该投资涉及环境外部性、环境风险、中短期收益低等问题，您认为落实绿色投资者收益的方法有哪些？

张俊杰：绿色投资收益回报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者在投资绿色项目过程中，无法在社会收益和环境收益方面得到实际回报。所以保障绿色投资者合理收益的关键和实现绿

色金融的核心是实现外部性内部化，具体是将负外部性内部化到企业投资成本中，并将正外部性带来的社会环境收益回馈到投资者。落实内部化的方法可从两点考虑，一是通过市场力量实现，但外部性正是市场失灵的原因，是市场的一个弊端；目前只有少数企业，出于社会责任自愿实现外部性内部化，如一些公司主动使用可再生能源。二是通过政府的力量，制定合适的、可广泛用于各产业的绿色金融政策才是关键。尤其针对中国国情，制定绿色政策才是实现污染成本内部化、绿色收益内部化的根本，也是促进绿色金融的主要动力。在政策制度方面主要聚焦于如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污染企业的成本，以及推进环境守法新常态提高绿色企业的收益。目前八部委已联合发布了如《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等指导文件，大力推动了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

记者：您认为现在是我国推行绿色金融的好时机吗？

张俊杰：现在是一个好的时机。过去环保部门相对弱势、执法权力不足、环境保护经常让步于经济发展，但近年来我国环境治理的决心不断加强，环境监管在不断增强，执法力度也不断加大，对地方政府严查，对污染企业进行严惩，尤其 2016 年我国成立的中央环保督察组，由中央政府运用党的纪律来落实对各地方的督察效果，从而保障了强大的执法能力与信息公开。

绿色金融的发展核心在于，政府制定合理的政策，使绿色投资和污染性投资成本对比发生变化，从而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中，绿色投资能够获得比较优势。所以加大执法手段和力度，提高企业的污染成本，制定政策，落实绿色企业的产品收益，在这些背景下才能有效落实绿色金融。在中央决心铁腕治污的大形势下，为了帮助大量污染型企业进行转型，2016 年将绿色金融列入了杭州 G20 峰会的议题，使绿色金融的发展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次；总体来说我国现阶段推行绿色金融，发展前景是值得期待的。

记者：社会民间资本是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一环，为实现绿色金融的良好运营，您认为有哪些方法手段可以提高社会资本对绿色产业投资的积极性和持续性？

张俊杰：调动民间资本积极性的关键，是让企业对绿色金融感兴趣，为此我们首先需要保障社会部门投资绿色产业，带来的正外部性收益能够内部化到企业的利润中。；其次要尽可能降低绿色产业的投资风险，绿色金融投资的相关领域如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的开发利用等，都涉及到长期的投资过程，而社会部门多偏好于投资短期获得收益的领域，针对这一问题需要绿色金融政策解决投资期限的错配问题。另外，当一项新的环保理念项目出现时，民间投资者的风险可能很大，可适当对高环境收益的项目进行政策扶持，吸引社会部门的长期投资，从而发展此类当前风险很高、但长期可带来诸多益处的新项目。

记者：实现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需要面临环境风险评估、环境数据质量、中小型污染企业多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您认为解决此类综合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张俊杰：首先，银行对绿色金融体系是有实际需求的。除了国家相关政策要求银行建立一个绿色金融体系，此外还有银行的自发需求。随着我国对企业在污染与环境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银行贷款给污染型企业面临的风险在加大。所以银行自己也有动机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最好的方式是通过绿色信贷评级来评估环境风险，对企业进行环境评级，帮助银行减少因规制而带来的信贷风险。我国已经建立起了环境信用评价体系，银行可以将此作为贷款的一个重要依据，这是一个落实绿色金融的有效工具。

其次，环境数据质量是实施绿色金融的信息基础。为了保障企业上报的环境数据质量，企业有关领导必须要对数据负责，做到谁签字谁负责，同时也鼓励知情人进行举报。我国的

环境数据质量不佳，原因还是在于我国统计制度中对造假的惩罚力度不够，除了一些引起群众广泛关注的问题，多数企业数据造假被发现后没有面临相应的严重后果，缺乏报送真实数据的动力，这需要政府从法制层面来改进。

第三，针对中小污染企业太多，法不责众的问题，我国目前已在大力推动环境守法和执法，实现网格化管理，发挥地方政府应尽的环保职责，提高环境管理效率。随着环保督察的严格化，很多中小污染型企业不再生产，且随着我国环保审批更加严格，大量中小污染倒闭转型后很难重建，源头上预防污染企业的出现，从而也激励了已有污染企业进行绿色转型。

记者：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在环境问题的处理和概念上常参考发达国家进行，G20 峰会开办后，中国在国际上可以开展哪些合作来发展绿色金融？

张俊杰：现在国际间绿色金融投资主要是绿色债券的形式，一般情况是各国在发达国家发行绿债，获得投资，因为发达国家在资本市场和环境标准两方面更占优势。对于中国，一个潜在的亮点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开展国际绿色金融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都是污染密集型国家，且需要解决基础设施问题，因此对绿色金融有着潜在的需求。中国在推行“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时常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面临环境和社会问题的风险。如果我们通过绿色金融来进行投资：通过建设高度符合环境标准的基础设施，这种新的绿色金融形式可以有效降低投资风险。如我国在巴基斯坦投资的贾姆肖罗火电站，该火电站采用了全球先进的排放标准，能够在保障经济性的同时降低污染水平，可以是一项绿色投资。所以发展我国对“一带一路”中的绿色金融值得关注，既可实现最小的环境影响，又可撬动到来自国际上的投资。

记者：您认为中国在发展绿色金融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张俊杰：我们的环境法制体系尚未成熟。近年来环境执法力度大幅度提高，是通过党纪来实现。环境法的严肃性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我国现阶段面临的很多环境问题，都与法律制度保障的不完全有关，因此需要建立起环境法制的传统。以往大量污染型企业是在地方政府的默许下进行的，只有通过建立严明的法律体系，才能根本上解决此类问题。比如加大对地方政府惩处，使其报送正确的数据，不再庇护地方污染型企业，自发建立严格透明的环保执法体系，这既是我国发展绿色金融的长期保障，也是实现我国绿色转型的保障。

记者：在政府力量推动绿色金融发展这一方面，您认为美国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中国发展绿色金融有何影响？

张俊杰：政府方面，美国能源部有一个可再生能源贷款担保政策，即政府筛选出一些企业进行担保，获得担保的企业可以获得银行大量贷款。但这一政策充满争议，因为其违背了市场竞争的公平原则；所以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推动绿色金融主要是自下而上的过程，由企业自发推进。因为美国有较为完善的法治体系，这种完整的法制体系保障了环境保护是美国企业中的重要一环，从而保障了企业自发推进绿色金融的可行性。

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巨大倒退。虽然美国联邦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很多私人部门还是在自发采取措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不应该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决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绿色金融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长远来看实现绿色转型更有利于我国的发展，所以我不认为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会对中国造成影响。

中俄中亚合作，需要更多的信心和耐心

记者：赵佳宁



强晓云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副主任

「当前是中俄推进欧亚政策、促进欧亚联结所面临的最大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很多困难，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中亚双边和多边政治关系的友好互信是合作的大前提。」

记者：中国以“一带一路”的经济联合、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为基础，近年来不断推进与俄罗斯、中亚各领域的合作互信。在当今国际局势背景下，您怎样看待中亚地区对中俄的意义？各方合作的基础和动力何在？

强晓云：中亚地区对中俄都具有重要意义，中俄、中亚的合作具有历史渊源和现实发展中的共同利益，同时又具备友好互信的政治关系这一基本前提，合作的推进便是自然的、必然的。

对中国而言，中亚是我们的陆上邻国，中亚地区的稳定对中国的安全稳定永远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层面双边和多边的能源、商贸、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也在不断推进。对于中亚国家来说，“丝绸之路”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名词，代表着在历史上中亚国家怎样积极地参与到“国际化”、走向外部世界的过程；另一方面，中苏在历史上有过交好的时期，曾经属

于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中亚国家对中国也有历史情感。经济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对中亚的贸易额也在不断增加；中亚是中国油气能源的重要进口来源，中国是大多数中亚国家第一或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在经济上对彼此互有需求。长远来看，中亚国家面临国内经济、产业的转型，中国完全有能力在资金方面、在产能方面进行合作；中亚国家也希望从中国得到资金、技术的支持，来推动国内工业体系的建设和转型，这为双方的长期合作提供了可能性。

中亚对俄罗斯更具有历史上形成的特殊意义。苏联时期现在的中亚国家是苏联的一部分；俄语是中亚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交流沟通的主要语言和媒介；中亚国家也是俄罗斯目前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地区多边机制的成员国。地理位置的紧密相连、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与交往联系使中亚历来都是俄罗斯外交的第一优先地位；俄罗斯每一个外交战略构想中，第一个优先方向一定是和独联体国家的关系。不论外部世界的形势怎么变化，这都是俄罗斯的基本利益。

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中亚双边和多边政治关系的友好互信是合作的大前提。友好的政治关系才使其他各方面的深入沟通与合作具有可能性，为中俄与中亚合作打下坚实基础。中俄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个大国之间有友好的关系，也方便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实现自己的利益。各方都有合作的意愿，又具备合作的客观条件，合作自然是水到渠成的。

记者：子论坛中有学者提到防止中俄两大国在中亚的冲突与博弈是中俄与中亚融合的一个很大挑战。从传统地缘政治思维来看，中俄在中亚具有竞争结构关系，但实际上中俄在欧亚政策上对彼此持什么态度？您怎样看待中俄在欧亚地区合作、一体化中的关系？

强晓云：对于中俄在中亚地区合作的关系，我不倾向于用“竞争”“博弈”“扩张”这些

词语，我会倾向于用“参与”。参与中亚事务不仅符合两个大国在这个区域的利益诉求，同时也符合这个地区其他国家的发展需求。在欧亚地区，中俄实际上起到了“稳定剂”“压舱石”的作用；中俄两国有共同的维护自身外部安全稳定的诉求，并且也愿意当地区稳定的促进者，对于整个地区的稳定就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经济领域确实不可避免存在中国因素和俄罗斯因素的竞争，但两国领导人都很有战略眼光，有意识地不让这种经济领域的竞争被政治化。“冲突”和“博弈”意味着必然有输家和赢家，不是一种双赢的概念，这样就主观上“塑造”了一种对立——这种西方传统的“冷战”逻辑是不利于区域合作的。在地理、历史渊源和当下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中俄在中亚地区推进合作是必然选择，需要“不忘初心”、坚定信心，更多地去寻找双方的共同点。所以中俄在中亚的合作，很多时候是做得多说得少；不以现实为依据的争论和质疑是没有意义的，做出来的成果人们自然会看到、会承认。

记者：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公共咨询委员会委员沙伊梅尔格诺夫曾公开认可了中国“一带一路”推进以来给哈萨克斯坦带来的机遇和长足发展，但这一倡议也不可避免地伴随质疑和争议。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的欧亚政策近年来取得了哪些成果？中亚国家的官方和民众分别有怎样的认知和看法？

强晓云：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官方互信程度都是非常高的。中国和俄罗斯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中亚的双边和多边经贸交流也逐年增长。在区域合作机制中，除了土库曼斯坦是永久的中立国，其他中亚国家都是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安全互信、政治互信、军事互信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

在绝大多数中亚民众眼中，中国人和中国国家形象也是比较正面的。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官方有意推进民间教育、学术、文化、交通等多方面的交流，以推动民众的相互了解与信

任。教育方面，2016 年哈萨克斯坦到中国的留学生有 1.1 万人，俄罗斯到中国的留学生则有 2-3 万；中亚国家和俄罗斯留学生对中国的偏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的信任和肯定。学术方面，关于欧亚区域关系和“一带一路”建设的论坛、研讨会、学术交流项目总体上非常频繁；交通上，中国到俄罗斯、中亚国家主要城市的航班明显增多，为民间交流提供交通上的便利。

记者：针对欧亚，美国也曾提出“新丝路”计划，以推进在该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落实其“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美国等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欧亚政策做法有何不同？您怎样看待中国欧亚政策的基本要义和价值取向？

强晓云：最核心的是“三不”原则，即不谋求地区领导权、不塑造势力范围、不干涉内政。在交往过程中，中国尊重对方国家的利益——既尊重中亚国家的利益，也尊重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其次是“互利共赢”“平等共建”的原则，合作过程中强调多边共商、共建、共享。不论是“一带一路”的推进还是双边层面的经贸合作、安全合作，各个国家有什么诉求，甚至在具体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和分歧随时都可以停下来沟通和协商。中国不搞“一言堂”，不要求中亚国家按中国的政策来做，而是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态度。

还有“包容”的原则。中国不仅接受有利于自己的地方，也包容中亚国家自己的想法。中国与中亚国家进行战略对接时，听取各国不同的诉求，允许各国有不同的想法，但是主张各方可以通过沟通一起寻找最大公约数，找到利益的交汇点。

记者：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两个项目以不同大国为主导，但是在区域和成员上重合；除此之外欧亚地区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体化机制。您认为欧亚地区的一体化机制是否存在“碎片化”的趋势？欧亚地区不同一体化模式应

当怎样协同？

强晓云：有一定“碎片化”的迹象，但并不是欧亚合作的主流和趋势；这个迹象通过协调是可以处理的，因为各国都是希望地区的发展和稳定，不同机制之间协同的向心力大于离心力——“碎片化”不是目的也不是必然的结果，而是欧亚各国在探索合作和一体化模式中出现的插曲。“碎片化”显然不利于和平共建，共同向好的意愿、内生的合作需求，是不同机制之间寻求合作、化解矛盾的基础和动力。中俄在中亚地区比较大的几个国际机制中都起到重要作用，中俄可以在不同机制的协同中做出努力。

记者：中俄、中亚区域合作开展到今天，您怎样看待当前中俄推进欧亚政策、促进欧亚联结所面临的最大机遇与挑战？

强晓云：现在就是最大的机遇。中俄两国对于地区发展同时提出自己的倡议，都希望在中亚地区展开广泛的、各个领域的合作，实现共赢。双方友好共赢的共同意愿就是推进合作最大的机遇。

比起“挑战”，我更愿意说是“困难”。一方面是安全上反恐反毒的压力，另一方面是经贸深入合作中遇到的摩擦。安全方面，伊斯兰国被打散之后有回流的迹象，中亚成为其回流、扩散的一个通道；毒品贸易是恐怖分子重要的经济来源，中亚是毒品从阿富汗向欧洲、向全世界扩散的通道之一，影响区域安全。经济领域的困难一方面是贸易标准不统一，另一方面是中亚营商环境仍需改善。比如中吉乌铁路就遇到铁轨轨距标准、质量标准的问题；中国是WTO成员，采取国际标准，但中亚一些国家对这些标准的认知和执行程度比较低，导致项目开展过程中遭遇分歧。另一方面，一些中亚国家治理能力参差不齐，营商环境中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腐败等影响市场秩序的乱象，损害我国当地企业的利益，影响我国企业去投资营

商的热情。

即使有很多困难，只要我们对俄罗斯、中亚国家的信心存在，这些问题都不是不能解决的。对处在转型期的国家和地区来说，信心和耐心是必要的。急躁不利于我们看到问题的本质、找寻解决的方案；有信心和耐心，才能少一些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干扰，少一些摇摆和自我怀疑，路就会走得更踏实。

记者：5月17日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代表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6月上合组织峰会也即将在青岛举行。近期的这些新动向将给中俄与中亚合作带来哪些前景与新的可能性？

强晓云：我觉得下一步会讨论一些具体的事情，目前达成的共识和协议要进一步落实下去，在合作机制上也会做一些完善，总体上是在不断向好发展。在上合的机制下，现在成立了很多部长级会议的机制，各个领域的合作都展开和细化、持续开展下去，在落实中可能才会发现有新的问题出现；合作的信心和向心力不仅在于签约本身，更在于具体的落实。另外，上合现在还要再加强亲民性，让成员国的老百姓切实地知晓并感受到上合具体是怎样的组织，带来了哪些利好。

我们的目标是长远的，但路要一步一步走，归根结底还是要多一点信心和耐心。各国应静下心来持续友好互信地针对不同层次的具体议题深入交流沟通，从彼此的关注点中寻找我们关注的共同焦点、寻找利益诉求的最大公约数，推进合作不断深化。

坚持政府监督管控 促进新时代下金融经济平稳发展

记：朱安迪



杜巨澜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教授，2000 年担任世界银行顾问，2003 年至今担任香港大学财政课程的外部特邀评审员。

「近年来，金融创新活动不断涌现，新兴区块链技术和信息技术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发展变化莫测，这在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提供无穷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十九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当前的环境下，坚持党和政府对金融经济发展的管控监督，促进新时代下中国经济的平稳持续发展。」

记者：近年来，全球范围内金融创新活动不断涌现，您认为在此浪潮之下，中国经济具体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杜巨澜：机遇方面，以我们的举国体制和治理模式为核心基础，更适宜引入发展成熟、风险小的创新模式，结合我国需要适当引入金融科技类创新活动产品，如服务类行业、支付数字化等。

挑战在于，从中央对金融工作的指导方向来看，“求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

金融工作的重要任务是控制与防范风险，因此对监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产生新的金融现象，法制环境、监管环境跟不上，容易造成一哄而上，引发欺诈、违规事件。第二，金融创新与助力经济稳定之间的“度”很难把握，多次金融危机都显示出金融工具使用不当就会酿成大祸。因此在金融创新活动发展迅速的现实下，必须维持以间接金融，特别是国有银行为主导的体系，有助于党和政府控制金融资源，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牢牢把握银行的主导性，逐步推进银行、金融体系的改革。

记者：近期区块链技术和比特币引起广泛关注，有人认为其特点在于“去中心化”，您刚刚指出应对经济挑战需要坚持党和政府的管控。那您如何评价区块链和比特币这种经济活动？

杜巨澜：这种“去中心化”的经济特征与我们的治理思路是相违背的。我国经济发展强调进行集中统一的领导，管控经济风险。民众对党和政府有很强的信任，往往将责任主要放在政府和党的身上，这种金融观念和行为方式，使政府需要预估各种创新活动所能产生的风险，同时承受很大压力。比特币不仅性质不清，而且很可能形成各种欺诈现象，在我们的管制模式下是不合适的。因此，具体的创新活动是否要真正实施，还是要着眼于现实的管控模式。

记者：您在“从 811 汇改看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中指出，811 汇改造成动荡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政策出台前与市场缺乏一定的沟通与透明度。那么增强政策透明度是否有利于党和政府管控经济？

杜巨澜：811 汇改造成动荡主要由于当时正处于股灾后不久，时机敏感，中国经济体量

增大，在世界经济增长的方面重要性日益增加，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是否增速放缓，从而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非常关心。此时出台人民币贬值政策，事先缺乏与市场的沟通，导致国内外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强烈悲观情绪，引发隐藏的资本外逃行为。不得已，政府出手干预，控制资本外流，基本稳住了汇率和外汇预期。增强政策颁布的透明度，与市场进行必要沟通，才能更好发挥政府管控经济的影响。

其次，811 汇改其实与汇率和人民币国际化有关，但我个人并不认同借此推动经济增长。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否成为国际主要货币，首先要能自由兑换，之后是随着国家整体经济总量，人均 GDP 水平，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升级，贸易投资范围和辐射力逐步扩大，别国也确实需要这个国家的货币，这时成为硬通货，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如果倒置因果，单纯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促进经济增长，这种政策导向从实践而言意义不大。

记者：据麦肯锡报告显示，中国电子商务和数字支付已经领先全球，对世界经济具有很强的影响力。那您如何看待通过发展电子商务和数字支付，增强中国经济的影响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观点？

杜巨澜：第一，电子商务和数字支付在应用层面适合我国的国情和文化。首先，我们在文化思想的基础上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传统。其次，近年来制造业有所萎缩，提供了大量低成本劳动力。同样的情形置于西方国家，成本则显著上升，出于这方面考量，他们对此的参与并不多。

第二，电子商务更多是商业模式的微型创新，在制造业萎靡的情况下，它助力于经济发展。但过度侧重于商业模式的改进，对于中国经济实际的生产能力提高有负面影响。传统制造业主要依靠加工、组装，盈利空间小且成本不断提高，高端制造业对国家支持和国外的依赖性强。而电子商务的发展会将本身用于技术创新、基础性高端制造业的资金吸引过去，造

成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投入不足，长此以往导致经济空心化、商业化倾向。

记者：有人认为最近中美贸易战反映出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而您刚刚指出制造业实际上对国外的依赖性是比较强的。那么在这种“逆全球化”的现象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否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杜巨澜：中美贸易战加剧中国经济需要应对的挑战。贸易战前，在宏观货币供应层面就采取了实质性的放松政策，这反映出中央对贸易战可能的负面影响是非常担忧的。而中国经济对美国的依赖度是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度的，很多西方制造业的厂商逐步向东南亚转移，并且美国本身农业较强，我国在农业发展上也存在着挑战。所以，这对提高自身的产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记者：那您认为在坚持党和政府的管控下，应如何提高产业能力？

杜巨澜：第一，提高创新程度，兼顾收益成本，实现技术持续更新。这是商品型产品竞争的关键。政府一直有实施支持产业发展的相关举措，比如芯片行业。关键在于获得政府支持后追赶型创新能达到什么程度很难判断，这是芯片行业这类商品型技术不同于原子弹、氢弹的地方，后者没有买卖关系，所涉及的是“能不能做的问题”，而前者则关系到商品买卖交换与同步更新。

第二，立足于市场经济，实现产品性能接近以后，后续发展如何在成本上保有优势，产生出可持续自身动力，不再需要政府大量投入？这是关键。我们的体制针对此问题应该能够有所作为，且在追赶型技术上适合由政府提供最初的动力。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政府有没有能力将资金真正投入有实力的企业？因此稳妥的办法就是投向国企，由此牵扯到国企改革

革，国企有没有动力在拿到政府的钱后进行有效快速研发？

记者：十九大之后，几乎所有中国问题专家都认为国企必须进行改革，德国《世界报》指出如果不采取措施，最迟 2022 年将面临困境。那您认为，为了避免陷入困境，提高产业能力，国企应如何进行改革？

杜巨澜：外媒对国企改革的诟病，主要是感到方向上的矛盾和混乱：去杠杆、去过剩产能与做大做强之间存在矛盾。

在国企内部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或通过资本运作而非具体管理经营。从目前顶层设计而言，国企的地位不会动摇并且重要性会进一步加强，国企、国有银行是党和政府管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但实践中不成功之处在于，混合所有制一方面国家要控股有控制力，同时要吸引非国有资本参与，而后者参与的出发点更多是响应政府号召、搞好与各级政府的关系，投入最终能获得多少回报和话语权值得商榷。因此此模式的完善还有待探索。

目前国企数量不太多，且主要控制国家重视的关键性行业领域，近年来国家也通过民营化等方法分离绩效长期较差的国企。如果能保持国企成为重要领域龙头并维持较好收益，也有助于经济发展。国企有利于国家管控，担负社会责任和政治目标，不能单纯从营利性考虑，更多要从长期的、社会性角度综合考量。

记者：您曾针对“脱贫”问题简要分析了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并提出贫困家庭更易获得非正规金融资源，但往往对贫困问题的解决没有实质影响。如今关于脱贫攻坚的问题您有何理解？

杜巨澜：根据以前的数据，我们发现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基本是“锦上添花”，而非

“雪中送炭”。农户获取这两类贷款大多取决于自身资产收入等等。进一步看，农户即便获得了非正规金融体系的信贷，大多用于看病婚嫁丧葬等生活急需，真正投入生产性活动的不多。贷款在扶贫中的作用是世界性难题，特别是能否善用的问题。早年孟加拉等国有小额信贷实践，我国近些年也有类似实践，但在成效上还不能说很成功。

现在提出“精准扶贫”方向很好，我国对民生有相当重大的承诺，如果能在政府引导牵头下，多一些贷款机构，发挥管控引导作用，有助于解决贫困问题。政府在管控中会面临很多困境，资源能力也有瓶颈，而过多放任社会性组织自发处理，又会形成新的矛盾，特别在扶贫贷款上很容易产生经济纠纷、社会矛盾、监管困难等。因此，既要加强党和政府的管控引导，也要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以解决政府的资源瓶颈问题。而这两方面如何实现平衡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新形势下的北极开发与保护

记者：陈思宇



李丙瑞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极地海洋研究室副主任

「北极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对北极的任何开发一定要保证不会对北极环境污染的前提下展开，这样北极的明天才会更美好。」

记者：目前我们是怎么观测海冰的温度，厚度的变化和海冰融化速这些关键指标的，
您觉得目前有哪些新技术可以运用到这方面

李丙瑞：海冰的温度可以通过遥感来测，但遥感只能测其表皮温度，其实北极冰一般都有好几米厚，用温度传感器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我们在多年冰周围布放浮标，浮标携带着温度传感器对北极多年冰进行立体的温度记录。通常一个浮标的生存周期约一年，就可以知道北极冰在这一年的温度变化情况。厚度的测量也可以用遥感，但目前遥感的测量值误差较大，也可以通过浮标来测海冰厚度，在浮标上下各安装一个声纳，就可以测量出来海冰的厚度了，我们还可以用激光高度计来测量海冰厚度，先测量海冰露出海面的高度即干舷高度之后再推算出整个海冰厚度，此外还有电磁感应方式来测量海冰厚度。目前，还没有什么成熟

的新技术运用到测量海冰厚度，不过其遥感反演算法一直都在不断研究和更新。

记者：北极污染源多是通过强空气流动、河流、洋流由低纬度地区传送至北极，由于北极纬度高、气温低，有害物质容易储存，且不易向其他地方扩散，使其成为了有害物质的“储水池”。目前有没有一些新技术可以运用至此来解决北极的污染源的问题？

李丙瑞：目前北极的环境污染情况很严重，从北极渔业捕捞中检测出来重金属元素。目前的技术也只能检测污染，对于解决北极污染源的情况，还是得世界各国都注重环保，让流入北极的污染物减少，全球都注重环保才能让北极的明天更好。

记者：中国的北斗系统在北极开发和保护方面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目前在北极保护上运用了哪些我国的新技术和我们提出的新方案？

李丙瑞：北斗卫星系统还没有覆盖北极，但想必将来可以运用到北极航道的导航等一些领域上。在北极保护这一块我国目前还插不上手，因为地缘政治的因素，北极目前被北极圈中的八个国家所掌控着，其他国家仅为观察员国。

记者：中国在极地研究和极地保护方面跟与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这些极地考察强国比还存在哪些差距？

李丙瑞：我们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基本上是全方位的。在后勤补给上我们国家跟这些强国较小，但在科学研究方面，我们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距离这些强国要较大差距。很多，我们现在只能说是极地考察与研究大国，但离强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记者：目前北极地区围绕海洋权益的地缘政治竞争愈演愈烈，虽然北极事务与整个北半球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我国属于非北极圈国家，我国对开发和利用北极存在哪些困难？目前我国成为北极观察员国，这对我国今后开发和利用北极有哪些帮助？

李丙瑞：我国是北极域外国家，单独开发是不可能的，可以和环北极国家进行合作开发。。在 13 年我国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后，我国跟北极理事会成员国的合作开发北极机会会逐渐增多，将来可能会跟这些国家在多领域进行合作。

记者：北极航道是连接东北亚、欧洲和北美三大经济圈距离最短的海上通道。中国是全球贸易体系中最重要国家之一，外贸货品中 90% 以上经由海运实现，我国在开发利用北极航道方面该如何战略布局？

李丙瑞：北极航道我们已经关注很长时间了，我们一直在做北极航道的环境监测和北极航道的预报保障系统，科技部在这方面给予了较大支持，目前我们已经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和储备，并应用到了中远船舶北极通航。

记者：北极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航运资源、渔业资源等也让各国跃跃欲试。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该怎么协调？

李丙瑞：不同的海域、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标准。北极有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在开采时候一定不能发生漏油等污染事故，一旦发生很难控制，而且影响非常严重。因为北极冰开的季节只有两三个月，如果这两三个月里不能将污染物处理干净，一旦海面冻结，这些油污

等污染物会随冰漂流扩散。所以对北极的任何开发一定要在保证不会对北极环境污染的前提下展开。

记者：近一段时间以来的极地争端愈演愈烈，众多国家对北极地区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这些争端将会对极地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您觉得未来在北极治理上运用治理南极的“南极模式”是否合适？

李丙瑞：南极是一个没有主权归属的大陆。在 1994 年续签订的《南极条约》中说到，对南极领土主张要求冻结 50 年，所以目前南极是一个没有主权的地区。这就跟北极完全不一样，另外南极资源的开发很困难，开采成本之高，基本没有国家进行开发。所以“南极模式”在北极是不合适的。

坚持互利互惠，切合实际需求，扩展多边合作

记者：张贝璘



李明江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RSIS）副教授、中国项目主任

「从大国竞争的角度来看，中国需要更加包容和开放，鼓励和欢迎其他大国参与“一带一路”项目，以避免“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领导，被中国垄断，被中国用作战略工具。」

记者：您之前在子论坛发言的时候也谈到地方政府在一带一路重要性，请问地方政府具体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请问地方政府的作用力？

李明江：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地方政府过去十几二十年和周边国家的交往，尤其是中国边疆地区，如新疆、云南、广西、黑龙江、内蒙古等等。其中，体现得更明显的是云南和广西。他们在过去十几年二十年一直在推动跟周边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人员来往、投资贸易、非传统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不仅做了大量的事情，也提出了很多倡议。因此，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得益于这些沿边省区这些年所做的努力。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到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它的具体实施在很大程度

上需要沿边的省区去推动、落实。而且，“一带一路”倡议从中国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说是一个框架，而这个框架要有实质性的东西也需要地方政府提出并落实具体项目。因此，地方政府另一个重要角色在于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项目。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中国二十多个省级地方政府都拿出自己的“一带一路”方案，而且也提出很多项目、拿出很多资源。从这个角度来说，地方政府是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一股很重要的力量。

记者：在您发言结束时，您也提到地方政府有助于缓解诸如主权问题的挑战与疑虑。

请问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个观点吗？

李明江：中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互利互赢的经济合作方案。然而，很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个大战略。他们认为中国除了经济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利益诉求，如地缘政治、安全、政治等，所以对中国有些警惕。此外，这些国家也会担心“一带一路”倡议是否会使他们对中国形成经济、金融或债务上的依赖，而中国是否会利用这种依赖对其他国家实施压力，要求他们在争端问题上对中国做出让步。因此，如果从中国中央政府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这些国家或多或少都会有些防范。

但如果这些具体项目是由地方政府提出，其他国家这方面的顾虑可能会少一些。因为地方政府基本上就谈合作、谈经济，所以会淡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政治色彩。这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国家的担忧，但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样的顾虑。

记者：您刚刚提到“一带一路”倡议应该是互利互惠的，请问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时应该如何保持更大的互惠性？

李明江：只要是合作，就必须照顾到对方的利益诉求。中国在这方面也确实比较注意，

确保不是所有利益都由中国一家独揽。但从其他国家的角度来说，很多国家认为中国在这种合作中获得更多。当然，每个国家的都希望自己国家获得更多，这就存在公平性问题。

因此，首先要平衡利益分配。中国作为大国，是一个更大的经济体，也更有能力照顾别的国家。因此在项目设计、资源投入、利益分配等方面，中国或许可多为其他国家考虑一点。比如中国在“一带一路”的一些基建项目中，中国的贷款利率，和日本主导的亚开行或是世界银行的优惠贷款相比，还是偏高。另外，涉及到中国的投资和基建项目时，中国公司承包的工程项目方面，中国企业过去总是喜欢从国内带员工、技术人员、劳工去。但对方国家希望中国的投资可为他们带来就业机会、技术转让、人力资源培训和某产业整体发展等更长远的利益。

总的来说，中国可对周边国家做出很大贡献。中国周边国家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技术水平都比较落后。除了投资之外，中国现在有很多资金和产能需要走去，对周边国家都能产生各种很实在的好处和利益。技术方面，中国有些方面确实能和其他国家分享。这可通过培训、技术转让、合资等方式实现。另外还有教育、扶贫、改善电力、生活用水、工程、制造、交通管理等方面，中国实际上已经非常成熟，可以帮助周边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在这些方面都可以做很多事情。

记者：如何确保这些项目切合实际情况，实现效益最大化？

李明江：这就需要中国各个层面的参与方和当地的政府机构、社区和社会团体多商量，多听取当地的诉求。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周边很多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不是很透明，法治不是很健全。如何使当地民众社区从中国的项目中得到实惠这方面，中国可能也需要借鉴很多国际惯例。过去，中国都只是和对方国家的政府大交道，相对来说比较少关注与民间组织、社会和民众的直接交流。现在，中国也许需要借助一些国际经验，直接深入到社区、深入到

民间去，这有助于缓解对方国家法制不健全所引发的各种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现在基本上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产业合作，如果要使对方国家、企业、社会和民众利益最大化，那我们有几个问题需要谈。第一，从一开始就要把项目调研做好，把当地的实际需要、需求搞得清清楚楚。第二是规模，超前投资和过度投资会导致很多资源的浪费，所以要恰到好处，要注意到短期、中期和长期的需要。第三是要杜绝腐败，因为腐败会减少经济利益。第四是要平衡对方整个国家的利益和当地政府的具体利益。第五是如何让民众获得更多实际利益，包括就业、劳工标准、环保等。第六是要遵循市场规则。现在很多项目都是政府主导的，政府主导本身也是必要的，但是投资行为还是需要在很大程度上遵从市场经济，按照市场规则办事。因为人为设计很多时候会出现偏差、失误，只有市场知道怎样才能达成效益最大化，因此由市场来决定会比较好。

记者：您去年在 2017 年 1 月“环球中国、环球效应”的论坛中提出观点，认为中国如果希望“一带一路”倡议带来更大的效益，必须以更开放的姿态容纳其他大国扮演积极角色，开拓多边合作。请问您为什么这样认为？请问您认为这应该如何具体落实？

李明江：第一，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合作会使“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项目都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中国在基础设施等方面确实有很强的实力，其他大国可能都比不上中国，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但另一方面，中国并不是什么都可以大包大揽，不是什么东都有绝对优势。尤其是发达的大国，其他国家也有很多其他的优势，比如说技术方面、项目管理、发展援助管理等方面的经验。这些也是中国欠缺的。因此，客观来讲，中国和其他大国还是要合作才会使得“一带一路”倡议那么大范围内的项目都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第二，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一个大国提出一个宏大的设想，其他大国总会担忧这是否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工具，帮助这个大国扩展自己的影响力。因此其他大国可能会阻挠、不赞

成或者是反对，甚至破坏、削弱“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这会增加中国参与“一带一路”倡议项目的成本。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印尼雅加达—万隆高铁项目。中国和日本出于地缘政治、战略方面的考虑，因此在这个高铁项目上进行竞争，增加了中国参加“一带一路”倡议的成本。

因此，中国从大国竞争这个角度来说需要更包容、更敞开胸怀去鼓励、欢迎其他大国一起做“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各个项目，让其他国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完全中国主导、不是由中国一家做的事情、更不是中国的战略工具。过去几年，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少。中国没那么感兴趣鼓励其他大国来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希望自己能够占据主导权。那么现在其实大国之间在地缘政治上的较量已经很明显了。因此有很多“一带一路”上可以做、需要做的事情都做不起来，地区层面的多边机构也都无法利用起来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带一路”倡议会受到一定的阻力，而且这种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他大国。所以，确实需要中国和其他大国有更好的协调，也要有其他大国更好的参与，使“一带一路”倡议施行得更好一些。

第三，从资金需求来说，尽管中国有很多资金，但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资金需求庞大，中国仍无法独立解决。那么其他国家，尤其是大的经济体的参与会对资金问题的解决起到很大的作用。

具体实现方面，中国最近几年实际上已经下了很多功夫。中国希望争取美国的支持、美国的参与，对日本也做了一些工作。现在日本态度有一点点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愿意参与。日本官方没那么热情，比较倾向于鼓励日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印度还是比较明确反对，欧盟负面态度越来越明显。俄罗斯表面上支持，但实际上在防范中国，比如说在中亚、西亚、东中欧，俄罗斯都有比较大的防范心态。因此，“一带一路”倡议要获得大国的支持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一方面，中国可以继续对这些国家进行游说、进行解释，但另一方面也可以把“一带一

路”倡议放到更高层次的国际多边场合，比如 G20。中国或许可以把“一带一路”倡议上升到 G20 框架下的具体政治合作平台，不一定完全由中国主导。中国或许在某些方面能力较强，可发挥引领作用，但把“一带一路”倡议从一个中国发起、中国基本上绝对主导的东西发展成 G20 下面的多国协商合作，并由其他大国共同主导、共同推动的倡议也不失是一个选项。如果放在 G20 框架下去推，显然面对的阻力会更小，多方合作显然会更有前景。但是这同时意味着中国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一些绝对主导的地位，所以需要中国领导人衡量利弊，做出判断。但如果真的要让其他大国或者国际组织、机构更多的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范围内多边化是不可避免的，否则难以取得其他大国真心实意的参与和支持。

当LIFE走进现实生活：以社区为基础的老年长期护理项目借鉴

记者：王子煊



Eileen M Sullivan Marx

纽约大学护理学院院长

Erline Perkins McGriff 护理教授

「让老年人独立生活（LIFE）是一项针对老年人开设的以护理为主的全面护理项目。该项目由Marx教授在四十年前创设，已成为全球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最成功的模式之一。在本次采访中，Marx教授受邀分享了她在为老年人提供全面护理方面的宝贵经验，其中充满了各种深刻的理念，使我们受益良多。」

记者：昨天几乎所有发言者都提到了老年人的一些特有思维。比如，他们可能极度怀疑高科技产品的有效性，或者，可能过着极为节俭的生活，尤其在中国。或者在印度，一些学者认为，进入老年，随着健康状况的恶化，一些人可能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因此，我们的科技创新如何应对这种思维，从而顺利实现其目的？您是否做过有关老年人消费或治疗心理的任何研究？

Eileen M Sullivan Marx：我认为，如今并不存在这些思维，实际上，这些只是我们对老年人的模式化观念。从昨天展示的论文来看，我们当中部分人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过多地评判老年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应该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能够继续学习、继续改变，我们会变得愈加智慧，因为大脑和身体得到的锻炼越多，就越有利于改善健康。

因此，我不赞同学海有涯的说法，事实上，我也不会这么说，而说老年人不想学习技术，也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我们做出的这些苛刻的评判，对老年人是一种极大的伤害。

年轻时生活节俭的人，老来也依然过不来奢靡的生活。这是性格问题，而不是年龄问题。有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本身的特质只会变得愈加浓郁。因此，那些颇具幽默感、待人宽宏的人，会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保持这些特质。

那些所谓的思维只是人们对老年人的成见，对企业产品的开发毫无意义。如果你在开发企业产品，那么你面对的是所有客户，而如果你确实想要推出一种新产品，你就需要弄清、测试并关注客户群对销售运作方式和产品用途的看法。了解这些以后，你才能消除他们的顾虑，成功地把产品销售给客户。因此，如果公司对老年人存在诸多成见，在我看来，他们的做法是不对的。

记者：我记得昨天圆桌会议上的部分嘉宾谈到了缺乏老年消费者心理信息的问题。他们认为，政府和私营企业主有时无法获得充分的统计资料和数据，以便其做出正确的决定，因而无法保证其业务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产生利润。您是否认为这种信息的缺乏是一个大问题，是否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Eileen M Sullivan Marx：我认为，这种信息缺乏的存在恰恰解释了我们在关注大众群体的同时，有时候也需要关注小型区域群体的原因。

记者：我们刚刚谈到对获取小型区域群体数据的需要，那么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探讨技术创新过程中出现的区域差异问题。众所周知，区域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比如，在高科技产品的可达性方面，上海并非中国的典型城市，通常的情况是，新技术永远掌握在城市富裕人群手中。因此，当您在费城推行 LIFE 项目时，您是否考虑过区域差异问

题并做出一些改进？

Eileen M Sullivan Marx: 美国中部地区存在这类项目，因此你需要从某个地区的某部分人开始，运作这个项目。该项目围绕中心地区设立。美国各地都推行着不同的项目，但在费城，我们的项目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就是费城西部房屋的建造方式。该地区的房屋面积很大，彼此紧挨，几代人同住在一所房屋中，因此许多人都与年长者居住在一起，而其他一些地区则相反，只有退休的老人，却不见年轻人。因此，在费城西部，人们倾向于几代人共同生活。此外，还存在经济诱因。这些大房屋的实际所有人是家中的长辈，因此老年人在几代人共同居住的房屋中享有足够的空间。

记者: 这种设计体现了 LIFE 项目的人文关怀。您能进一步说明你们是如何把家庭成员也放在项目中心位置的吗？能否介绍一些措施和示例？

Eileen M Sullivan Marx: 要帮助改善社区，你不仅要为老年人提供老年健康项目，还要为孩子们开设好的学校并为成人提供就业。这样，上班族可以去工作，老年人可以去中心；晚间时分，他们可以搭乘公车回家，而孩子们则由校车接送回家……这样就会形成一个顺畅的循环，从而真正改善整个社区。

记者: 此外，您能否举几个除棋牌等传统方式以外的具体示例，以展示 LIFE 为提高老年人社交能力而进行的创新。比如，提供一些工作机会。

Eileen M Sullivan Marx: 在大多数情况下，老年人所做的就是和同辈人打交道。而在中心，老年人想做的可能是工作和帮助他人。比如，一个人可以帮助另一个人填写表格，而

另一个人或许多才多艺，就能为其他想要学习艺术的人教授艺术课程。有人或许擅长木工，而中心有男性，有时甚至也有女性，想要学习木雕或木工手艺，那么“老师”就会教授老年人木工等技能，然后获得一小笔报酬。因此，人们常常会发现，他们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技能和经验传授给其他人。此外，在美国其他地方，老年人认为自己可以发挥作用的另一个领域是零售行业。当你需要买一些东西时，你会去市场，在那里，老年人非常熟练地和一大群人打交道，他们很友好，会热情地为顾客展示产品，等等。如今，美国的许多老年人都在连锁超市 Home Dipo 中工作，因为他们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们知道如何使用 IPAD，能在超市各处找到人们想买的东西。因此，我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依然能为社区做许多事，做对社区有帮助的人。

记者：那么，老年人对上述各项措施有何反馈呢？我的意思是，他们愿意参加 LIFE 提供的课程和工作吗？是否有一些老年人更愿意独处？

Eileen M Sullivan Marx：我认为，没有老年人更喜欢与社区隔离的生活方式。偶尔也会有人更喜欢过与世隔绝的生活，但这只是个人喜好，与年龄无关。年轻时喜欢独处的人，老来也是如此。我岳父就是一个不喜被别人打扰的人。他三十岁时就是这样。不喜欢度假，只想一个人读读书，然后上床睡觉。这种喜好一直持续到了五十岁，甚至九十岁。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始终保持原来的喜好。但多数人是不同意离群索居的。若非性格使然，人类是不希望脱离群体而生活的。我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发现许多人会选择不同的社会化类型——一些人满足于使用电话和网络电话进行社交，每天与同龄人进行数次互动；而其他人可能会说“我只想每周进行一次互动”。这是因人而异的，但一般来说，人类不希望独自待在房间里，这跟监狱中的单独监禁有何异；被单独监禁的人，大脑会失常。

而在获得老年人的正确反馈方面，我们也需要定期而频繁地与老年人进行交流，让老年

健康项目的组织者们了解他们的想法。你必须询问他们想要什么，必须让他们发现和开发个人需求。

记者：但在一些最不发达地区，那里并没有连栋房屋，也没有可供几代人共同居住的大房子，或者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到远离家乡数英里之外的地方谋生，造成了“空巢”现象的发生。这些老年人该如何获得我们的项目呢？

Eileen M Sullivan Marx：有一些地方只有公寓楼和小群体，我们能为他们做的就是设立一家区域中心，提供娱乐和其他社会服务。我们也会提供必要的交通设施，让他们顺利到达提供这些服务或社会娱乐设施的场所，频率可能为两周一次。他们可以走出家门，进行锻炼。

农村地区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美国的一些偏远农村地区，如何帮助人们脱离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呢？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利用技术提供健康监测和通信设施，让那些地区的老年人觉得自己并不是孤立的个体。今天一些发言者讲到了“联网”技术，为人们提供一些技术网络，让他们相互认识；如果我们能够免费提供这些技术，也许会对那些落后地区的人们大有帮助。

记者：LIFE 和其他所有医疗保健项目需要各类高质量的护士。今天几乎所有嘉宾都提到了人才招聘和人才保留方面的挑战。此外，正如您在一篇题为“老龄化是人类对勇气和人类发展的体验”的论文中所提到的那样，到 2020 年，护理人力资源的缺口将达到 29%。美国的现状如何，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防止护理人力资源的减少？是否已经制定了任何激励措施？

Eileen M Sullivan Marx: 总体来说，随着更多年轻人成为护士，美国护理人员短缺的局面正在改善。各地区的短缺情况各不相同。比如，城市地区基本没有护士短缺的现象，但许多农村地区则不然。

记者: 当谈到 LIFE 的经费时，您用了“高度创新”一词。据我的理解，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该项目的覆盖面。您能否说明该项目是如何达到如此非凡的覆盖面的？早期 LIFE 是如何实现收支相抵的？赞助商是自然而然出现的吗？

Eileen M Sullivan Marx: 我们的项目主要由政府资助，但现在我们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对我们项目感兴趣的私人赞助商的支持。在 PACE 项目启动之初，为了获得政府资助，我们必须提供超过二十年的成功证明。这二十年的成功数据向政府表明，这一项目是值得推行的，能提供优质的护理。并且，这一项目是经济的。今天，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吸引私人赞助商。

事实上，四十年前，政府选择在无需提供任何成功证明的情况下帮助我们创建了这一项目。我们的项目起初就像社会项目，然后我们结合健康项目并把这两个项目组合起来，让其顺利运行；我们向政府展示了我们的项目及其运作方式。我们必须把社会项目和健康项目组合起来。回想起来，还是政府人员向政府论证了我们的项目是有潜力取得成功的。美国依靠人民崛起，并不奉行自上而下的统治。社区也是如此，人们说“看，这对我们有好处”，因此政府才会支持我们的项目。

记者: 您是否考虑过扩大 LIFE 的范围？您对此类项目的发展蓝图是什么？

Eileen M Sullivan Marx: 虽然我不再指导 LIFE 项目的实施，但 LIFE 项目确实在逐渐发展、壮大，尤其在宾西法尼亚州，那里分布着美国大多数项目。区域领导人必定同意实

施此类项目、提供资金并允许私人资金参与这些项目。这是项目发展的主要因素。尽管《平价医疗法案》提供了一些联邦激励措施，但只有地方州政府才能控制这些项目的多数财政拨款。

经济全球化中多边开发银行的参与

记者：张玉洁



Luciano Galvão Coutinho

巴西经济学家，2007 年以来任巴西开发银行 (BNDES) 主席。在他的带领下，巴西开发银行拥有超过 5000 亿美元的资产。2009 年，Coutinho 博士在 Epoca 的“100 位最具影响力巴西人”中脱颖而出，并被评为 2010 年度拉丁美洲贸易金融家。

「我们已经有一些系统来优化基础设施，但未来可以更高效。我们应该考虑到大多数基础设施必须能够数字化，与处理系统通信。它可以被做成云计算，但必须有智能系统自动将系统运行功效最大化。这将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因为它可以解决资源问题。我认为未来的基础设施将更加高效和智能化，我们必须在规划准备项目时考虑到这一点。」

记者：今年上海论坛的主题是“全球治理与亚洲”。与上一个主题“经济全球化和亚洲的选择”相比，2018 年上海论坛更加强调亚洲的责任和全球变化。你怎么理解这个新主题？

Luciano Coutinho：我认为今年的新主题更多地强调亚洲的责任，有助于促进全球化的进一步融合，这是积极且充满动力的。因为亚洲的一些发展战略对西方国家非常有价值，尤其是亚洲政府不断优化政府在市场中的指导作用，这是很成功的一课。亚洲也成功通过全球贸易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所以我认为如何积极顺利地参与全球化与各国的发展息息

相关，这对亚洲政府（特别是中国政府）和其他各国来说也是重要的一课。促进全球化的健康平衡并非易事。我们应该讨论哪些自由贸易条件是有益宝贵的，因为有些可能不适合发展过程，这要取决于你如何联系、如何交易、如何融资。由于金融体系涉及全球经济的增长，了解当前的情况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很欢迎上海论坛新主题的这一尝试。

记者：一些学者认为，亚洲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之前应该提高处理内务的实力和领导力。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Luciano Coutinho：我同意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积极作用之前，亚洲国家应该先改善自己，但我不认为他们要因此而不参与。因为亚洲已经有一些正面有趣的例子，正可以向全球治理提供他们的经验。我想也许几年之后，亚洲会变得更规范成形，但我认为现在压制并阻止它们参与是不正确的。

记者：现在各大洲都建立了以世界银行为蓝本的区域开发银行，但有时区域开发银行会受到主导国家利益的影响，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作用有限。那么如何保证开发银行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呢？

Luciano Coutinho：我认为多边开发银行与区域银行不同。它们虽然扮演不同角色，但都是必要的。现在我们讨论如何确保独立性和公正性，重要的一点是区域银行的开放，让各国都参与其中。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们可以作为领导者、作为创始人，帮助扩宽眼界。简而言之，区域银行不应该限制范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时政策的要旨导致范围变窄，这纯粹是地方性的。不可忽视的是世界是一体化的，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区域也将涉及全球贸易和国际政治关系，因此区域银行也必须具备全球视野，尽管它们有区域性问题要考虑。

像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一样，作为一个重要的开发银行，它通过基础设施促进亚洲地区的合作，但同时它也应该从全球经济的角度出发，看得更深更广。我认为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一个专业的组织，且运作治理方式健康，可以作为区域银行的模范。拉美也有这样的受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影响的区域性银行，它与区域银行和多边银行保持着平衡合作。

在昨天圆桌会议的讨论中，我们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非洲开发银行为了更广泛地参与（全球经济），与亚洲组织银行进行合作，这对双方都有积极作用。所以我认为区域或多边银行之间的合作应该得到支持。

记者：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传统开发银行相比，您认为新型开发银行在功能定位方面有何不同？我们是否可以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新开发银行视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发声的渠道？

Luciano Coutinho：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其他开发银行都采取了非常积极的举措，因为他们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而不仅仅是金砖国家经济体，这正是世界银行的使命。我们知道世界银行是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拥有大批工作人员。当世界银行统领着世界各国的银行，不向国际体系中的新角色开放时，（新开发银行）就会受到传统建立者的支配。我们还应该学习在亚洲取得成功的开发模式，虽然政策层面并不普遍，但至少在拉丁美洲的经验中，我们明白应该要有广阔的视野和对政策的广泛理解。

记者：正如 5 月 9 日在 2018 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会议上讨论的课题一样，我们看到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与中国进行了深入的合作。您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贸易经济增长的影响？

Luciano Coutinho: “一带一路”倡议恰恰告诉我们区域要有全球视野。当然,“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基础设施的改善,连接了中亚和欧洲,这对欧洲非常重要。因此,我认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尝试与亚洲发展中国家合作是一个积极的举措,这也是欧洲参与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的原因。这是一个有趣的例子,我们应该继续推广。

至于“一带一路”倡议,我认为这是一项有益有趣的举措,当然,挑战也同样巨大。我们需要时间,我们也要把眼光放长远。首先,亚洲一体化以及亚欧一体、亚非一体的挑战在未来是非常大的,但我想如果你眼光长远、不失信心,最后会成效显著。我知道这很困难,但你必须首先开始行动,从召集小项目开始,接着项目会有一些兄弟计划,然后未来就会有质的飞跃。

记者: 目前巴西正在加大对可持续基础设施和物流的投资,你曾经说过你的期望是资本市场重申其在财政投资方面的重要性,那么随着绿色经济政策的进展,资本市场在当前形势下的优势是什么?

Luciano Coutinho: 我认为资本市场对开发银行起着重要的互补作用。但是大型项目,特别是绿地项目,如果需要资本市场的参与,他们就必须做好面临高风险的准备。所以我想资本市场不会在一开始就投资和支持这些项目。项目的起始阶段必须由政府指导,政府会重视开发银行的支持,开发银行应该是基础设施投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具有较高感知风险的大型绿地需要政府的支持。等到项目成熟,项目构成进展顺利,项目复杂后,你再吸引资本市场,这时风险会减少,市场可能会替代开发银行的份额。与此同时,资本市场可能逐渐参与度更高,甚至是占主导地位。他们将开放资源,让市场进入,让资源回到开发银行,然后他们可以利用这些资源投资更多项目。我想在现阶段,开发银行与

资本市场合作伙伴之间的反馈是积极的。

记者：在巴西的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中，巴西开发银行发挥着重要作用，水力发电又是巴西开发银行绿色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如何发挥巴西开发银行的潜力，推动更多可再生能源项目呢？

Luciano Coutinho：巴西开发银行做了同样的事情，我们帮助发展了风电设备行业，这非常成功，也一次有益的经验。我们还与金砖国家和金砖协会进行了这种银行间合作。这是一个很好学习过程。我们互相交换了经验，与金砖国家合作时学到的经验将有助于推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总而言之，巴西开发银行对巴西的发展很重要。

记者：目前，巴西经济增长非常乐观。但 2018 年是巴西的选举年，政治变化的同时，巴西却意外地保持了今年的基准利率不变。人们对信贷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复苏存在一些疑虑。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疑惑？

Luciano Coutinho：我们今年举行大选，我们希望巴西有一个新政府，这个新政府将能够维持更低的利率并加强巴西开发银行在巴西发展中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希望新政府制定一些长期的基础设施计划，例如帮助恢复巴西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就是巴西社会想看到的。巴西在过去两年经济衰退，现在复苏增长非常缓慢。尤其是在当前的就业形势下，巴西社会迫切想要看到更快的经济增长。我们希望巴西能够向前进，再次成为拉丁美洲的发展重要因素。

记者：您昨天（5 月 26 日）圆桌会议上的发言（2008 年危机后亚洲和新兴国家多边开

发银行的作用）非常有趣。我注意到你在规划和设计新基础设施项目时提到过，我们不能忽视先进信息技术的应用，所以我想问一下在推动基础设施项目的其他哪些阶段中，先进信息技术可以发挥作用？

Luciano Coutinho: 是的，我认为信息技术具有提高基础设施效能巨大潜力。比如当智能产品应用于电力分配时，它们可以更有效地节约能源，根据能源的使用量提供必要的能量，而这就需要改善网络数字化。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公共照明，如果你有可以与互联网通信的灯具和处理器，就能通过计算机来控制优化照明；如果你有传感器，当周围的人或汽车四处移动时，照明将会照亮更多的区域，当周围没有人时，照明会减少。所以我们不需要照明系统工作时，就可以节省能源。同样的技术也可以应用于水的分配、卫生系统和水力发电的建设。这里有巨大的潜力正在等待我们开拓，信息技术的提升将大大提高效率。同样的系统也可以应用于城市交通，我们可以使用智能传感器在汽车与互联网间建立通信。

我们已经有一些系统来优化基础设施，但未来可以更加高效。我们应该考虑到大多数基础设施必须能够数字化，与处理系统通信。它可以被做成云计算，但必须有智能系统自动将系统运行功效最大化。这将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因为它可以解决资源问题。我认为未来的基础设施将更加高效和智能化，我们必须在规划项目准备时考虑这一点。

社会企业在新经济时代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语境下的价值，挑战和回应

记者：廖素安



Ruth Shapiro

亚洲慈善与社会中心首席执行官与创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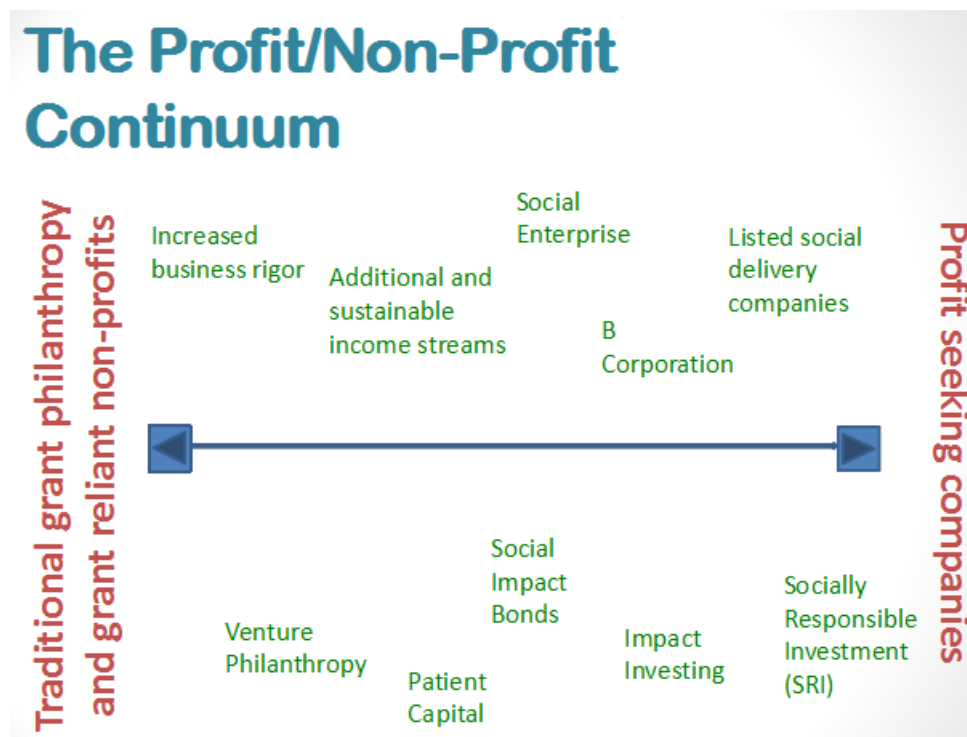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社会企业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迅速发展。在新经济时代，社会企业同时面临着许多机遇与挑战。中国作为倡导大众创业与万众创新的国家之一，为社会企业在新经济时代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经验。」

记者：香港著名的社会企业家谢家驹指出，社会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吸收和动员受益者：他们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帮助，而且在与社会企业的互动过程中不断改变自身。这个想法似乎与传统的慈善事业有很大的不同。您如何看待这个观点？社会企业和传统慈善事业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Ruth Shapiro：想想一个连续体。一边是传统的非营利慈善组织，它是受资助的，另一边是完全营利的公司。在三十年前，这个连续体上只有两端，没有中间。但是后来，一个叫 Bill Drayton 的人创造了“社会企业”这个词。他认为我们应该利用商业思维来解决社会问题。在过去三十年间，这个连续体的中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创新和实验。

所以，社会企业家精神是指将商业工具和商业的严谨性应用到社会问题的解决中去。这和社会企业不一样。社会企业像公司一样运作，但它专注于解决社会问题，且它的盈利会回到公司用于继续解决社会问题，这样它就不必依赖补助金；而一个社会企业家可能在经营一家社会企业，也可能在以一种更具有战略意义的商业方式来运营一个非营利组织。

当今世界有各种不同的模式和策略，社会企业只是其中之一，它们中没有一个是那个“唯一的答案”。每一种类型都有不同策略，它们代表着不同的价值主张。对不同类型的选择，取决于你的问题和你想要的解决方案。



记者：中国总理李克强在 2014 年首次呼吁“大众创业与万众创新”，你认为社会创新是什么，为什么它对于当下中国如此重要？

Ruth Shapiro：很多时候，创新只是一个名字。它是“不满足于事情既成情况，并试图想出一种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的另一种说法。所以当你想到那个营利-非营利连续体时，在

其中发生的一切都是社会创新。社会创新是人们用不同的工具和战略来解决一些问题。你希望这些新的方法更加有效，但你不能保证它们是否真正奏效，你需要去尝试。这个尝试也许会失败，但是你会从中得到收获，这一点更加重要。

记者：众所周知，衡量商业企业价值的最重要标准是利润。然而，社会企业家的主要目标是创造社会价值，这似乎更主观、更灵活。我们如何评估社会企业？我们应该考虑哪些方面的因素？

Ruth Shapiro：在社会意义上，人们谈论投资和回报的方式有很多。正如你在问题中指出的，当它是一家公司的时候，评估很容易。但在社会企业方面，情况却有所不同。有很多关于测量和评估的讨论，其中的一些讨论非常好。以教育为例：如果孩子的识字率很低，你的目标可能是让他们读更多的书，这样他们的读写能力就会提高。你可以通过考试来衡量这个能力，并下结论说，因为我们建立了这个图书馆，孩子们的阅读理解已经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但麻烦之处在于，许多时候这些好处是无法量化的。阅读理解和他们在学校的天数是可量化的，但是他们的态度和自尊是难以量化的。想想看，在你的一生中，也许会有一两位深深激励过你的老师。他们是如此的好，但你无法量化它；你只知道它很有影响力，但你不能在它上面放一个数字。什么是伟大的老师？一个伟大的老师是一个能把考试成绩提高的人，但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启发和激励你的人，而这是难以评估的。所以我想说，没有确切的衡量答案。你必须承认，有些事情是你衡量的，有些是无法衡量的，但那些无法衡量的事情也很重要。

记者：那么影响人数是衡量社会企业的参考标准吗？

Ruth Shapiro：这取决于你想做什么。有时规模很重要，但有时则不那么重要。如果你是一位慈善家，你想把钱捐给那些正在寻找治疗癌症方法的科学家，你就不会把钱给一万名科学家，而是把经费给一小部分人让他们改进研究，但是这种治疗方法成功后，可以惠及成千上万的人。所以人数是否是衡量标准取决于你的目标。不同的项目，社会创新的目标也不同。

数量和质量是不一样的。我想现在很多人对规模存在误解。从一万双筷子到一百万双筷子，这是规模化。但对于社会来说，比规模化更重要的是系统的改变。提供十万份学校午餐的确有规模，但还是没有解决为什么这些孩子需要学校午餐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是用商业术语来思考问题的坏处之一。因为在商业中，人们的目标是卖更多的东西，但是在社会变革中，人们要做的是改变这个系统，这样孩子们从一开始就不会挨饿。

记者：在你的书《真正的问题解决者：美国的社会企业家》中，你谈到了许多鼓舞人心的“英雄企业家”；但与此同时，要实现持续的社会变革，建立动态联盟也很重要。你如何看待不同社会企业家之间的联盟的重要性以及这些年来社会企业家之间的合作情况？

Ruth Shapiro：我在书中说，仅仅指出超级明星英雄企业家没有太大帮助，因为没有人能自己做这件事。把它视作一人对抗全世界的想法是错误的。我认为这种想法也来自于商业。所以，虽然有像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这样的明星企业家，但是要达成系统改变，还需要合作伙伴、政府和社区，只有协作起来才能改变系统。

所以我认为，识别出领导者、识别出那些有动力和激情的人是件好事，但说他们应该独自行动是不好的，也是不可能的。你的确需要那个有激情和动力的人，只不过这个人也需要成为团队的一员。

记者：你如何看待社会企业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为促进社会企业家精神和创新采取了哪些政策或行动？

Ruth Shapiro：我认为亚洲在这方面与美国和欧洲不同。在亚洲，人们更倾向于与政府合作，而政府也希望慈善机构、非营利组织和社会企业家与自己合作。我认为，说哪一方做得更好是不对的，因为不同的地方，最有效的模式不同，美国模式可能不是最适合中国的模式。

我所认识的成功中国企业家与政府有着合作。让我举两个例子。有一个非营利组织叫做“健康快车”，他们通过火车周游中国，帮助眼科医生和医院更好地进行眼科手术：火车停在医院，然后这个组织的医生和当地眼科医生一起工作。“健康快车”是与卫生部合作的，如果没有和卫生部合作，它也许不会那么成功。卫生部希望这个组织在各地走动。但“健康快车”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政府与它是一种伙伴关系，二者相互促进。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不仅给予他们许可，而且还给予他们信誉。健康快车自己筹措经费，而政府更多地是为它创造机会和合法性，就像在说“这个组织很好，我们鼓励你和他们一起工作”。

记者：那么在美国呢？

Ruth Shapiro：通常情况下，在美国，你不必关心政府在做什么。若你想在学校里开展活动，你可能需要那所学校同意，但你不需要像在亚洲那样，让政府机构参与进来。并且在

亚洲，与政府合作并不总是因为他们必须这么做，而是出自于特有的“和谐”和“关系”，与政府合作是自然而然的。但这很好，因为如果政府与你协作，你才更能带来系统的改变。

我再举一个例子。在北京，有一个学校叫“百年”，它提供职业培训服务。在中国，农民工的孩子难以在城市上学，因为他们没有当地户口。中国面临着这样的两难问题：要么把他们抛在身后，要么把他们带到城里，但很难把他们送进学校。

因此，“百年”创始人为了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创建了一所职业培训学校，培养管道工、电工或教授计算机修理技能。她的第一笔大额资助来自中国青年基金会，它认识到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的需要。此外，中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我们需要鼓励职业培训，因为现在在中国，很多人只是认为他们应该上大学，但并不是所有学校都像复旦大学那么好，所以他们没有技能就毕业了，很难找到工作。但是，百年拥有 100% 的就业率，因为公司需要有职业技能的人。现在，中国有 12 所这样的学校，此外，中国政府还帮助国有企业到非洲去创建这些学校。这位创始人现在是政府的顾问，帮助制定职业培训政策。所以社会企业和政府之间是互惠的。

记者：在这些故事中，这些企业与政府有着良好的关系。但也有一些公司认为，有时候政府对他们限制过多。你怎么看？

Ruth Shapiro：中国的一些政府机构弄混了“支持”和“控制”。例如，政府可能会问非营利组织，你需要什么？非营利组织说自己需要钱。政府说，好的，这是资助费，但你必须做某项研究。尽管这项研究并不是该组织想做的事情，但他们别无选择，因为这是政府的要求。因此，他们不是在做他们想做的工作，但政府却可能认为“我们在帮助他们”。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的确在努力思考如何更好地赋权，尤其是当新的慈善法出台以后。但是这部法律很新，要真正把握支持和控制之间的最佳平衡点还需要时间。

记者：在新经济时代，社会企业家正在通过新的渠道和方式逐步解决社会创新和融资问题。特别是在互联网技术发展迅速的当今，您认为社会企业家可以如何与新兴互联网技术合作？您能举些例子吗？

Ruth Shapiro：当然，有许多利用互联网和新技术来实现社会创新的好例子。我想阐述一下互联网可以提供帮助的三种方式。

一个是众筹。许多人的小笔钱，加起来会成为一大笔钱。在中国的众筹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出名的学校午餐计划中，每人只要在在网上捐赠 5 到 10 元钱，转眼间我们就能募集到数百万元。这是一个现在常发生的例子。

第二种互联网的帮助体现在郭美美事件中。互联网能让人们进行监督。网民可以看到人们是否腐败，因为一些非营利组织只是想要拿到钱，毕竟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好的，对吧？这是一个大国，有各种各样的人。而互联网的监督，让组织人员和政府官员的腐败变得更加困难。

第三种类型实际上是商业策略的一部分。我举个例子：在印尼有一个非营利组织，创办者意识到很多人想要学习，但并不一定想去学校上课，所以他们创造了一个叫做“Berbagi”的学院。在这里，有的人想了解市场营销，有的人想学习如何训练狗……然后他们用互联网找到一个人，这个人会说，好吧，我不是老师，但是如果你安排一个地方，我可以去教你。教课者是没有报酬的志愿者，学生也无需为此付费，他们用互联网来寻找彼此。现在，这个学院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的课程。大多数都只是一次性的，但它很有帮助，而且很有趣。这是一种利用互联网的社会创新，它以一种不那么正式的方式分享人们的技能。

合理配置国家信用，理性对待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

记者：杨易



汪海粟

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资产评估准则技术委员会委员；武汉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不断增长且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群体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石，我们必须清楚认知该类企业成长过程中个人价值与公司价值相互转化的规律，即：创业活动需要股东拥有专业化无形资产，公司成长需要股东无形资产公司化，公司价值持续需要构建锁定关键员工无形资产的机制。只有当经济规律变成社会规制，社会规制演化为企业规则，个人、企业、市场和政府间的良性互动才有可能得以实现。」

记者：知识经济时代，技术是中小企业发展的核心，十九大报告中更是提出了要发明和创造“颠覆性技术”，那么对于这类无形资产如何进行评估？这对于现有的评估技术产生了什么挑战？

汪海粟：今天中国的高科技中小企业迅速崛起，尤其在生物科技、通讯领域出现了一大批拥有核心技术的中小企业。高科技是这类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资源。总体而言，对这些企业核心资产的评估通常有两类机构：一类是风投机构。这些机构跟踪相关行业的先锋企业，关注这些企业最新科研成果，并且愿意为企业的阶段性的成果投资，但其进行的技术评

估带有很强的风险投资属性。另一类是专业评估机构。目前这类机构的评估存在两种委托类型：一是交易双方各自委托的资产评估。在商业谈判中，卖方关心资产价值的释放空间，买方关心影响资产价值的风险因素，因而存在各自委托评估的市场需求。这种评估业务通常被认为是咨询类业务。二是涉及国有资产和证券业务的评估。根据有关规定，如果资产交易涉及国有资产和证券业务，通常要由合乎国有资产和证券业评估要求的独立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评估报告。所以这类评估业务又被称之为鉴证类业务。

我认为这两类业务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基本功能都是克服该类经济行为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促进公平交易的形成。需要指出的是，在无形资产质押，以及无形资产为核心的公司 IPO 或并购的情境下，技术类无形资产的评估一般应具备四个前提：第一，该类技术已经比较成熟，通常已构成由专利、专有技术和技术标准的技术组合，并有相对稳定并可持续的研发团队；第二该类技术已经成为产品，通常该类技术支撑的产品因其成本、质量和效用的特殊性可以产生明显的消费者剩余；第三，这类技术支撑的产品已占有市场并存在潜在增长的空间，通常需要得到销售合约的保证；第四，其风险是可以预判的。

综上，无论技术“颠覆”与否，都与技术发展程度、合约价值、研发团队的稳定性相关。通过对技术不同层面的判断，第三方评估完全有可能会提供一个成组无形资产的价值，该标的价值也一定是与适用该技术的产品未来的现金流量相关，因此这类评估报告具有一定决策关联性。

记者：除了技术之外，资金是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撑，面对融资难，您提出了需要合理配置国家信用，那么这个理论提出的根据是什么？

汪海粟：中小企业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社会财富，一方面又被普遍认为规模较小、能力较差和信用不足，进而在该类企业融资能力评价中

出现宏观增长引擎与微观信用缺失的悖论。其实相当部分该类企业不缺信用，它们的超常规发展与计划经济形成的可以商品化资本化的公有资源存量沉淀有关。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其实与信用挤占有关。信用挤占就是指强势企业通过不公平契约占用弱势企业的资金，导致后者陷入融资困境的现象能正常可持续。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小企业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具有数量大和增长快的特点，而且结构和质量也在不断的优化，上缴的税收从2005年之后持续超过以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所以中小企业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而言功不可没。

但国家对于大企业的信用背书力度明显大于对中小企业的信用支持，而部分大企业借钱还债的能力并非全部是基于其自身的创造力，可能更多的是政府前期的投入、政府政策的推动以及上述投入在市场上的非公平性释放，这样就导致在市场经济中其他的市场主体和大企业的竞争前提不在一个层面上。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不平等的信用背书，实际上是用中小企业的税收贡献来补贴了更多的大企业，导致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马太效应。所以现在需要重建国家信用贡献与国家信用配置之间的公平机制。

记者：目前市场上存在的 VC、PE 等投资机构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国家信用配置的不足？

汪海粟：从本质上说 VC 和 PE 机构不是配置信用，而是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扮演“侦察兵”的角色，去发现、识别、评价机会并且为机会付出代价，是一种关于机会对价的市场机制，而不是单纯去增加某个企业信用。但不可否认，这些机构对于机会的把握、资金投入会增强企业借钱还债的能力。明确此类机构投资时所面对的极大风险，要清楚认识到他们不是创造信用而是识别和对价机会。

记者：在企业成长过程中，小企业的体量一定是变化的，企业成长的结果可能是死去也有可能变成大企业，那么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对于他们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汪海粟：中小企业在全球的发展存在着占有资源较少，社会贡献大的共性。一方面这类企业需要承担熟练劳动力的培训和教化成本，另一方面又要付出高额的融资成本，还要以赊销等方式对大企业进行信用补贴，他们承担了大量不应也不能由其承担的隐形社会责任，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

过分强调中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产生两类结果，第一类是不堪重负——表现为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在成立的两三年之后走向破产边缘。第二类是随着隐性社会责任的付出，企业应对问题的能力逐渐变强，有可能逐渐产生未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品牌效应，进一步做大做强。尽管种种原因使得他们主动或被动地承担了很多社会隐性责任，但是不排除这会产生企业的外部正向力，反过来促进企业的壮大，但是这也绝不意味着因为存在着这种优化的可能性，社会就应该增加中小企业不应承担的隐性社会责任，也不应当因为部分小企业的成功转型，无视目前中国中小企业在发展阶段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记者：人才是企业的第一资源，您曾提出“要将 MBA 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也提出了中小企业员工要在“干中学”的成长方式，您是怎样看这些“商业理性”思维培养的重要性？

汪海粟：我国 MBA 以及 EMBA 项目的设计和实施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 MBA 项目于 1991 年开始试点，EMBA 项目于 2002 年开始试点，这两年恰恰就是 40 年来我国 GDP 演进曲线至关重要的上升质变拐点。我认为这是中国第一个专业硕士学位教育供给侧对市场经济需求侧提供适时有效响应的结果，正是这两个项目培

养的大批专业人才促进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企业所有制改革，推动了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后的不断深化的国际化过程。这些学员曾经是在干中学，但是当发展到一定阶段，他们感到有必要回到学校，通过学习和分享提高再发展的能力，所以他们是“从在干中学到学中干”。

基于商业理性认识企业演进规律对他们至关重要。在创业前，创业者要进行理性思考，判断自己和合伙人是否具有创业所需要的技术、关系和管理能力在内的无形资产；在成长期，创业股东必须面对个人无形资产公司化理性抉择，这时需要把创业者个人关系、技术和能力变成公司的产品、技术和市场；在成熟期，公司所有者会面对公司无形资产资本化的机会，创业板的实践表明细分行业的领袖企业可以通过 IPO 或并购，将无形资产决定的股东资产资本化，但这种机会的成本也客观存在，需要理性对待；在转轨期，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创始人都会面对公司无形资产私有化的问题，由于时间的原因，公司的某些能力和关系会无形地被关键员工拥有和支配，他们的离开就意味着公司核心能力的流失，所以企业的长治久安还有赖于创业股东与关键员工分享公司价值的理性安排。

正确认识企业演进过程中这四个阶段面临的不同问题，科学设计出资协议、对赌协议、招股说明和股权激励等相关合约，既是对规律的尊重，又是对规制的应用，更重要的是对公司规则的优化。所有这些将决定企业生命的质量和长度。

记者：那么在具体运用过程中这些商业理性会对企业产生哪些影响？

汪海粟：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有利于形成和优化企业的内在价值。

内在价值是企业是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规律的制约下的企业历史惯性、现行结构和演进态势共同作用的现金流量折现的专业判断。这是企业在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共同影响下的行为定位和态势的集合，有检验账面价值和制衡市场价值的功效。内在价值是企业响应外

部因素变化，通过自组织和自适应活动形成的竞争优势的动态集成。这是一种系统优化，涉及结构、制度和文化三个方面的内容。在这三个方面中，企业文化的稳定性和先进性至关重要。以源于血缘关系的中小企业为例，有发展潜力并有可能实现基业长青的家族企业，通常都构建了关键员工从血缘家人到非血缘家人的转换机制。究其原因，一是血缘关系随时间淡化，代际文化冲突使家族企业后继乏人；二是企业成长仰赖吸引和稳定非血缘优秀人才的能力；三是成功家族企业演化的规律证明文化认同的企业员工具有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的作用。

记者：今天国家倡导企业的发展目标是创立一流的世界企业，那么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承担者哪些国际责任？

汪海粟：目前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存在诸多理论和学派。但当我们探讨企业社会责任之前，必须明白企业是盈利组织，而不是非盈利社会组织。其上缴的税收是国家承担包括救助弱者在内的社会责任的基础。基于此，我认为在未充分认识和补偿中小企业承担巨大隐形社会责任的基础上，不应超越这些企业的现实能力讨论其社会责任，甚至国际责任。这绝不意味中小企业在涉外业务中可以违背中国政府的规制承诺，这些企业需要通过技术创新、质量改进和成本控制向全球的消费者提供可信赖的中国产品和服务。或许这正是中国中小企业当前需要强调的国际责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为了能够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就中国企业而言，社会责任乃至国际责任的履行势必是一个理性渐进的过程。

记者：怎样理解这个“理性渐进”的过程，是否可以将社会责任视做企业发展的副产品？

汪海粟：中国的中小企业是否还有能力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我

在论坛发言中，已就该类企业因承担隐形社会责任而不堪重负列举了一系列数据，这里不必赘述。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政府、社会和关联企业对中小企业隐形社会责任未形成共识，并采取集体理性行为予以分担和缓解，中小企业提供的这些准公共产品将难以维系。所以我认为对于该问题的讨论需要联系基本国情。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企业合法经营，并履行纳税义务前提下，企业承担的其他社会责任都与企业的品牌建设有关，是为了获取更长期和更稳定社会回报的投入。所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必须量力而行，渐进优化。

油气之外：南海共同开发的其他领域和模式

记者：王峥



洪农

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所长、中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和资深研究员。

「通过南海共同开发推动区域发展，构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发展良好关系。正视东亚法律文化共同体中的各国差异，将挑战转变为机遇。培养了解国际形势、具有专业分析能力、能够在国际争端解决中发声的中国自己的国际司法人才。」

记者：您曾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海洋法问题研究中提到“各国在确保海洋资源和海上通道得到持续有效利用方面均存在共同利益”，您认为中国和东盟十国的能源安全合作中，中国未来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如何进行有效的合作？

洪农：我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主要是从南海地区油气开发的角度着手。南海油气资源比较丰富，但是因为涉及到主权和管辖权的争端，有些国家在有争议的地方进行独自油气开发势必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弹。因此，在南海有争议的部分进行共同开发，从促进各国合作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好的方式，也是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法。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因为中国一直主张要共同开发，但是其他的周边国家的反应，向来是有些国家反应比较冷淡，有些国家赞同这个提法，但是他们有很多的顾虑。

比如说，有些国家会觉得我们中国主张的共同开发的前提是主权属我，所以他们很担心如果他们同意了中国共同开发的这个主张，那就是相当于变相地承认这些南海岛礁的主权是属于中国。这一点是这些国家一个很大的顾虑。另外一个顾虑是，有些国家担心在“有争议地方”进行共同开发，而他们认为这些地方可能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如果他们同意进行共同开发，那可能就会变成变相地承认中国的一些海洋主张。这些问题是其他国家一些主要的顾虑。所以，从其他国家角度来看，目前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缺乏很大程度上的政治意愿。

当前最困难的是各国能够对共同开发的区域及地理位置达成共识。这点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如果共同开发做好了，那对中国而言，很多南海问题的政策主张，包括与东盟其他国家关系来说，是个很好的切入点。现在的应对办法，像我在会议中谈到的，可能要从简入繁，先选一个只涉及到两个国家的问题，比如中菲之间、中越之间或中马之间，然后形成一个很好的案例，希望这个成功的案例能推动更多类似问题的解决，由此对整个南海地区共同开发有个比较好的影响效益。这是目前中国从机会、机遇来看比较好的解决方式。

记者：从南海仲裁案的进程和后续来看，您认为目前在海洋法方面的国际争端解决方式，例如诉讼和仲裁，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洪农：我认为在海洋法的国际争端解决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因为实际上海洋法里面有四个机构，一个是国际海洋法法庭，一个是国际法院，然后是仲裁庭和特别仲裁庭。实际上当时机构设计的时候，对海洋方面的争端，实际上国际海洋法法庭应该是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但是目前来讲，因为仲裁的门槛比较低，比如说管辖权和受理权的门槛比较低，很多国家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仲裁，而不是把他们之间的这种争端提交到国际海洋法法庭或者国际法院去。

在南海仲裁案中，实际上我们国内很多学者对是否第一时间接受这个仲裁案是有争议

的，案件里面有很多争议的地方。这个案件拖了三年时间，对中国来讲，结果毕竟不是很好，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的国家形象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这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学习和教训的机会，好的方面表现在这几年，中国在海洋法方面的很多学者，或者说是很多年轻一代的学者，选择了海洋法作为他们的研究领域。

虽然在商业仲裁方面可能我们国内已经有了很多经验，有自己的人才队伍。但是在这种国际诉讼中，特别是涉及到国家主权、划界这方面，我们是缺少人才的。那么通过这次仲裁案本身，中国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启发，所以会促进中国在这方面比较有条理、有计划地培养我们自己在司法和仲裁方面的人才。我觉得这是中国在这个案子中能够学到的一个很好的经验，会把挑战变成机遇。

记者：您曾发表论文探讨过东亚法律文化共同体的问题，认为南海仲裁案也引发了关于东亚地区法律文化、特别是海洋法律和文化的更深层次的思考。具体到海洋法方面，您认为东亚地区各个国家的法律文化的差异是什么？这些差异对于海洋法实践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洪农：谈到东亚法律共同文化基础的问题，因为很多人认为整个亚洲有一个文化体系，不太愿意把两国之间的差异或者争端诉诸于国际仲裁或者国际诉讼。但是现在慢慢有些变化，有其他的很多东南亚国家他们在这方面可能走得会比较早一点。比如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和印尼之间他们都有通过国际法院解决主权问题的先例。中国在这方面可能是跟这些国家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异，包括东盟国家之间，他们自己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比较大，比如说，越南在这方面会跟中国的立场比较接近，会比较保守。所以中国跟这些国家之间，这些国家他们自己之间也存在一种法律文化方面的差异。

记者：您认为在现行的国际法框架下，中国在解决与东盟国家的领土、海洋权益争议问题时，在法律层面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中国如何在国际舞台上争取话语权、维护国家利益？

洪农：这是个非常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我这几年也参加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国际会议。本身在南海问题上，在话语权方面我们国家是处于劣势的，因为谈到这些国家，都有种同情小国的心态。一方面是同情小国，另外一方面是有针对性地面对中国，不管说什么做什么，在法律上有多有理，在法庭上有多站得住脚，我们本身是处于一个很弱势的地位和情势。但是，也不能因为这种挑战而无所做为，所以以后我们自己要构建一种自己的话语体系。这方面要做的工作非常之多。

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中国学者跟别人谈论的时候，就喜欢说一些有点像 **statement** 那样的东西，而不是进行专业性的分析。我觉得中国在教育这方面就有很多可以做。比如说我们国内有很多大学有专门的海洋法方面的教学，在培养学生方面，我觉得我们跟其它的国家相比还有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比如越南，他们这几年输送了很多学者，包括他们政府官员到国外，到西方国家的相关院校去很系统地学习海洋法。然后这些人通过两三年的学习，结束后他们又回到了越南，又回到他们的外交部或者涉海的部门。这些人在很多的国际会议场合跟我们自己的学者经常有交锋，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也不妨多做努力吧。因为争取话语权，我觉得是一个有系统的、计划性的过程，有不同年代、不同层次的学者，包括很资深的学者，包括刚刚入门的学者或者是学生，不同的人都是能够有所作为的，而且有很大的作为空间。

从特朗普和美国逻辑看中国对美政策

记者：王悦馨



达巍

国际关系学院校长助理、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美国外交及中美关系的研究，曾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

「当前中美矛盾背后的核心问题，是在同一个体系内部两个巨型的异质国家如何共存的问题。从大的趋势看，中美关系当中对抗性的、或者说竞争性的因素在上升，这个趋势是没有变的。我们一个核心挑战可能就是怎么管控这种竞争本身。竞争不可避免，也不一定是坏事，但是你管控它，就是不要让它变成恶性竞争。跟美国去争夺什么世界领导权，地区领导权，这个不应该是我们的目标。不要把我们宝贵的资源消耗在大国竞争的游戏里，争取不要让竞争面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

记者：能否请您谈谈您对现在国际形势下中美关系的理解？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现在的中美关系是怎样的？

达巍：当前中美矛盾背后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在同一个体系下两个巨型异质国家如何共存的问题。

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很不一样。我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差异都很大，并且我们两个国家都很大。这样的两个国家要如何在一个体系里生存，如何共存，如何去进行一个友

善的、良性的竞争，是我们需要去探索的。

美国现在觉得由于中国的体制，在国际体系下跟中国竞争会吃亏，中国在占便宜。对美国来说，要改变这种状况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彻底地改变中国，改变中国运作的模式。这个想法中国不会接受；另一个办法是说，我不跟你玩了，我要把你赶出我领导的这个体系。所以美国其实在做一种“脱钩”的努力。美国最基本的想法就是：你不变，我就跟你脱钩。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这种脱钩虽然是双输，但是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更大一点。那么我们希望的就是稳住，大致维持现状——如果你们有一些具体的要求，我们可以谈，可以妥协。在这个基础上看前一段时间比较热的经贸问题，经过短期的博弈之后，经贸关系似乎暂时稳定下来了，“贸易战”有一段时间似乎是不可能打起来了，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矛盾还在。后来的发展当然也证明，那个短期的相对稳定的确没能维持多长时间，特朗普就又变卦了。

所以回到你的问题，现在中美关系正在发生一个质变。如果你对比奥巴马时期，或者那之前的时期，你会看到，现在有一个很深刻的变化，那就是，美国开始从大国竞争的角度看中国。这引起中美关系当中很多负面的，比较消极的发展。也许我们看（2018 年）5 月的最后两周，这种负向的发展暂时处在一种比较稳定和缓和的小阶段里，但是大的趋势中美关系里对抗性的，或者说竞争性的因素在上升，这个趋势是没有变的。

记者：美国担心中国想要“占便宜”，而中国想要从这个全球化体系当中获得发展，看起来这个矛盾似乎是不可调和的，是这样吗？

达巍：首先，我们跟美国的交往并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像美国人说的“美国一直在吃亏，中国一直在占便宜”的这么一个状况，这里面确实是双赢的。只不过这里有一个相对获益的问题。比如说可能中国人挣了 80 块钱，美国人挣了 20 块钱，但美国人也有收益。

过去美国长期比较关注绝对收益：只要我能挣钱，哪怕你比我多挣点，问题也不大。而特朗普政府比较强调相对收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如果要再这样下去，中国要追上他了。从特朗普的角度说，他就是要美国比中国挣得多。但如果美国要停掉这种关系，一方面美国人不但要少挣这 20 块钱，可能还要赔一些出去；另一方面，这么多年美国已经习惯了跟中国交往，平白失去本来的收益，从美国百姓、美国利益集团、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也是件挺难受的事，所以这个婚如果要离，对双方来说都是很痛苦的。

记者：您去年六月发表的一篇文章《美国对华战略逻辑的演进与“特朗普冲击”》中提到美国对华战略的制定包括一个假设，即“美国要做的是塑造中国发展的方向，而非阻挡中国体量的崛起”，这个假设今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体现在和将体现在哪些方面？

达巍：关于美国是不是要塑造中国，美国国内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没有办法下一个很准的定义说全体美国人希望中国怎么样，但是整体上美国希望中国往自由化的方向走。而 2017 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到，“几十年来，美国的政策源于支持中国崛起和融入战后国际秩序的信念，将使中国自由化（liberalize）……这一信念是根本错误的”。美国官方明确了一个结论，即我们不能，也不想塑造中国了，过去的做法错了。这种看法在过去几年已经成为美国战略界的主流，只是现在正式进入了政府官方文件，等于进入官方正式认可的层面。

其实这个变化不仅是特朗普任期才发生的，或者说，特朗普上台以后表现得更清楚，但是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对华策略就已经有不小的变化了。很多事情现在如果是民主党当政，他们也许会做得更狠，因为他们可能组织得更好更有条理，会找到更多盟友，不会犯很多低级的错误。当然特朗普有他的不确定性，但是有些你在他上任之前大概就知道他肯定会

做的事情。这一部分是出于他所处环境，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普遍看法，不管是谁上台，都会产生作用。另外，他上台前的竞选承诺基本都兑现了。所谓不可预测的主要是他的个性、风格带来的。

记者：所以您认为我们现在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美政策？

达巍：我们对美政策比美国对华政策还要稳定。过去当然我们比较被动，但是中国的能力越来越强以后，中国也可以开始逐渐塑造美国的选择。就除了被动地应对以外，我们也可以考虑怎么塑造美国的选择。

比如说美国企业现在对中国很不满意。现在回过头去看，如果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对外开放速度快一点，甚至在奥巴马任期把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都谈掉，可能今天的经贸关系就不会这么走，情况可能就会不一样。这就是一种塑造了。再比方说我们一直在邀请美国的国会议员来中国访问，确实有些人来了以后被中国影响，他发现原来自己对中国不了解，中国也不是一个怪物，其实跟我们差不多，虽然有他自己的特点，那也是正常人。他对中国的观点就变了。我们在朝核问题上，也是不断地在推我们的方案，希望美朝双暂停，虽然开始双方都没有接受，但是中国做的这些事还是有好处的，而且最后事实也是朝着中国所主张的那个方向去走的。

记者：虽然特朗普一直在变，但是也许中国可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策略。可以请您大概预测一下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的新的走向吗？

达巍：我觉得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第一是要黏住。美国现在威胁要脱钩、要增加壁垒，那我们要贴住他，因为在这个体系里对我们来说更符合我们的利益，这意味着可能有时候我

们需要做点小妥协；

然后第二，我们一个核心挑战可能就是怎么管控这种竞争。竞争本身不可避免，也不一定是坏事，但是需要管控，不要让竞争变成恶性竞争，争取不要让竞争面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中美关系里长期有竞争面，也有合作面。过去我们大家都一直认为合作面是大于竞争的，最近确实出现了竞争面超过合作面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我们可能没办法阻止，但是可以尽可能地去扩大合作面；

第三个是要管控竞争的成本。我们可以跟美国竞争，但是你准备付出多大的成本来竞争？这个竞争不会是像苏联和美国；我们中国还是一个国内问题很多的一个国家，或者说可能更大的问题还是在国内。我们不能太多的资源消耗着消耗在大国竞争的这个游戏当中。争夺世界领导权、地区领导权，这个对我们来说不是最急切的事情。所以这个其实也回答了我们在对美国，包括对之前差点形成的贸易战之类的问题上的策略——虽然坚持自己的底线，但是要稍微收着点。况且美国提的一些具体的战术层次的要求，其实跟我们自己的计划也没有太大的没有原则性的差别。除了他说要改变经济制度，这我们不可能去做；或者他说要完全平衡中美贸易，这个我们做不到。但是他说你应该给我降点关税，你应该保护一下我的知识产权等等，这些我们自己本来也准备要做的，只是速度、领域、节奏不一样，那我们可以做点妥协。这个不是原则问题，对吧？

美国对亚洲政策里包含很多长期存在的东西，所以与其说是特朗普的对亚洲政策，其实还是美国对亚洲政策。特朗普的个人风格让它看起来好像很激烈，或者好像很激进，但是其实它的大方向跟之前是相同的，只是做起来有时候不太一样。比方说朝核问题也是这样子。不管谁上来，朝核问题都很重要，但是特朗普说要极限施压，一下子就把朝核问题的热度拉高了。美国的基本战略目标上面，连贯性是很强的，但具体怎么操作层面，以及连带造成的局面，每个总统是不太一样。

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用人工智能解决老龄化问题

记者：张兰



聂再清

聂再清，现担任阿里人工智能实验室（AI Labs）北京研发中心总负责人，是互联网信息集成和知识挖掘的知名专家，微软学术搜索和人立方创始人。曾任微软亚洲研究院主管研究员，是微软学术搜索、人立方及企业智能助理 EDI 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也是微软自然语言理解平台 LUIS 的技术负责人。

「人工智能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未来是不可或缺的。在解决老龄化问题方面，人工智能已从医疗、情感等方面层层渗透。目前我们面临的主要障碍是老年人的学习和接受能力较弱，以及自然语言理解中的语音识别精准度问题。我们研发产品的宗旨是希望实现“更自然的交互”，而产品研发本身将以用户需求为主，通过用户的反馈不断进行产品更新和迭代。」

记者：截至 2017 年年底，中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 2.14 亿人，占总人口的 17.3%。

而早在 1999 年，国内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就已经占人口总数的 10%以上，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已经近 20 年。老龄化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您认为目前的科学技术是如何推动老龄化问题解决的？

聂再清：科学技术对于老龄化问题相关问题的解决，大概可以分为三方面。首先是在医疗方面，治疗病症的技术更加先进，对于一些老年人之前所无法解决的疾病，正在逐步突破。其次，在社会资本的构建与社会联系方面，老人可以突破地域的限制，随时随地和子女进行线上视频、通话等，一定程度上不仅缓解了老人的孤独感，也有助于增强和子女的沟通。最后就是类似“天猫精灵”的语音助手去帮助老人识别药品、语言聊天、智能操作等，为老人

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

记者：您认为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在解决老龄化问题方面，目前遇到了哪些瓶颈？

聂再清：目前遇到的最大阻碍是有很多老人不太会使用这些科技产品，或者说他们不习惯这样的交往方式，更喜欢人与人之间的实体交互。此外，根据经验和观察，还有一部分老人不喜欢学习使用新产品，这方面的兴趣和能力远远低于儿童。未来如果想要在这个方面做大做好，可以尝试根据老人的年龄段或性格、学习能力去细分，针对不同的老年人定制不同的产品，在这个方面可以研究先行。

记者：目前有这样一种说法：70 后是互联网下的难民，80 后是互联网下的移民，而 90 后是互联网下的原住民。在互联网学习能力方面，不同群体确实存在差异。那么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瓶颈问题，近些年物联网、互联网在解决老龄化问题方面有哪些突破呢？

聂再清：我们在推动解决老龄化问题方面最直接目的是希望“更自然的交互”，让老人更真实的感受人机交互，以此减少一些老人的不适应问题，让产品更好的为老人服务。比如有的老人听力不太好，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个东西用一个屏幕以大字号的形式写出来让老人结合视觉和听觉一起识别呢？在“更自然的交互”的宗旨下，目前已经开发且推向市场的产品是天猫精灵，它是语音助手借以存在的一种物质形态，未来的载体可能是手机、汽车或者其他东西等任意物件。我们今天所说的更多的是“感知认知”，软件和硬件可以分开独立研发，尤其是在认知的部分，会更好地促进二者的发展。

记者：据悉，您于 2017 年从微软卸任并赴阿里任职，如今在阿里主要负责的两个突破方向分别是知识图谱和自然语言理解，这两个领域在解决老龄化问题方面有何作用？

您能解释一下这两个模块具体是怎么运行的吗？

聂再清：我们实验室推出的 AliGenie 开发者平台于 2017 年 10 月正式发布，将阿里巴巴在人工智能领域积累的技术以 API 或 SDK 等形式对外共享。该平台包括语音唤醒、语音识别、语音输入、自然语言理解和语音合成。我们在这些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使得 AliGenie 平台越来越强大，让开发者能够越来越容易地开发出老人喜欢的日常功能，让人工智能逐步走进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以自然语言理解领域为例，需要进行三个模块的研究：第一模块是意图识别，也就是用户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机器需要把客户的需求和意图进行分类。当然除了意图识别，我们也需要“槽填充”，就是将参数提取并输入到程序中去。比如询问天气预报，将非结构化的语言变成结构化的语言，也就是说需要了解何时何地的天气预报，最后将这些参数进行连接。最后一个模块是对话管理，它直接决定了机器下一步的行为决策，如机器可以对顾客进行反问，“您是需要 2018 年 5 月 19 日的天气预报吗？”或者直接去调用天气预报 API 去获得天气预报结果数据再进行反馈。在自然语言理解方面，需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是“语言的多样性”，很多词语甚至会产生歧义，比如顾客问我明天应该穿什么衣服，一方面可能是问语音助手明天的天气，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询问时尚款式并进行搭配服装，甚至很多时候是正话反说。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使得语音助手在该方面面临重重阻力，更加需要让机器进行学习，因此对于多样化的自然语言进行识别便会非常重要。

对于知识图谱而言，最重要的是构建不同网络之间的点边关系。举个例子，比如世界上有很多个小明，虽然姓名相同，但在知识图谱上的 ID 是自己独有的。小明是一个点，复旦

大学是一个点，上海论坛也是一个点。如果小明是复旦大学的学生，那么小明和复旦大学就构成了一个“边”，这条边和点存在的关系网络构成了一个知识图谱。知识图谱的研究（包括知识图谱的构建和融合、实体链接以及知识的推理等）能够让机器对用户的自然语言输入精准的对应到机器能执行的图谱 ID 上去。

记者：那么我们是否能把点边对应的关系，也就是知识图谱和前面的自然语言理解融合呢？这样的思路是否会有助于解决语言识别的困境呢？

聂再清：知识图谱和自然语言理解其实是非常相关的。自然语言理解被认为是人工智能当中最难解决的问题。能够正确理解人类的问题并给出合适的答案，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自然语言交互反映了人类的智能水平，同样人工智能也是接受用户的“提问”而被市场进行逐步接受或淘汰的过程。对于自然语言理解来讲，不仅仅是文字的输入，用户的表情和肢体动作等也传递了相关信息，我们以后会把这些都融入进去。

记者：您刚刚提到识别用户的表情和肢体，以我们现在推出的“天猫精灵”为例，是否新一代的“天猫精灵”将可以睁开眼睛去识别用户呢？但换个角度思考，这些摄像头是否会给用户带来“信息安全”或“隐私泄露”的危险呢？

聂再清：新一代的音箱应该会具有视觉能力的。其实我们现在的“天猫精灵”已经具有视觉能力。但为了降低用户经济成本，我们将该版系统的手机摄像头和音箱对接，使得视觉和语音结合。

对于安全问题而言，我认为我们要在在制度上或者程序设置上保证这些用户的信息只有机器和用户所授权的人可以获取。

记者：关于隐私问题，之前在网上也是引起了热议，尤其是百度关于“拿隐私换便利”的谣言。其实作为一个用户而言，可能民众对于产品的认知更多的是这样一种状态：我们对于已经习以为常且离不开的产品，比如支付宝、微信而言，我们不会更多的去考虑信息安全问题，因为它已经完全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对于一个新产品的出现，我们会非常警惕，对隐私和安全问题会考虑的特别多，导致新产品很难介入。这其实是一种“双重标准”，请问您如何看待？

聂再清：“拿隐私来换取便利”的说法是绝对错误的。对于“双重标准”，我们目前能做的是在程序上提供保障，让用户去放心的使用，比如客户不希望授权以外的人看到数据信息，那么我们就应该保证这些数据不被其他人知道，这是做事的基本准则。至于用户内心对新旧事物的双重标准，可能更多的是心理效应和大环境下信任机制建立的问题。

记者：据我们了解，天猫精灵去年双十一在淘宝一经上线，九个小时内便突破了 100 万台。目前的价格也只有 89 元，整体看是非常实惠的。那么除了产品本身的性能之外，产品的运作是否会对老年人带来负面影响？是否会出现算法不准确或者 AI 的失误对老年人安全带来隐患？

聂再清：任何一个新产品都会有个迭代更新不断进步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去发现问题、不断去思考解决问题的过程。但是对于老年人和儿童这样的特殊群体，我们刚开始就尽可能的谨慎设计。对于儿童而言，我们会自行筛选过滤，让他们远离不健康或沉迷于某些东西；对于老人而言，尽量避免情绪激动或出现他们无法接受的东西。在使用过程中还会不断根据老年人和儿童的需求、使用反馈去迭代和更新用户的产品体验。

记者：研究老龄化问题的专家、学者们在做关于“老年人需求画像”方面的研究，关于这些需求，技术可以进行及时跟进，尤其是对于老年人一些独特的个人需求，可以尝试进行私人定制化的技术匹配。那么在这方面技术的发展是怎样的现状？如果将该产品推广的话，方言的问题是否需要考虑？

聂再清：中国的智能语音助手产业起步较晚，尤其是在智能音箱市场方面。但是我们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成为了世界第三（根据 Strategy Analytics 提供的数据），而且我们目前做的是中文市场。其实在这方面的实力我们并不弱，但究竟解决哪些需求、优先解决哪个方言的问题，更多的是基于市场的需求，我们会及时的去更新和迭代。

记者：从技术研发者的角度出发，您认为我们目前的产业环境如何？政府应该如何提供更好的产业发展环境来促进相关技术的发展？以及在解决老龄化问题方面，您认为科技创新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聂再清：就我自身的工作环境和个人感受而言，我认为现在的产业环境整体上是非常不错的，政府非常支持人工智能的发展。在解决老龄化问题方面，需要从“场景、数据、生态、算法”等方面入手。

